
嘉庆时期的教案与天主教的传播

**The persecution to the Catholic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ism in the reign of Jiaqing**

作者姓名：韦羽

指导教师姓名及学位、职称：汤开建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中国古代史

论文提交日期：2006年5月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

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 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 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份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论文摘要

嘉庆时期承袭了乾隆朝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但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其中教案频发即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教形势有所变化。传教士并没有被彻底驱逐。传教士在北京仍有较大活动自由。由于嘉庆皇帝对天主教认识的转变以及白莲教起义的影响，终于在嘉庆十年，以德天赐教案为引火线，爆发了一系列教案。随后终嘉庆一朝，教案基本没有断绝过。教案的爆发说明了天主教在华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是暗中汹涌，同时也体现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嘉庆时期 天主教 禁教 教案

abstract:The emperor of Jiaqing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continued the policy of Catholicism which was carry out in the reign of Qianlong.But Jiaqing's police was not the exact same as Qianlong's.It ha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One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was the high frequency of persecution to the Catholicism.The chagement of Jiaqing's attitude , the influence of the revolt of Bailianjiao and Detianci Persecution arise series of persecution during the reign of Jiaqing.These persecution showed that the Catholicism had developped at that time.

Key words:the reign of Jiaqing , the catholicism ,persecution

嘉庆时期的教案与天主教的传播

绪论	1
第一章 嘉庆十年教案前的社会背景	5
一、乾隆后期至嘉庆初期天主教发展形势	5
(一) 总体形势	5
(二) 北京的传教形势	8
1、1812年以前在京传教士概况	8
2、北京四堂概况	11
(三) 重申对在京西洋人信件来往的规定	13
二、嘉庆皇帝对天主教的认识	13
三、白莲教起义的影响	15
第二章 嘉庆时期的教案	18
一、嘉庆五年贵州胡世禄教案	18
二、嘉庆十年教案	21
(一) 德天赐案	21
1、教案的起因	21
2、教案的经过	23
3、教案的影响	27
(二) 李如案	31
三、嘉庆十年后教案	33
(一) 直隶杨继承案	33
(二) 四川教案	35
1、嘉庆十年成都华阳县教案	38
2、嘉庆十六年巴县、渠县教案	39
3、嘉庆十九年王幅捏造准奉天主教文报图骗报钱案	41
4、嘉庆二十年朱荣、童鳌和唐正珏教案	43
(三) 贵州嘉庆十七年顾占鳌、周正敖、刘开泰教案	46

(三) 湖北嘉庆二十四年刘方济各教案	48
(四) 陕西教案	59
1、嘉庆十六年张铎德案	60
2、嘉庆二十一年兰月旺案	62
第三章 嘉庆时期的禁教措施	64
一、制定处罚章程	64
(一) 处置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	65
(二) 查明失察旗人习教之历任都统副都统	67
(三) 对西洋人的处置	68
(四) 对违禁传习天主教民人的治罪条例	71
二、制定新的管制措施	72
三、收缴和销毁西洋经卷、刊刻书籍	74
四、强调广东省督责任	74
五、加强教化力度	76
(一) 驳斥《教要序论》等	76
(二) 再次列举天主教之危害	77
(三) 《辟西洋天主教说》	78
第四章 余论	81
一、嘉庆教案的特点	81
二、天主教传播的本土化	82
三、各地天主教发展的形势	85
参考书目	88
后记	92

绪 论

国内外对于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 可谓是汗牛充栋。较早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末至康熙年间, 中国方面主要以杨光先、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为代表, 他们或以反教或以护教的立场, 编著了《请诛邪教状》、《辩学章疏》、《天学初函》、《号鸾不并鸣说》及《代疑篇》、《西释辨明》等。传教士方面, 则以曾德昭的《中华帝国志》、卫匡国的《中国新輿图》以及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等为代表。到了近代, 对在华天主教研究有重要贡献的要数陈垣先生、方豪神父、徐宗泽和向达等。陈垣¹先生主要著有《也里可温考》、《基督教入华史》、《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汤若望与木陈明》《吴渔山先生年谱》(二册)等; 方豪²神父的代表作则有《中西交通史》(五册)、《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三册)、《李之藻研究》和《方豪六十自定稿》等。徐宗泽著有《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替要》、《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文集》等; 向达则著有《中西交通史》、《汤若望进呈图象残存考》、《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等。另外其他的一些重要著作有《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天主教在华传播之史集》等。

到了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与世界重新接轨, 东西方文化再次交流碰撞, 对天主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也掀起了新的高潮。对于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述评, 已有多人做过相关工作。如台湾学者黄一农的《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³、张先清的《1990—1996年间明清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研究概述》⁴和钱国权的《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状况概述》⁵等。从这些研究综述中, 可以大概了解到天主教研究所涉及的领域, 基本上包括有(1)在华天主教相关人物、修会等个案研究; (2)文化交流研究; (3)历算、历狱研究; (4)史料考证研究; (5)禁教和教案研究; (6)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通论研究, (7)天主教地区传教史研究, 等等。虽然研究方面甚多, 但研究水平和深度不均, 如对于天主教人物的研究, 集中于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和徐光

¹ 关于陈垣先生在天主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可详见汤开建:《陈垣与基督教》,《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汤开建、陈文源:《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暨南学报》(哲学和社会科学版),2002年12月。

² 关于方豪神父的研究可参见修彩波:《方豪与中西交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³ 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

⁴ 张先清:《1990-1996年明清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6期。

⁵ 钱国权:《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状况概述》,《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启等人；对于天主教修会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大多集中于来华耶稣会上；⁶对于禁教研究，则集中于康雍乾时期。而对于嘉庆朝的禁教则不是很全面和深入。

目前国内外涉及到清代禁教时期天主教发展情况的研究论著，主要的有方豪的《清代禁抑天主教所受日本之影响》，张力、刘鉴唐的《中国教案史》，吴伯娅的《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耶稣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比较》、⁷《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⁸，刘青瑜的《嘉庆十年查禁天主教的原因》⁹、宝成关的《18世纪清政府禁教政策的确立与实施》¹⁰、郭卫东的《清朝禁教政策演变的若干问题》¹¹、罗兰桂的《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清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¹²；台湾张泽的《清朝禁教下的天主教》，庄吉发的《清世宗禁教考》、《清高宗禁教考》，陈莉婷的《从容教到禁教：清朝政府对天主教政策的转变（1644-1820）》¹³；香港韩承良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据方济各会传教历史文件》；国外的有Noel Gubbels的《天主教湖广传教史（1587-1870）》（*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en Hu-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Groot的《中国的宗派主义和宗教迫害》（*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和《中国基督教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Adrien Launay的《巴黎外方传教会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等等。

其中张泽的《清朝禁教下的天主教》，论述康熙、雍正、乾隆和道光四朝禁教下的天主教发展情况。虽然该书比较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清朝这200多年禁教时期天主教的发展概况，以及发生的较为重要的教案，但是限于作者神父的身份，论述中带有太多主观色彩，对某一事件的看法都是完全从教会的立场出发，往往不能形成客观的认识。而张力、刘鉴唐的《中国教案史》，侧重点在于鸦片战争以后的教案史。由于当时研究资料的限制，该书对嘉庆朝教案的论述还是较

⁶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20>。徐海松在此网页上发布的《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论著目录》，详细的编录了1980年至1999年间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著作和论文。尤其是论文部分，分为总论、宗教、思想、学术、制度和风俗、科技、艺术、事件、人物、文献以及信息十一类，十分的详尽。使人对了解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状况一目了然。

⁷ 吴伯娅：《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耶稣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比较》，《清史论丛》，2003—2004年号。

⁸ 吴伯娅：《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暨南史学》第3期，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⁹ 刘青瑜：《嘉庆十年查禁天主教的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年1月。

¹⁰ 宝成关：《18世纪清政府禁教政策的确立与实施》，《河北学刊》，1997年第3期。

¹¹ 郭卫东：《清朝禁教政策演变的若干问题》，《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

¹² 该文为暨南大学古籍所2000年硕士论文。

¹³ 陈莉婷：《从容教到禁教：清朝政府对天主教政策的转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2000年硕士论文。

简单。另外，嘉庆时期禁教下的天主教研究同时也零星的散见于其他专家学者的论著中，但都不够全面和深入，甚至有些尚存有谬误。随着有关这一时期的档案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通过新的深入的研究来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时期禁教下天主教在华发展状况，以及当时清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天主教政策及这些政策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因此本文将主要在运用中文档案文献并以西文资料相辅的基础上，对嘉庆朝的教案进行梳理论证，在此过程中一窥当时天主教在华传播之概貌。在中文档案方面，以《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¹⁴、《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等为主。尤以《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为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该书所收档案全部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汉文档案，共 1230 件。档案形成的时间，从顺治元年（1644）至道光三十年（1850）。档案的文种包括皇帝的亲笔朱谕和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谕旨、官员的奏折和题本、官衙之间的咨呈文书及传教士敬献的礼品清单，传教士所奏折和甘结等。¹⁵嘉庆朝虽只有 25 年，但期间的档案则有 170 件之多。涉及当时在华天主教各个方面的情况。如有在京传教士报奏修葺西洋堂的，有在澳门的传教士奏请愿进京效力的，有各地教案的，等等。这一时期耶稣会退出中国天主教活动舞台，代之而来的主要是遣使会、方济各会以及巴黎外方传教会，因此《遣使会在华传教史》《法国对华传教政策》《天主教在华传播之史集》，暨南大学崔维孝的博士论文《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¹⁶也都是本论文重要的参考资料。“对中国资料所持的批判的态度可以使我们重新发现有关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西文资料的重要性，这样才能使其相互补充。西文资料是研究理解自我与他者的理想材料”。¹⁷因此，本文也尽可能的利用所搜集到的西文材料。

刘青瑜的《嘉庆十年查禁天主教的原因》一文中这样写道：“嘉庆帝继承帝业后，继续奉行禁教政策，其中嘉庆十年（1805）的禁教活动，是嘉庆朝最大的

¹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2003 年 10 月。

¹⁵ 吴伯娅：《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清史论丛》，2005 年号。吴伯娅教授在该论文中分专题论述《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所展现的清廷天主教政策的发展变化、清廷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以及清代西学东渐的特色等方面的内容。

¹⁶ 该博士论文已于 2005 年 12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¹⁷ 孙尚扬、钟鸣旦：《1840 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导言。

一次教案。”¹⁸事实上，嘉庆十年教案并非指某一个具体的教案，而是指发生在这一年的一系列教案，其中包括德天赐案、佟澜案、佟恒善案、图钦、图敏案、张铎德案和李如案等。各个教案有同有异。教案的影响层面也各不相同。如佟澜案和图钦、图敏案两案为旗民犯案，这就使得清廷因为连续的旗民习教违禁之事而大为震惊，原来以为陷于沉寂的天主教传播居然还是发展得这么猛烈。因而此二案的消极影响远比其他教案来得大。嘉庆十年教案的发生对整个嘉庆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嘉庆十年以前，承接原来的禁教政策，但奉行并不严厉；嘉庆十年以后，因为嘉庆十年系列教案的爆发，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禁教措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嘉庆十年成为一个分水岭。以嘉庆十年教案为中心有助于认识这一时期禁教下天主教发展的情况。

本文拟从嘉庆十年之前天主教的发展情况着手，分析出嘉庆十年教案大爆发的原因。嘉庆皇帝对天主教的认识变化是影响禁教政策发展的主观因素；嘉庆初年持续九年的白莲教起义是引发嘉庆十年教案的导火索，尤其是嘉庆五年胡世禄教案，更与当地官员疑此与附近活动的白莲教徒有关而起；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也是文化的冲突，天主教的反对祀孔、祭祖和不跪拜皇帝是与统治阶级历来奉行的主流传统政策相对立的，这种对立将直接威胁到君王的统治。因此，见载于档案的教案，检查违禁民人是否已经悔改脱离天主教的一项内容，即是察看其家中是否又重新贴上门神、灶神，是否又摆放回祖宗牌位。¹⁹当嘉庆九年十二月华人教徒陈若望被盘获时，就揭开了嘉庆十年一系列教案爆发的序幕。嘉庆十年教案发生的影响，使得即位初期对天主教不予注意的嘉庆皇帝开始严厉禁教起来，随后颁行了一连串的措施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另一方面，教案频发，禁教严厉，但天主教仍然照旧在中国秘密传播。直到嘉庆二十年、二十四年仍有大的教案发生，可见天主教仍然在华秘密发展传播。

¹⁸刘青瑜：《嘉庆十年查禁天主教的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年1月，第116页。

¹⁹《清中前期在华天主教活动档案史料》中对教案的处理基本上都有这条。

第一章 嘉庆十年教案前的社会背景

一、 乾隆后期至嘉庆初期天主教发展形势

(一) 总体形势

这一时期由于耶稣会的取缔，使得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形势有比较大的变化。1773年7月21日教宗格肋孟十四世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两西西里王国的压力下，颁布敕谕宣布取缔耶稣会。不过直到1778年8月北京才接到该敕谕。²⁰耶稣会的被取缔导致两个比较直接的后果。其一，中国再也没有学识渊博、通晓汉文的传教士了。“剩下来的仅仅是些对死难者的胜利果实觊觎生心的普通、虔诚的传教士”。²¹的确，到嘉庆时期，再也没有出现过媲美于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之辈的传教士。甚至因为被认为无一技之长而遭遣返澳门，勒令回国。²²其二，1785年罗马开始派出遣使会接替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在耶稣华被撤销之后，一些前耶稣会士继续献身于传教事业。他们主持那些地方的堂区事务，但是他们的人数减少了，一个传教士人员的最终的变化是必须的。结果，法国政府促使遣使会来负责法国在中国的传教事务。……到了1785年，遣使会士到达北京”。²³自1782年起，欧洲各国便纷纷准备派遣大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首先派3名遣使会士，即指罗广祥、吉德明、巴茂正。不久，罗马传信部也向湖广地区派了11名意大利传教士，其中6名方济各会士，他们是萨萨里(Jean de Sassari, 即中文档案里的吧□地哩映)、比恩蒂纳(Mattei de Bientina Joseph, 即中文档案中的吧□地哩做噉)、路神甫(Louis-Antoine Landi, 路类思, 即中文档案中的吧□地哩雷□是), 吴神甫(Jean de Mandello, 吴若翰, 即中文档案中的吧□地哩映□本□地□是□打), 吉尼(Atto Biagini, 即中文档案中的吧□地哩亚度、白亚多)及伊神甫(Grescenziano Carli, 即中文档案中的吧哩叭哩□地、伊高善); 3名圣约翰布道会传教士: 费拉雷蒂、孔福尔蒂(Emmanuel l'Conforti, 即中文档案中的吧□地哩□佛咧□地), 马尔基尼(Jean Baptiste Marchini); 两名奥斯定会士: 圣马格里特·昂塞尔姆(即颜诗莫, 中文档案译为汉色勒木)、德天赐(Adéodat de St.-Augustin,

²⁰ 【法】卫青心 著，黄庆华 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²¹ 【法】卫青心 著，黄庆华 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²² 这里主要是指高临渊、颜诗莫、王雅各伯和德天赐四人。因为教案的接连发生，嘉庆十六年他们被遣返澳门。

²³ Noel Gubbels: 《天主教湖广传教史(1587—1870)》(*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第215—216页。

中文档案译为阿头大多)。巴黎外方传教会把彭神父 (Joseph Delpon, 即中文档案中的吧地哩夫西) 派到四川教区; 西班牙方济各会也将圣米格尔 (François de Saint Miguel, 即中文档案中的方济觉, 又称佛兰斯是葛) 派到江西传教。²⁴除北京教区主教、3 名遣使会士和 2 名传信部教士 (德天赐和昂塞尔姆) 以宫廷算师和画师名义进入京城外, 其他新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只能秘密潜入内地传教。²⁵

到了乾隆四十九年 (1784), 澳门主教区先后派出三批传教士潜入内地。一批十人往直隶、山西; 一批五人往山东; 一批四人拟往湖广、川陕。每批教士都由华人信徒领路, 沿传教点前进。但第三批至湖北樊城被清朝抓获, 并查出一信, 由此形成全国性搜查传教士的局面。随着查拿传教士及有关人员的进展, 牵涉到更多的地区, 因此引起乾隆的警觉, 遂发起一次全国性的大搜捕。此次教案的处理显示出了乾隆后期查出教案的一些特点。“由查拿教士、有关教徒进而到一般教徒, 由一事一查进而到全国大搜查, 对传教士要彻底查办, 对教徒要以净根株, 并提出对防范不力的官员加以申饬与议处”。²⁶这些特点基本为嘉庆朝所承袭。虽然此次教案波及全国²⁷, 但乾隆朝禁教的特点是时紧时松, 所以大难过后, 传教士又开始活动。而且由于北京传教士的多方面活动, 乾隆下令释放了全部在押的欧洲传教士。²⁸这就有助于传教事业的恢复。

这一时期的传教重心有由江南向川贵等内地省份转移的趋势。江南传教势头有所遏制, 但是禁教并没有使传教的整体势头停止, 各地秘密传教反而有所发展。嘉庆即位初期, 对天主教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直到嘉庆十年才开始严厉禁教。其间在内地的传教事业, 有时也得益于“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员, 对居留在他们辖区的传教士, 假装不知”。²⁹而在北京和上海这两大都市的附近地方坚持信教的官宦家庭, “便成了被官府追踪的欧籍传教士避难的稳妥之地”。³⁰这些名望家族

²⁴ 此段资料来源于《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 28 页, 以及汤开建、赵殿红、罗兰桂:《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即兴衰》,《国际汉学》,第 100 页,2002 年。括号里的内容为后者所考证。

²⁵ 【法】卫青心 著,黄庆华 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 页。

²⁶ 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第 21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²⁷ 此次教案中,“被捕传教士的省份有广东、江西、陕西、山西、福建、山东。被捕的欧洲传教士和中国教士、教徒,全部被解送北京下刑部大狱。被关押的有 13 名传教士、3 名欧洲主教、14 名中国教士和 30 名中国教徒。最后,被收监的 16 名欧洲人中,4 名死在狱中,其余 12 名幸存者均被判处终身监禁”。见《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 26 页。

²⁸ 见《法国对华传教政策》,第 30 页,以及王之春著。赵春晨校:《清朝柔远记》,第 149—151 页。因为乾隆释放这些在押的传教士是本着“以示柔远至意”的目的。

²⁹ 穆启蒙编著,侯景文译:《中国天主教史》,第 110 页,光启出版社。

³⁰ 穆启蒙编著,侯景文译:《中国天主教史》,第 111 页,光启出版社。

的庇护也有利于天主教的传播。不过这一时期的信徒,尤其是内地省份的新信徒,都属于低层社会的阶级。“如果他们不参加敬孔和祭祖,便不能参加考试,猎取功名,将永无光宗耀祖之望;他们大多数是自耕农或渔户,全部财产是几亩薄田或一只渔船;再不然就是工人和小本商人;这些人都不为人所重视”。³¹然而,不被人重视的这些小民却恰恰是日后屡屡兴起的教案的主要人物。由于禁教的施行,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逐渐艰难,且在华行动日益困难,因而华人天主教徒就承担了主要的传教工作,从而导致了天主教在华发展的比较重大的变化,如传教路线的贫民化(这些人都属低层社会的阶级,都不为人所重视)、天主教的本地化(大多数的教友是自耕农或渔户、工人、小本商人)、传教与信教的神秘色彩及天主教发展形式的封闭性等。³²

这一时期最活跃的传教区当属北京和四川。各地教难纷起,而北京的传教士却享有一定的自由。而四川则是当时教务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包括贵州、云南),共有“两位主教,两位欧籍神父,十六位中国神父,教友四万人”。³³1803年四川宗座代牧徐德新³⁴曾召集了一次四川、云南和贵州所有神父的全体会议³⁵,拟定了生活规则,并报呈罗马获得批准,推行至全国。此次教务会议的决议条文一直指导着四川的传教事务,直到1924年上海的主教会议为止。³⁶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810年时,全国教友人数为205000人,传教士111人,其中外籍传教士31人,中国籍教士80人。³⁷

³¹ 穆启蒙编著,侯景文译:《中国天主教史》,第111页,光启出版社。

³² 参见宾静:《清雍乾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暨南大学历史系2004年硕士论文。该论文虽然阐述雍乾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但这些特点基本适用于嘉庆时期的。

³³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172页。沙百里的《中国基督徒史》第199页也称:“1756年,在该省共有4000名基督徒和两名中国司铎。1802年,其人数增加10倍,其总数达到4万名基督徒和16名中国司铎。”

³⁴ 徐德新(John-Gabriel Dufresse),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又名李多林、都费斯。他于1775年首次来到中国,在由澳门潜入四川的途中两次遭逮捕,但得以逃脱1784年再次被捕,且被解至北京,被遣送回欧。五年之后又潜入四川。1800年升为主教,1815年被捕斩首。以上资料见《中国天主教史》第110页,《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兴衰》表十二,又见《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173、175页。

³⁵ 穆启蒙编著《中国天主教史》称之为“中国教会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会议”。

³⁶ 【法】沙百里著,耿昇、郑德弟译:《中国基督徒史》,第1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³⁷ 见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171—250。另外,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217页所提供数据为,计有教徒215000人,主教6位,教廷神甫80人。

（二）北京的传教形势

1、1812 年以前在京传教士概况

1812 年之前，在京的西洋传教士大约有十余名。这十余中通晓算法、钟表、绘画者不等。其中包括钦天监监正索德超，监副罗广祥和汤士选三人。遇到有监正、副监正缺出的情况，就在这十余人内挑选。³⁸ 这十余名传教士主要分属于遣使会、方济各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现据有关资料将这一时期在京的传教士辑录如下：

会 籍	国 籍	姓名	传教时间 ³⁹ 和传教概况
--------	--------	----	--------------------------

耶稣 会			部分译为汉、满文字”。 ⁴⁰ 贺清泰在华时间长达 44 年，以致他年老时清廷特别恩准其留华而没有被要求回国。
	意	潘廷璋 (Joseph panzi, 1733—1812)	1771—1812 年在北京。有称其所作达尼厄尔先知拜神图，精妙不在其国人郎士宁之下。 ⁴¹ “常被召赴内廷，在帝前作画”。 ⁴² 潘廷璋曾在信中写道：“至若庸劣如我者，终日在内廷作画，记忆已失，仅知沉默。我之处中国，一如粗野无知之水手处于热那亚城一宫殿之内。虽然我画师也，别言之，传教会之忠仆也，如主有命，我决为此传教会尽瘁而死。” ⁴³

³⁸ 《军机处奏为西洋人福文高等三人谙晓天文情愿赴京效力可否准其入京折》，载《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以下简称《档案史料》），第 818 页。

³⁹ 解至时间定为 1812 年，因为这一年高临渊、颜诗莫、王雅各伯和德天赐四人同时被驱逐回国。

⁴⁰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 1030—1032 页。

⁴¹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 96 页。

⁴²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 1037 页。

⁴³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 1038 页

	葡	索德超 (Joseph-Bernard d'Almeida, 1728-1805)	1759年到达北京,治理历算。二十四年后,即一七八三年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同时他还兼为医师给人治病。 ⁴⁴ 索德超是汤若望之后一百五十年以来任职钦天监监正的最后一位耶稣会会士。 ⁴⁵ 曾有记载,嘉庆继位之后,两召任职钦天监的三位传教士入内叩拜。但索德超奏称其教进行此礼,而拒绝奉命。他思虑必然有所得罪,于是便作遗嘱代死。不料竟无事。原来是嘉庆帝虽不喜欢西洋传教士,但却曾对朝臣言其忠直可以任使。 ⁴⁶ 索德超是自耶稣会士废止之后最后留华的葡籍会士。他于1805年11月逝世。 ⁴⁷ “上赐葬银一百五十两”。 ⁴⁸
	葡	安国宁 (Anoré Rodrigues,1729-1796)	1759-1796年在北京,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与索德超一同被召进京。乾隆四十年南堂失火,安国宁与高慎思一起引咎奏请议处,但乾隆反而赐银修复,并再亲书匾额对联。随后安国宁任钦天监监副、监正。 ⁴⁹
	法	甘若翰 (又作梁栋材, Jean-Joseph de Crammont)	1770-1812年在北京。甘若翰是同严守志和嘉类思二人同到中国的,随后进京“治理历算”。 ⁵⁰ 还“曾研究满文,并以拉丁文教授预备担任教职之中国青年数人”。并“谙悉音乐,操提琴,颇有韵味。瞻礼日教堂唱圣歌时辄合丝助之”。 ⁵¹ 1785年曾请病假赴广州修养,1890年回京,1812年殁于北堂。 ⁵²
遣使会	法	罗广祥 (又作罗旄阁 Nicolaus-Joseph Raux,1754-1801)	1783-1801年在北京。 ⁵³ 他于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六年(1801)担任钦天监监副。 ⁵⁴ 罗广祥为在华法国遣使会会长。 ⁵⁵
	比	吉德明 (又作冀若望, Joannes-Joseph Ghislain,1751-1812)	1783-1812年在北京。吉德明直接负责北京神学院。 ⁵⁶ 罗广祥1801年去世后,由吉德明继任。他主要培植本地神职人员,有17位神父。当教难时期,外国神父被监禁驱逐时这些事先培养起来的中国籍神父维持着传教事务不坠。因而评价此举“可谓有先见之明”。 ⁵⁷

⁴⁴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933页。

⁴⁵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934页。

⁴⁶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935页。

⁴⁷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935页。

⁴⁸ 《正教奉褒》,《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568页。

⁴⁹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936页。又见《正教奉褒》第567页。

⁵⁰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1019页。

⁵¹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1020页。

⁵² 【法】费赖之 著,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1020-1021页。

⁵³ 汤开建 赵殿红 罗兰桂:《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兴衰》,第101页。

⁵⁴ 参见薄树人:《清钦天监人事年表》,载《科技史文集》第1辑。屈春海:《清代钦天监暨时宪科职官年表》,载《中国科技史料》1997年第3期。转引自吴伯娅:《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暨南史学》第三辑,第475页。也参见《中国基督教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635-1800*),第721页“西方人任职钦天监之表格”。

⁵⁵ 吴宗文:《遣使会在华传教史》,见罗光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光启出版社、征祥出版社和香港真理学会联合出版,第142页。

⁵⁶ Nicolas Standaert 编:《中国基督教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635-1800*),第350页。

⁵⁷ 吴宗文:《遣使会在华传教史》,见罗光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143页。

	法	巴茂贞 (Carles Paris,1738-1804)	1783-1804 年在北京。巴茂贞在宫廷作为钟表制造者、音乐家、机械师和艺术家。 ⁵⁸
	法	韩纳庆 (Robert Hanna,1762-1797)	1794—1797 年在北京。 ⁵⁹ 韩纳庆是爱尔兰人，他先是在澳门神学院担任教师，在 1794 年到达北京，与他同时到京的还有南弥德。担任北堂教区的神父。 ⁶⁰
	法	李神父 (卑呢额斯定)	1794—1826 年在北京和江西。
	葡	福文高 (Domigo Joaquim Ferreira)	1801—1824 年在北京。嘉庆六年 (1801) 至十二年 (1807) 任监副，嘉庆十二年 (1807) 至道光三年 (1823) 任监正。 ⁶¹
	葡	李拱宸 (Jos é Ribeiro-Nuñez,1767-1826)	1801—1826 年在北京。嘉庆十二年 (1807) 至道光六年 (1826) 任监正。 ⁶²
	葡	窦允山 (Domingos Joaquim Ferrira,1758-1824)	窦允山与李拱宸一起与 1801 年到达北京，并住在东堂。两人一起任职于钦天监。 ⁶³
	葡	慕王化	1792—1805 年在北京。
	葡	毕学源 (Cattano Pires Perera)	1804-1838 年在北京。道光六年至十八年署理北京教区主教。 ⁶⁴
	葡	高守谦 (Verissino Montero da Sarra)	1804-1826 年在北京。
	法	苏振生 (Jean François Richet)	1800-1812 年在北京。
	法	马秉乾 (金神父, Lazare Marius Pamzel)	1800—1806 年在北京。
方 济 各 会	葡	汤士选 (Alexandre de Gouvea,1751-1808)	1784—1808 年在北京。乾隆五十二年 (1787) 至嘉庆九年 (1804) 担任钦天监监副，嘉庆十年 (1805) 至十二年 (1807) 任监正。 ⁶⁵ 于 1782 年 7 月 12 日被任命为北京主教。 ⁶⁶ 嘉庆十三年汤士选逝世，上赐葬银一百五十两。 ⁶⁷

⁵⁸ Nicolas Standaert 编：《中国基督教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635-1800)，第 350 页。

⁵⁹ 《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兴衰》第 101 页表格中写道韩纳庆，1794—1799 年在北京，但是《中国基督教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635-1800) 第 350 页，韩纳庆的生卒年份是 1762—1797，疑前者有误。《中国基督教手册》原文如下：Five Lazarists went to China, the first to arrive after an interval of some fifty years: Raymond Aubin (1759-1795), Robert Hanna(1762-1797), Nicolas Raux(1754-1801), Br.Charles Paris(1738-1804) and Jean Ghislain(1751-1812). 另外，载于《中国天主教史集汇编》的《燕京开教略》(下册)第 401 页上也写道：“幸有遣使会士名拉米敖(即南弥德)者，于嘉庆二年，降生后一千七百九十七年，偕本会修士名韩纳庆者，得入京邸。不期韩纳庆即于是年逝世。”

⁶⁰ Nicolas Standaert 编：《中国基督教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635-1800)，第 350 页。

⁶¹ 吴伯娅：《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第 475 页。

⁶² 吴伯娅：《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第 475 页。

⁶³ Nicolas Standaert 编：《中国基督教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635-1800)，第 351 页。

⁶⁴ 吴宗文：《遣使会在华传教史》，见罗光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 145 页。

⁶⁵ 吴伯娅：《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第 475 页。

⁶⁶ 【法】樊国阴著，吴宗文译：《遣使会在华传教史》，华明书局，1978 年 10 月初版，第 113 页。

⁶⁷ 《正教奉褒》，《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 568 页。

奥 斯 定 会	意	德天賜 (Adeodat de San Agostino, 1760-1821)	1784-1812 年在北京。是以钟表师的名义由罗马传信部派遣到北京。 ⁶⁸ 因为嘉庆十年的教案, 被监禁在热河四年之久, 后被放回京中, 但嘉庆十六年被遣送回国。德天賜可谓是嘉庆朝最为出名的西洋传教士了。因他托陈若望寄送地图一事被查出, 从而引发了嘉庆十年一连串的教案, 而对整个嘉庆朝的天主教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意	颜诗莫 (汉色勒木, Anselmo da Santa Margherita, 1751-1816)	颜诗莫和德天賜二人于 1784 年同时到达北京, 又于 1811 年同时被驱逐出中国。 ⁶⁹
教 廷 传 信 部	意	高临渊 (Emmanuel Gonforti)	1784-1812 年在北京。与德天賜、颜诗莫和王雅各伯同时被驱逐。
	意	王雅各伯 (费拉雷蒂)	1784-1812 年在北京。与前 3 人同时被驱逐。

以上便是 1812 年以前在京传教士的概况。是时虽然禁教, 但在京传教士还是享有一定的自由, 教堂不仅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而且“各堂西洋人每与内地民人往来、讲习, 并刊行书籍, 私自流传”⁷⁰。同时随着禁教政策和传教士的变化, 北京天主教堂也发生了变迁。

2、北京四堂概况

当时北京四堂仍然俱在, 即北堂、南堂、东堂和西堂。四堂一度是北京地区天主教传播的中心, 甚至是西学传播于中国的中心。只是教堂的兴衰, 是跟传教士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明末清初乃至康熙时期, 传教士在中国受到礼遇, 天主堂也呈现一派兴旺。当时的天主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似乎要甚于其传教的作用。⁷¹不过到了嘉庆时期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北堂: 北堂原来地址在北京三海 (即北海、中海、南海) 的中海西畔, 因其地名叫蚕池口, 所以北堂最初也称为蚕池口教堂。⁷²康熙时建成。⁷³是时“名望之隆, 为四堂之冠”。⁷⁴乾隆五十年 (1785) 法国遣使会士到京接管耶稣会士在

⁶⁸ 卫育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 第 34 页。

⁶⁹ 《内阁奉上諭著各省督抚饬属严查在境西洋人》, 载《档案史料》, 第 930 页。

⁷⁰ 《清仁宗嘉庆实录》, 卷 142, 嘉庆十年四月十八日条。

⁷¹ 在这方面可详见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 广东人民出版社待刊稿。

⁷² 佟询主编:《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 第 268 页,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关于北堂的变迁情况还可参见佟询:《“北堂”的变迁》,《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 年第 3 期。

⁷³ 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康熙皇帝偶患疟疾, 吃御医中药数剂无效。当时在京的法国耶稣会士张诚、白晋等人献上金鸡纳霜, 使康熙帝恢复了健康。张诚等人乘机向康熙奏请建立教堂。后来, 康熙还赐亲笔撰写的匾额、长联及律诗。

⁷⁴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见《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 第 222 页。

华传教事务，原为耶稣会士所居住的北堂自然的也被交接。不过这些前法国耶稣会士仍同遣使会士一起住在北堂。⁷⁵“时会士止四五人。未几，死者死，去者去。止剩高守谦一人，与一中国会士薛神父而已”。⁷⁶嘉庆九年另一遣使会士明诺接办北堂事务，“嗣后有京内北堂寄交洋信等项事件以及西洋人有情愿进京效力当差者，即饬令住广西洋人明诺接办一切”。⁷⁷

南堂：南堂最初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神宗批允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北京留居、传教，南堂最初是他的寓所。⁷⁸此后汤若望和南怀仁都曾在南堂居住过。南堂“为北京主教座位所在，实为诸堂之母”。⁷⁹“后耶稣会士不属法国者，皆居其内”。⁸⁰耶稣会解散后，会士们被降格为在俗传教士，但他们没有退出南堂，只是将原属于葡萄牙耶稣会士的东堂交给了遣使会。

东堂：东堂原来是意大利与葡萄牙传教士的住地，1655年（顺治二年）利类思和安文思修建了东堂。“此堂虽系西式，而甚卑矮，与北堂无异。长仅七丈”。⁸¹嘉庆十二年（1807）东堂不慎失火，焚毁殆尽。当时在钦天监任职的福文高和李拱宸两神父，住在东堂。火灾发生后，二人即上书引咎，自请处分。其实他们的真正用意，是希望嘉庆一如乾隆年间南堂失火后却仍得赐银重建⁸²，不想嘉庆帝却降旨让福文高等人徙居南堂，东堂不必重修，于是东堂被废。⁸³

西堂：西堂乃遣使会士德里格于雍正初年所创立。雍正即位后，禁教更为严厉，但德里格却在这一时期建造了西堂。嘉庆时德天赐等人居住在西堂。至嘉庆十六年嘉庆帝下旨，“西洋人惟在朝有职任者，准在京居住。余俱不准逗留”。⁸⁴因此随着德天赐等人的离京，西堂亦被废。⁸⁵

六。

⁷⁶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见《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222页。

⁷⁷ 《两广总督倭什布为查询西洋人明诺接办北堂等事致内务府报告》，载《档案史料》，第825页。

⁷⁸ 佟询主编：《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第287页。

⁷⁹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223页。

⁸⁰ 《燕京开教略》，《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398页。

⁸¹ 《燕京开教略》，《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398页。

⁸² 乾隆四十年，南堂失火俱成灰烬。经高慎思奏闻，乾隆乃赐银以咨重修。

⁸³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222页。

⁸⁴ 《内阁奉上谕著各省督抚饬属严查在境西洋人》，载《档案史料》，第930页。

⁸⁵ 西堂的传教士在动身离开北京之前，把教区的所有财产，包括房屋、寓所、家具等，全部买光了，只是教堂寻觅不到买主。后来，教堂终于以600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中国政府。见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第38页。

（三）重申对在京西洋人信件来往的规定

对西方传教士的限制已经细化到对其信件来往递送也左右详细规定。嘉庆七年和八年，都连续颁旨强调在京西洋人信件的来往传送仍照旧例，重申：

“在京西洋人等呈寄广东粤海书信仍着照旧例，官为寄往交该督转交权领，该国如有来信亦着该督寄京交往该官，西洋事务大臣转交权领，不准私行托寄”。⁸⁶

如南堂西洋人索德超，北堂西洋人南弥德等呈寄广东澳门书信二封，相应照例移咨贵督转交收领。另奉发洋信二封，内一封留差会赴澳门同知转给毕老爷收领，一封谕交洋商转给吕宋行明诺收领。⁸⁷明诺（Minguet），又叫赵仁德，乃法国遣使会士，1793—1806年在广州和澳门。明诺虽然是法国人，但“与葡国传教区会士为伍”。⁸⁸他曾担任过“信使”的角色。嘉庆九年，贺清泰呈称五人接办北堂事务，嗣后经过广州府转饬南海县详细查明，因“明诺年力精明、诚实，并无过犯”⁸⁹，所以在明诺与巴类斯德罗二人中选出明诺接办北堂事务。“嗣后凡有京内北堂寄交洋信等项事件，以及西洋人有情愿进京效力当差者，即饬令住广西洋人明诺接办一切”⁹⁰。这样“南海县饬令西洋人明诺接办一切，并将发来洋信转给收领取，具给领日期及领状申缴”。⁹¹虽然对传教士信件往来有如此规定，但第二年还是发生了山西民人教徒陈若望携带传教士德天赐的信件而被搜查出来的事情，从而引发了嘉庆十年教案。看来，规定和限制再多再细，传教士还是会想出种种办法应对。

二、嘉庆皇帝对天主教的认识

嘉庆帝于1796年登上皇位，时年36岁，至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驾崩，方始亲政。⁹²嘉庆时期（1796—1820）可谓是清朝的中期，亦是这个王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8世纪初的清朝，其全盛时期业已过去，社会矛盾也随之而越

⁸⁶ 《两广总督吉庆奏为代转在京西洋人索德超呈寄广东澳门三巴堂书信事致内务府咨》，载：《档案史料》，第820页。

⁸⁷ 《两广总督倭什布为代转寄在京西洋人索德超呈寄广东澳门书信事致内务府咨》，载《档案史料》，第822-823页。

⁸⁸ 【法】樊国阴著，吴宗文译：《遣使会在华传教史》，华明书局，1978年10月初版，第129页。

⁸⁹ 《两广总督倭什布为查询西洋人明诺接办北堂等事致内务府咨》，载：《档案史料》，第825页。

⁹⁰ 《两广总督倭什布为查询西洋人明诺接办北堂等事致内务府咨》，载：《档案史料》，第825页。

⁹¹ 《两广总督倭什布为查询西洋人明诺接办北堂等事致内务府咨》，载：《档案史料》，第825页。

⁹² 《清史稿》卷十六，《仁宗本纪》，第五七三页。

来越尖锐，强大的国力正一点点的被消耗掉。嘉庆朝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总的来说，嘉庆帝是一位守成之君，有评价“他虽一件一件地解决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从而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而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

在研究嘉庆皇帝对天主教的认识之前，看看其对宗教的态度。嘉庆初年以来，白莲教等民间宗教在川陕楚大规模起事，嘉庆因此撰文多篇分析“正教之益，邪教之害”。他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源，主要就是由于正教不昌明。

“正教失而后邪教肆”，“奸民倡为邪说，煽惑愚民，其经卷鄙俚不通，俗陋已极，不但诸子百家难相比凝，即佛经道录，亦去此甚远，其年号皆前明之时，竟系彼时乱民所造，潜藏穷乡僻壤，未能搜出焚毁，贻害至今日也。去邪教以遏乱，焚邪经以涤源，是在良有司正已率属诚心化导，使民知正教之益，邪教之害，渐归于伦常礼仪矣。邪教惑人，惟一利字，愚民见利忘义，贪利忘害，循利乱常，趋利迷心，至于罪大恶极，虽死不悟，皆图利耳。诚能实心治民，先养后教，庶民具有良心，断无不改悔之理，是在吾君臣昌明正教，勤政爱民，心诚求之……”⁹³

因此，坚持崇儒重道、崇正黜邪究成为嘉庆时期基本的宗教政策。嘉庆年间又是宗教宗教动乱扩大化的时期，故而民间秘密宗教则被视为邪教，化民成俗，打压邪教成为当务之急。⁹⁴嘉庆帝的这种宗教态度自然也影响到他对天主教的认识。在后来查办天主教的专条中，与查禁民间秘密宗教的条例，已并无不同。

在对天主教的认识上，嘉庆帝是远逊于其先辈的。据史料记载，嘉庆帝最初都不知道中国内地还有传教活动。张泽神父在其著作《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一书中认为：

“清初几个皇帝对天主教的态度各有不同。总的来说，自顺治、康熙到雍正、乾隆，最后到嘉庆，对天主教的认识和尊敬程度，一代不如一代。其中以康熙对天主教的了解的最清楚。雍正虽然厌恶天主教，但还有相当的认识。乾隆自幼生长在禁教期间，虽然接触了不少传教士，

⁹³ 《御制文》，嘉庆年间武英殿刊本，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卷上，页12。转引自庄吉发：《清朝宗教政策的探讨》，载《清史论集》（五），第175页。

⁹⁴ 庄吉发：《清朝宗教政策的探讨》，载《清史论集》（五），第177页。

但他只注意西洋人的科技与艺术，对于他们的教理则漠然视之。嘉庆皇帝不但对教理茫然不知，而且连西洋艺术也无所爱好，终在位之世，进入北京供职的西教士仅二三人，而且到嘉庆十六年，留在北京的西教士只剩下三人。”⁹⁵

可见，在当时的教会人士看来，嘉庆对天主教的了解是多么之少寡。《中国教案史》甚至称：“据史料记载，嘉庆帝最初并不知道中国内地还有传教活动。”⁹⁶《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亦称：“嘉庆不识西士。不爱西学西艺。较乃祖雍正为尤甚。已故终嘉庆之世，得进京效力者，止二三人。而且死亡相继。接续无人。致西士渐绝于京师。而京师教务，遂至日就衰落。”⁹⁷嘉庆皇帝对天主教的认识成为影响当时清廷对天主教政策的主观因素。嘉庆十年首例教案即德天赐教案发生后，嘉庆帝立即决定订立章程，对在京传教士严加管束，随后颁行了《西洋堂事务章程》。⁹⁸

综观嘉庆一朝，基本可以嘉庆十年德天赐教案为线，将这一禁教时期天主教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从现有资料看，嘉庆十年以前，虽然也有“传教惑众”之事发生，但所载事例极少，也没有引起清政府的注意。但到嘉庆十年教案以后，所见教案数急剧增加，清廷对事涉天主教的各方面均予以重视，加大禁教力度。因此可以说，嘉庆十年是一个分水岭。但这段时期天主教仍有发展，后文将作论述。嘉庆十年教案的爆发除了因为官府例行禁教之外，也受当时遍及半个中国的白莲教武装活动的影响。

三、白莲教起义的影响

始于嘉庆元年的白莲教社团起义，范围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前后历时九年多，各地的武装队伍达数十支，人数则有几十万，从而对清王朝的统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不可避免地对朝廷处理宗教社团活动问题亦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因为白莲教的缘故，清政府对天主教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教政策。

白莲教是一种流传于民间的秘密宗教。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代或更早时候。白莲教从

⁹⁵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光启出版社1993年，第一六一页。

⁹⁶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192页。

⁹⁷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见《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辅仁大学出版社，第222页。

⁹⁸ 《大学士禄康等奏为酌拟西洋堂事务章程折》，载：《档案史料》，第852—855页。

创始到清代中叶的几百年间，始终不是以正统宗教被尊崇，而是作为异教被排斥。

⁹⁹这场武装暴动始自湖北，随后波及河南，后发展到杀西、甘肃，而后到四川。

史书记载：

乾隆五十九年，各省查拿邪教，多供传自宋之清，而未知宋之清受之刘之协，刘之协又受之刘松。刘松者，河南鹿邑人。四十年，于混元教内犯案，发配果敢速隆德县。先收安徽太湖县人刘之协为徒，五十三年探其师，商复旧教，改为三阳教，将旧《混元点化经》改为《三阳了道经》，灵文改为口诀。犹恐不能治众，欲觅一人，捏名牛八，伪称明裔。又指刘松之子四儿为弥勒佛转世，保辅牛八。入教者可免水火刀兵之厄，敛钱为根基钱，又出打丹银，汇送刘松处。到日，对天焚黄表，口诵灵文消灾。

之协又收宋之清为徒。之清递传日众，遂背师别拜河南南阳人李三瞎子为师，谓其子卯金刀将来大贵。将之协教内人勾去。之协同刘四儿至襄阳理论，之清斥为虚诬。四儿亦以未见牛八怒诘。之协寻得太和县人王廷章（即廷昭）之子（十一岁）双喜儿作为牛八，送隆德与刘松见面。复称往襄阳见之清，自此遂无消息。嗣宋之清破案，逮讯刘松，均论如律。是时，之协方在逃，而逆案已先定矣。¹⁰⁰

初，乾隆五十八年、九年间，湖北习白莲教者甚众。奉旨查拿，获刘松及刘之协之徒宋之清、齐林等，论如律，惟刘之协在逃。有司率行祥报：湖北白莲教，除弋获外，均自首改悔，现在并无习教之人。其实，习教者正炽。地方官以业经申报，碍难究办。不肖胥役，因之私行婪索，多方勒逼，时有“四凶”之号。逆党积愤，于是，刘之协之徒宜者县贼张正谟、刘宏铎、覃正潮，正月十一日，聚众倡乱于枝江县，踞灌湾脑。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白莲教的传受方式与当时天主教在华传播方式十分相近。白莲教捏造“牛八”为其精神领袖；有刘松、刘之协等人作为骨干负责传教；有《三阳了道经》作为教义；并口诵灵文消灾等。而天主教有耶稣为其最高精神信仰；有骨干信徒负责传教，负责联络；有各种各样的“经书板片”；并定期聚

⁹⁹ 冯佐哲：《嘉庆年间五省白莲教大起义》，载《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第2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¹⁰⁰ [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四十一《平定教匪志喜联句》。

众诵经礼拜。这些就使得朝廷和官员很容易将两者混淆，将天主教视为“邪教”。正如谢和耐在其《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指出：“大量现象都构成了天主教会与那些非法的和多少带有秘密性的宗教团体之间的联系：无视宗教级别的崇拜，因为只有皇帝有权祭天；联系其成员的兄弟关系；笼罩其会议之上的神秘气氛；诉诸巫术的怀疑；男女集聚一处的组织；皈依者的狂热以及宣扬殉道、允许彼岸赐福的教义等等。所有一切都触违法规。”¹⁰¹

而且白莲教在民间的异常活跃终至发展成武装暴动，遍及半个中国。清朝统治者虽然相继镇压，但极为狼狈，弄得元气大伤，并且惊魂未定。因而对于一切类似于此的民间组织，极端敏感。又有记载：

当阳县令闻变，坐厅事，传集书役，谓曰：“白莲教已反，与邑渐近；本邑习教者，严缉务务获！”役辈齐声曰：“我等皆白莲教也！更谁缉？”令拍案怒骂曰：“汝辈反乎？”役等慢应曰：“反即反耳，何怒为？”令拂袖起，群役即争前擒令出署，以钱一串置令左手，银一锭置其右手，拉杀之。¹⁰²

该段极其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白莲教的发展情况：竟至官府中除了县令一人之外，其他衙役都早已成为教徒。¹⁰³ 纵然史书记载会有所失实、偏颇，但白莲教发展之快不可能不令清廷对天主教极其忌讳，深恐哪天天主教也像白莲教般起来暴动，因此天主教一有风吹草动，就先查禁而后快。尤其是嘉庆五年胡世禄教案的发生被疑为与白莲教徒有关，成为嘉庆十年教案发生的伏笔。所以清廷对天主教的禁教日渐严密。且往往是认为其“敛财惑众”，¹⁰⁴这与白莲教的影响不无关系。

¹⁰¹ 【法】谢和耐著，于硕等译：《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134 页。

¹⁰² 《戡靖教匪述编》卷十《陕甘楚豫述》。

¹⁰³ 芮传明：《淫祀与迷信》，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3 页。

¹⁰⁴ 在嘉庆时期有关天主教的奏章中，每提到天主教的“祸害”之处时，基本是指称其“敛财惑众”。参看《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第二章 嘉庆时期的教案

一、嘉庆五年贵州胡世禄教案

天主教大约在清前期开始传入贵州。贵州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偏处一隅，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天主教仍将其作为传教地区之一。贵州天主教传教史有着独有的特点，比如先有传教徒后有传教士。¹⁰⁵又因在地理上与四川接壤，所以与四川的传教活动联系密切。早期进入贵州的传教先生多来自四川，尤其是1777-1847年贵州教区成立以前的70年里，全部贵州教务都得依靠这些四川籍的传教先生。¹⁰⁶到了嘉庆元年，罗马第神父至龙坪场传教。《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记载道：“嘉庆元年（一七九六），有法国罗神父到贵州遵义、龙平场传教。那里的教友已增至80人……嘉庆三年，贵州全省共有教友600人，但半数是为准备入教的望教人。”¹⁰⁷因此可以说，贵州天主教的发展并不兴旺，再加上禁教政策的影响，到嘉庆五年入教者的数量反而有所下降。

1762年罗马教廷将贵州传教事务委托给负责四川传教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由博方济（又名范益盛，François Pottier）负责。博方济在稳定四川教务的同时，采取措施拓展贵州传教事务。他派遣雅拉里（Georges Alary）/梅耶（Jean Martin Moye）等法籍神父及孙本笃、孙莫尼加、胡世禄等国籍传教员（传教先生）先后到贵州活动，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贵州的天主教传播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正因为采用国籍神职人员传教，比较切合民众的实际，传教活动得以维持并稍有发展。¹⁰⁸但好景不长，嘉庆五年即发生了胡世禄教案¹⁰⁹。

嘉庆五年，贵州巡抚布政使常明奏称，于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访闻省城六广门外有川民胡世禄称西洋天主教创设经堂，惑众敛财，并有罗宋氏宣讲因果。民人罗忠、冯万粹、冷世爵、刘文元、周洪魁、吉文友接引传教吴林、韩朝贵、聂胜朝、曾福等听众入伙。¹¹⁰后于经堂内起获经卷二本、骨像一具。常明称，前因晓谕西洋人传教惑众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内地民人因祖父相传，持戒供奉，自当

¹⁰⁵ 明秀丽：《天主教在贵州的早期传播》，《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7月，第110页。

¹⁰⁶ 明秀丽：《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在在贵州早期传播异同论》，《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7月，第111页。

¹⁰⁷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173页。

¹⁰⁸ 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第97-98页，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¹⁰⁹ 《中华殉道圣人传》（台北教务协进会出版社2000年）中《圣张大鹏传道员》一节提到，胡世禄等人被抓的原因，是由于张大鹏受洗入天主教，遭到家人极力反对。其胞弟竟去官府诬告他是白莲教徒，胡世禄是教首，于是胡世禄等人便遭逮捕。

¹¹⁰ 《护理贵州巡抚布政使常明奏报申明胡世禄等设堂传习天主教首从各犯折》，载：《档案史料》，第813页。

勒令悔改，将呈出经卷等项销焚等。因此，胡世禄等人胆敢于省会地方设立经堂，传教惑众，实属目无法纪，并恐此外尚有别项不法情事，不可不严行究办以绝根株。经过供讯，得知此教案缘由如下：

胡世禄供认原籍湖广，寄居四川，并无父母兄弟妻室子女。因伊祖胡可珍存日曾奉天主洋教，后值身故，奉禁将经像留存邻妇罗宋氏家中。该犯来黔贸易，将本消折于本年正月内在罗忠铺内会见冯万粹、冷世爵、刘文元、周洪魁、吉文友各道贫难。该犯起意传教敛财。罗忠等各皆欣允。冯万粹并以家有空屋可建经堂，商令回川取经，于三月二十九日自川返省。先因罗宋氏孤寡无依。该犯勒令同来，并将该氏养老银八两借作盘费，许以得财清偿。同寓冯万粹后屋将中间改设经堂，择期四月十五日开讲。该犯呈大师长，罗忠等六人称为大徒弟，各出接引有附近民人吴林、韩朝贵及在黔贸易之江西人聂胜朝、曾福等徒入教，并出银数钱不等，称为小徒弟。夜聚晚散，奉诵经典即被访问擒获。¹¹¹

常明稟称，胡世禄胆敢以久干例禁之天主教，希图惑众敛财，妄称大师长，名目开堂诵经，夜聚晓散，聚众至十六人以上实属目无法纪，应照律问。实际上，胡世禄等人除了因为习教传教违禁之外，还因为当时白莲教徒有超过 500 人在贵阳附近活动，因此，常明认为“恐此外尚有别项不法情事”，大概就是担心胡世禄等人会与白莲教徒相勾结。但仍在未发现任何叛乱嫌疑的情况下，将胡世禄等一千人擒拿。

此案中特别要提一下的是罗宋氏，她生于乾隆八年（1743），圣名保纳。罗氏家族俱信教，在当地亦颇有势力。其夫家也信教。乾隆三十八年（1773）其夫亡，自此罗宋氏全身心的投入到天主教的传播上。乾隆四十九年（1784）罗宋氏与孙本笃神父前往达州传教，被捕入狱，后得出狱。嘉庆三年再往贵阳及遵义传教。¹¹²在此案中因为胡世禄抵罪，被遣返回四川。

因此对案中各人处置如下：胡世禄“应照左道惑人为首，律拟绞监候秋后处

¹¹¹ 《护理贵州巡抚布政使常明奏报申明胡世禄等设堂传习天主教首从各犯折》，载：《档案史料》，第 814 页。

¹¹²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罗宋氏》，第 151—152 页。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奏章中说罗宋氏年逾七十，应请免治罪；而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亦写道“1798 年，她（罗宋氏）年逾 70 岁，再到贵阳。遵义等活动”。但是方豪神父记载罗宋氏于乾隆八年，即 1743 年出生。1798 年时也不过 55 岁。方豪神父随后解释道“按氏生于乾隆八年，至嘉庆三年，亦仅五十六岁，黔疆诸证云：然此时罗宋氏已年高老迈矣。想系受苦所致”。方豪神父所记颇有道理。那个时期的人们，能活到古稀之年的已是不多，更何况当时传教之艰辛，而罗宋氏为传教到处奔波，是有可能未老先衰的。而不是真正到了 70 多岁了。

决”¹¹³。后改为终身监禁达 27 年。胡世禄在狱中也不忘传教，期间发展囚徒 30 余人，有“狱中堂口”之称。“胡世禄自进监后，大显热心，不怨不尤……，坚固在外之教友，在监内劝化数十牢犯崇奉天主”。¹¹⁴罗忠、冯万粹等人“听众入教已属罪有应得，乃复称为大徒弟，出外接引尤为不法，均应照为从充军例，发边远充军，仍照名例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照例刺字”¹¹⁵。吴林、韩朝贵、聂胜朝、曾幅等四犯，“虽讯系一时愚惑被诱，尚未辗转传授，但既经出银入教称为徒弟，便稍从宽贷惩，应请于罗忠等军罪上量减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分别口籍定地役满省释”¹¹⁶。罗宋氏“从前虽从胡可珍入教，后已奉禁停止，其由川入黔，后亦未传教授徒，年逾七十，应请免其治罪，遣回原籍，交保管束，无许再出滋事”。¹¹⁷此外还有对当地文物官员责任的议处。在本案中，因“系甫经起事，即行访擒。地方文武并未失察”。¹¹⁸

从该教案可以看出，首先，当时虽处于禁教之下，但天主教仍有发展，尤其在偏远地区如贵州，仍拥有信徒。而且为数不多的传教先生极力传播天主教。沙百里称：“中国的传道员们通过血的见证而为奠定其教会之基础作出了贡献”。¹¹⁹尽管这样，在当时禁教比较松弛的情况下，天主教在贵州的发展还是很艰难。其次，对犯禁之人惩处不轻，重至死刑，动辄发配边疆，轻者也要受杖，并勒令要求脱离天主教。乾隆末期对教案的处理，这种严厉性已见端倪，但还不至于如此。当时“内地民人有称神甫者，即与受其官职无异，本应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财物，审明后应拟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内地民人因祖父相传，持戒供奉，自当勒令悔改，即将呈出经卷等项销毁，照例办理，毋庸深究”。¹²⁰相比之下，胡世禄教案的处罚是十分苛刻的。这种苛刻也为嘉庆朝后来处置教案时所延续。对各涉事官员也有论处。本案中是因为“系甫经起事，即行访擒”，众官员才免去失察之责。但到了嘉庆十年以后就有详细的惩处条例。

随后贵州巡抚觉罗琅玕上奏，称：

“天主教名目由来已久，京城地方向有西洋人建立天主堂在内居住，

¹¹³ 《护理贵州巡抚布政使常明奏报申明胡世禄等设堂传习天主教首从各犯折》，载《档案史料》，第 815 页。

¹¹⁴ 《黔信芳踪·胡世禄老楞佐言行传》。转引自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第 112 页。

¹¹⁵ 《护理贵州巡抚布政使常明奏报申明胡世禄等设堂传习天主教首从各犯折》，载《档案史料》，第 815 页。

¹¹⁶ 《护理贵州巡抚布政使常明奏报申明胡世禄等设堂传习天主教首从各犯折》，载《档案史料》，第 815 页。

¹¹⁷ 《护理贵州巡抚布政使常明奏报申明胡世禄等设堂传习天主教首从各犯折》，载《档案史料》，第 815 页。

¹¹⁸ 《贵州巡抚琅玕奏为钦遵谕旨转飭将已获传习天主教人犯就案完结折》，载《档案史料》，第 816 页。

¹¹⁹ 【法】沙百里著，耿昇、郑德弟译：《中国基督徒史》，第 20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¹²⁰ 《高宗实录》卷 1219，第 5-6 页。

与别项邪教稍有区别，但究不应传习，有干例禁。常明将藉称天主洋教敛财惑众之首徒胡世禄等各犯擒获，只须就案完结。其听众传教入伙之徒未必即止于案内数人。但黔省系苗疆地方，若过事追究，则胥后人等以搜捕为名，从中勒索，转恐别滋事端，着传谕琅玕即将已擒获各犯按律办理，毋得过事搜求，致有牵连...皇上权宜轻重，绥靖边方之至意，伏查天主洋教由来已久。原与别项邪教不同，因其在省会地方设立经堂，敛财惑众，诚恐辗转传习，煽惑多人，自当严行查禁。今首徒各犯既已经擒获，即尚有听徒入教之人亦俱畏惧，若必过事搜求，黔省在苗疆诚如圣谕，恐胥后人等从众藉端勒索，转致酿成事端。”¹²¹

由此可见，当时上层官员对待禁教还是比较谨慎的。也有官员如觉罗琅轩辈，意识到“天主教由来已久，原与别项邪教不同”，查禁他的原因主要是“其在省会地方设立经堂，敛财惑众，辗转传习，煽惑多人”。也可以理解为，查禁的不是天主教本身，而是教徒习教传教的方式。其实觉罗琅轩等官员还是比较理智的，认为贵州地处苗疆，稍微处理不好又会引发民族矛盾。

二、嘉庆十年教案

（一）德天赐案

1、教案的起因

德天赐 (Adeodat de St. -Augustin)，意大利籍奥斯定会士，属传信部领导。“于乾隆三十四年来华，任奉宸苑卿，被赐予三品顶戴……嘉庆元年，供职圆明园制造钟表”。¹²² 关于德天赐教案的开始，《中国教案史》记载：“嘉庆九年有罗马教皇有赐书命供职钦天监教士毕学源，转任南京主教。该敕书送到澳门后，葡萄牙人罗泽礼士德等嘱华人教徒陈若望晋京递交。陈若望于该年九月抵京完成任务。在京教士们违犯‘凡在京西洋人未经朝廷许可不得擅行与外间通信’之禁，在陈南返时，托陈携带向澳门及本国函件，华人教徒也乘便托陈带书信。陈若望南下经江西时，竟以形迹可疑被捕。在行囊中查出一张由海道至直隶注有汉字的地方地图，及华人教士包罗柯 (Paul Ko) 书信一封，遂严究行踪。”¹²³ 《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写道，“嘉庆九年，教宗比约七世擢升在北京钦天监供职的毕学

¹²¹ 《贵州巡抚琅轩奏为钦遵谕旨转饬将已获传习天主教人犯就案完结折》，载《档案史料》，第 816-817 页。

¹²²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 177 页。

¹²³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 192-193 页。

源为南京主教。谕书送到澳门后，葡萄牙教士礼士德托广东的一个教友陈若望，赴北京递交。当年九月陈若望完成了任务，会见了德天赐神父。德神父正因直隶、山东一带传教上发生了一些纠纷，想向罗马传信部报告中国教务情况，便乘此机会把一张传教地图和信件交给陈若望，托他带至澳门，转呈罗马圣部。陈若望南下路经江南时，被江西巡抚秦承恩拿获……”¹²⁴

从以上记述至少可以看出：德天赐教案由陈若望替传教士携带书信和地图而起，他是违反前述西洋传教士信件来往规定而私人递送信件的，但《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作者不知何故并没有提起这点，但这一点很重要，这是陈若望被盘获的最主要原因；另外还可以知道陈若望所携带的信件和地图的内容有可能跟在华传教的各教派之间的竞争。上述记述仅仅只是说了德天赐教案的肇端，而且还不是很完整。因此，下面将对照《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中有关德天赐教案的史料，理清此教案的来龙去脉。

德天赐教案从嘉庆九年底开始。嘉庆九年十二月江西巡抚秦承恩奏称，据署臬司事盐法道刘澧禀称，峡江县知县和淦督同典史邓潮盘获广东新会县人陈若望一名，搜有西洋字书信十九封、汉字书信七封，并刻本天主教经卷等项。经检查，西洋字书信内夹有直隶广平府至山东登州府海口地图一张，汉字书信内夹有主教患病，商议接顶之人，并赵家庄的东西账本定要烧吊(掉)各字样。¹²⁵ 后经审讯，陈若望供称：

伊向在香山县澳门拜西洋人马诺为师，嘉庆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澳门掌教金安多呢给伊洋钱四十四圆，令送信至京，交钦天监监正索德超查收。九月二十九日到京，十月十二日索德超给伊盘费银十两、西洋字书信十九封、汉字书信七封，嘱交金安多呢分发，并给伊刻本天主教经卷带回自看。伊素不认识西洋字迹，不知所寄信内是何说话，因何夹有地图。等语。¹²⁶

此段供词中，最紧要的是“地图”。这是一张直隶广平府至山东登州府海口地理图，乃是在京传教士德天赐所托寄的。这张地图说它紧要，一方面对于当时各教派的在华传教士来说，这涉及到各教派的传教矛盾。虽然有说“所绘地图，无他用意，为求罗玛传教部，给本会修士，划分传教区域，惟此而已”。¹²⁷但是，

¹²⁴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177页。

¹²⁵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411 江西巡抚秦承恩奏报盘获西洋送信人犯陈若望解京申办折》。

¹²⁶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411 江西巡抚秦承恩奏报盘获西洋送信人犯陈若望解京申办折》。

¹²⁷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224页。

在华的各教派传教士时有传教地盘之争。“教士等唯视国籍为依归，而轻宗派观念。所以主持各堂教士的国籍在传教上必然发生抵触。……他们的斗争虽未表面化，但其内部矛盾已不可遏止。迨至直隶、山东两省的传教地盘问题发生后，其对立便表面化了。所以西堂当家德天赐在发生争执的地图上，加注各堂传教标记，欲呈送朝廷，以便取得本教派的胜利。¹²⁸那么，陈若望的被盘获，很有可能是其他教士的告密所致。¹²⁹

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于清廷来说，地形图涉嫌军事秘密。嘉庆七年时，曾有“西洋人索德超呈有英国战船逼近澳门蓄谋叵测”事件。¹³⁰索德超称，“英吉利国有大战船六只相近澳门停泊，恐有覬覦澳门情事。“英吉利之凶狡，在西无人不知，伊前于小西洋假买卖为由，已曾图灭一大国，名曰蒙告尔，初亦借一小地存驻，后渐人众船多，于嘉庆三年竟将此国吞噬”。¹³¹直到嘉庆九年十二月，即陈若望被擒前夕，仍有“两广总督倭什布等奏报英国王表内所称谣言离间之事已查清”的奏折，“谣言离间之事”即指嘉庆七年索德超称的“英吉利战船泊澳事件”。因此，在当时这种局势下，清廷没有理由不怀疑这张“地图”会跟英国战船有关。因而《中国教案史》记道，“官方疑此图系侵略计划，欲究真相，竟使德氏长跑达两小时之久，要其招认将此图寄送英国，籍以袭击山东”。“嘉庆帝睹此地图，大为诧异；盖因教皇绝无伸张权利至中国之野心与可能故也”。“既然中国明知教皇无伸张势力于中国的可能，遂转疑英国要得到有关中国的机密情况”。¹³²所以，清廷对此地图不能不重视，从而进行更深的搜查。

2. 教案的经过

陈若望被盘获后，传唤相关人等前去问话。首先是将向陈若望托带汉字书信赴澳门的赵若望、蒋怀仁、张明德三人传去。据此三人供称，他们“均系内地人，在西洋堂内办事佣工，从前俱曾到过广东贸易，与杨姓、金姓相好，缘陈若望于乾隆五十八九年间跟西洋人窦云山进京，是以彼此认识。上年九月间，陈若望又由广东至京，到北堂投信，与张明德相见，因将各信托他带回广东分致。等

¹²⁸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 197 页。

¹²⁹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 198 页。

¹³⁰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403 内务府大臣苏楞额奏据西洋人索德超呈有英国战船逼近澳门蓄谋叵测折》。

¹³¹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403 内务府大臣苏楞额奏据西洋人索德超呈有英国战船逼近澳门蓄谋叵测折》，附件《西洋人索德超等为英国发战船来澳事呈文》。

¹³²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 198—199 页。

语”。¹³³审讯官员仍不放心，又命这三人将所寄各信内情自行覆述，认为“均与原信相符，尚无别项违碍之处”¹³⁴。对于缴获的西洋字书信，则传西洋各堂西洋人前来识辨。其中李拱宸称，

“上年九月间接到澳门管事所雇陈若望送到的信，说现有西洋人色拉巴想要进京当差，并询问六年间同我到澳后，经患病之毕学源进京后是否病已全(痊)愈。等话。我随即写了回信，并写寄我父亲、叔父及问候朋友各信。又有各堂托带问候信函内，索德超亦有三件，俱交陈若望带去，曾给他盘费银十三两、洋钱一个。等语。并据各堂寄信之索德超等各自承认，均称系通候信札是实。”¹³⁵

审讯官员认为“在京天主堂之西洋人，俱系奏明来京习艺，其往来书信，例应官为收发谕送，不许私行托寄。今索德超、李拱宸等因陈若望回粤便捷托带书信，均属不合，应俟陈若望解到质讯明确，归案办理”。

¹³⁶

德天赐也被传唤，他供称其中所夹地图系他所寄。他称：

我是意达里亚国人，在西堂当家，此图内所开地方，俱有民人在我们各堂习教，因各堂规矩不同，恐到京时争论，所以分别标记。其有在西堂习意达里亚国教者，以一点为记，有在南堂习博尔多噶里亚国教者，以十字为记；有习吉斯帕尼亚国教者，以尖圈为记；其黑方圈系向有习教的人，此时已没有了。我要寄图与传教正管，使他知道某处住有某堂习教的人，以便来京的人到堂，不至争论。等语。¹³⁷

刑部官员仍不放心，传到在京学书之俄罗斯人四贴班伊完译出图内上方西洋字，均系各该国标记，确实与德天赐所供无异。但继续追问，地图从何而来。德天赐回答说，“系西堂旧有，我于当家后在旧字匣内检得的”。¹³⁸但刑部官员认为，

¹³³ 《军机处奏为连日臣等询问秦承恩所奏陈若望供出托带汉字书信之德天赐等人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 832 页。

¹³⁴ 《军机处奏为连日臣等询问秦承恩所奏陈若望供出托带汉字书信之德天赐等人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 832 页。

¹³⁵ 《军机处奏为连日臣等询问秦承恩所奏陈若望供出托带汉字书信之德天赐等人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 832 页。

¹³⁶ 《军机处奏为连日臣等询问秦承恩所奏陈若望供出托带汉字书信之德天赐等人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 832 页。

¹³⁷ 《军机处奏为连日臣等询问秦承恩所奏陈若望供出托带汉字书信之德天赐等人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 832 页。

¹³⁸ 《军机处奏为连日臣等询问秦承恩所奏陈若望供出托带汉字书信之德天赐等人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 833 页。

德天赐何由懂得图内标记，且自登州府至广平一路既有习教之人，究由何人传授，是否止此一路，抑或尚有别处，德天赐都不肯确凿供吐。而西堂前任当家颜诗莫则供称“从前并无此项图样”，其他西洋人也称未见过此图。因此审讯官员认为“德天赐曾蒙恩赏给六品顶戴，乃不安本分，私自寄信澳门，已属违例，且熟悉汉语，而所供写寄地图情节，始终含糊，难保别无隐情，应请旨将德天赐革去顶戴，交刑部详细研审”。¹³⁹

德天赐当时还是六品顶戴，此事发生后，即被“交左翼总兵文宁派千把一员在圆明园提督衙门暂行看管”。¹⁴⁰起初，德天赐还“一味回护，狡辩支吾”。后来将其跟役瞿喜、萧斌、吴永泰、黄德等查传到案，设法推鞫，并与德天赐质对。德天赐见势不能隐瞒，遂供称：

此图原是乾隆四十九年因传教犯事，业经治罪之梅神甫所遗。图内自山东登州至直隶广平府，又自曲阜至直隶景州，据系西洋传教地方近日各堂要争往传教，我想将此图寄回西洋，求教主传谕各堂，不许争竞，并无别意。至色罗柯向在登州一带传教，每年得西洋俸八十五圆。色罗是西洋传教，实名□若望，亦系传教名。□色罗柯去年还到过天主堂，如今逃往何处实不知道，至这陈若望亦系去年到京。各堂托他寄带书信送交澳门，不想被江西盘获。各书信内除所寄地图是求教主传谕，其余别信系音问，故套函无违碍，等语。¹⁴¹

刑部官员随后与陈若望对质，前后情节是与德天赐的供词相符的。德天赐又供称，

天主堂共有南北东西四堂。德天赐在西堂办事。四堂共有先生八人，内姜姓已故，颜姓、何姓、赵姓现在分赴外省传教。卢姓、尤姓、刘姓并镶黄旗汉军马甲周炳德现在各堂讲经讲道，管理一切传教事宜。又于嘉庆七年间讲海甸杨家井地方旧有西洋人寓处一所改为圣母堂，分男女两堂，男堂会长六人，已故张廷贤、在逃之杨姓呈现擒之刘相栋。廷畛、朱长泰，内务府正白旗闲散。现在畅春园看门之汪茂德，女堂会长民妇陈杨氏各讲经传教，每月男女来堂念经。¹⁴²

随着德天赐供出的一干人等，涉及的人数也在扩大。同时案子的中心由最初的可

¹³⁹ 《刑部奏为审拟西洋人德天赐私自托人寄送书信一案折》，载《档案史料》，第834页。

¹⁴⁰ 《谕著将西洋人德天赐交左翼总兵载圆明园暂行看管》，载《档案史料》，第831页。

¹⁴¹ 《刑部奏为审拟西洋人德天赐私自托人寄送书信一案折》，载《档案史料》，第836页。

¹⁴² 《刑部奏为审拟西洋人德天赐私自托人寄送书信一案折》，载《档案史料》，第835页。

疑的“地图”，逐渐转移到暗中传习天主教的教民身上了。当这些教民一个接一个的被供出之后，案情开始扩大了。刑部的注意力已完全放到了追究教民上了。其后又究出“习教之西堂代认汉字先生山东人王世宁、直隶景州人吴西满、山西平遥县人张明禄、山东临清州人简恒、直隶威县人尹思敬、正蓝旗汉军马甲佟恒善、佟明，养育兵佟四，正黄旗汉军马甲蔡永通等”。“分别查传行提去后，旋据各该处先后将先生周炳德、王世宁、会长刘朝栋、赵廷畛、朱长泰、汪茂德、陈杨氏，习教之吴西满、张明禄、简恒、尹思敬、佟恒、佟善、佟明、佟四、蔡永通，江西拿获之寄信人陈若望及包罗柯，即柯永福之弟柯添福押解到部，并声明包罗柯即柯永福远匿无踪。颜姓、何姓、杨姓、刘姓、赵姓、卢姓、尤姓亦均躲避未到”。¹⁴³

虽然德天赐的口供与陈若望的口供相符，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免去惩处。嘉庆十年五月初九日的一份上谕中对此案中各人及管理西洋事务大臣有详细的处置。这份上谕中，首先指出“西洋人信奉天主教，在该国习俗相沿，原所不禁，即京师设立西洋堂亦只因推算天文备用西法。凡该国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栖止。原不准与内地民人往来滋事”。¹⁴⁴其中提到“德天赐胆敢私行传播，训明习教各犯，不惟愚民妇女，被其煽惑，兼有旗人亦复信奉，并用汉字编造西洋经卷至三十一一种之多。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辟异说而杜歧趋”？¹⁴⁵而且“该国原系书写西洋字，内地民人无从传习。今查出所造经卷俱系刊刻汉字，其居心实不可问，此在内地愚民已不应传习，而旗人尤不应出。此关系人心风俗者甚巨”。¹⁴⁶因此，犯事者均加以处置，甚至管理西洋事务的大臣也受到惩处。其处置如下：

德天赐，“以西洋人来京当差，不知安分守法，妄行刊书传教，实为可恶，该部奏请或飭令回堂，或遣回本国，均属未协。德天赐着兵部派员解往热河在厄鲁特营房圈禁，仍较庆杰随时管束，毋许与内地旗民往来交涉，以杜煽惑”。¹⁴⁷

寄信人陈若望，“在堂讲道致函俊周炳德、会长民人六朝栋、赵廷畛、朱长台、汉军汪茂德，或往来寄信、或辗转传感，着照刑部所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仍先用重枷号三个月，以示惩戒”。¹⁴⁸

¹⁴³ 《刑部奏为审拟西洋人德天赐私自托人寄送书信一案折》，载《档案史料》，第835页。

¹⁴⁴ 《内务府大臣缙布等奏为常福等失察旗人习教请从重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846页。

¹⁴⁵ 《内务府大臣缙布等奏为常福等失察旗人习教请从重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846页。

¹⁴⁶ 《内务府大臣缙布等奏为常福等失察旗人习教请从重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847页。

¹⁴⁷ 《内务府大臣缙布等奏为常福等失察旗人习教请从重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847页。

¹⁴⁸ 《内务府大臣缙布等奏为常福等失察旗人习教请从重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847页。

民妇陈杨氏，“以妇女充当会长，尤属不安本分，着发伊犁给兵丁为奴，不准折枷收赎。民人简恒曾代为寄信，请人传教汉军佟恒善，经反复开导，执迷不悟，俱着枷号三个月，满日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¹⁴⁹

周炳德、汪茂德、佟恒善，“既自偕根本甘心习学洋教，实不齿于人类，均各销除旗档”。¹⁵⁰王世宁、柯添福等人“一经晓谕即情愿出教，尚知悔过，应行省释，但恐该犯等因一时畏罪饰词，未必出于至诚，仍着该管旗籍各官严加管束，如敢再行传习，即加倍治罪”。¹⁵¹

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常福，“于德天赐寄信、刊书、传教等事未能先事查察，着交内务府议处。其失察旗人习教之历任都统副都统等，着军机大臣查明，奏请交部分别议处”。¹⁵²议处结果，本来“失于查察者，应罚俸一年，此案应请从重，将常福罚俸二年，至派出管理西洋堂事务之会计司郎中经文造办处郎中阿尔邦阿不能常川稽查，以致德天赐刊书传教滋事，自应一并议处，请将经文阿尔阿各罚俸三年”。¹⁵³

该上谕还要求“该堂存贮经卷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派员检查销毁，毋许存留。其刊刻板片并着五城顺天府布军统领衙门一体查销，并出示晓谕军民人等此后倘再有与西洋人往来习教者，即照违旨例。从重惩究，绝不宽贷”。¹⁵⁴

3、教案的影响

德天赐教案的最大影响，莫过于让嘉庆皇帝和官方了解到即使在禁教情况下，居然仍有众多民人暗自习教，甚是包括有旗民。甚至这些习教者私行编印刊刻板片书籍。并且定期聚集诵经，互相之间还有联络人。况且这还仅仅是直隶、山东等靠近京城的地方的情况，内地广阔的区域只怕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使得“嘉庆如大梦初醒，觉得问题极为严重”。¹⁵⁵于是，对禁行天主教传播更为严厉，也因此接二连三的牵涉出其他教案来。其中对习教旗人的查禁首当其冲。

佟澜案：德天赐案中发现有不少旗民习教，随即对旗民进行访查。查出佟澜一家等习教。佟澜为旗人，任正蓝旗汉军步军校。朝廷对旗人习教治罪更甚。佟澜案中也涉及不少人，其中有佟澜妻子儿女，旗人额勒登保、李庆喜、色克和舒

¹⁴⁹ 《内务府大臣缙布等奏为常福等失察旗人习教请从重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847页。

¹⁵⁰ 《内务府大臣缙布等奏为常福等失察旗人习教请从重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847页。

¹⁵¹ 《内务府大臣缙布等奏为常福等失察旗人习教请从重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847页。

¹⁵² 《内务府大臣缙布等奏为常福等失察旗人习教请从重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848页。

¹⁵³ 《内务府大臣缙布等奏为常福等失察旗人习教请从重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848页。

¹⁵⁴ 《内务府大臣缙布等奏为常福等失察旗人习教请从重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848页。

¹⁵⁵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179页。

敏等人。佟澜供称：

我系正蓝旗汉军庆存佐领下委署步军校，年四十七岁，我家有继娶的女人范氏，年二十八岁，生有一子，名伊与阿，年九岁。三个女儿，长女大妞，年二十四岁；次女四妞年七岁，三女五妞，年三岁。自我祖佟士相、父佟福俱习西洋教。我七岁时，我父母先后物故，我自幼就跟随我父亲入教，时常到天主堂磕头。至入此教，无别故。不过不敢作奸盗邪淫之事，死后可以飞升。我妻子儿女亦俱入教，今蒙传问，我不愿出教，等语。¹⁵⁶

后佟澜、李庆喜同供，自伊祖入教迄今三辈。舒敏、色克同供自伊父入教迄今两辈。他们称：

习教“俱系祖父相传，并无另有师傅。各该犯之妻子兄弟亦俱随同入教。只知天主劝人行好，所以举家倾心遵奉，并不知道是有干例禁之事。本年五月初闻被拿到官，当堂劝我们出教。我们实因被惑已深，一时未能醒悟，不肯出教，并说天主尊大，不敢违悖，实是我们糊涂该死。后来提督合本旗都统将我们备奏送部，又经部里再三开导，我们才知醒悟。我们世受国恩，又系现任职官，听受西洋人的摇惑，甘心入教，实是上负皇上天恩，下给旗人丢脸。我们俱愿痛加改悔，断不敢稍存阳奉阴违之心，自取重罪等语。并即当堂脚踏天主十字，其出教之心似属出于至诚。臣等并询以汝等妻子儿女，均系同教，汝等一人不过因现在到官，恐怕治罪，随口应承，及至放回家内，自然仍与妻子兄弟供奉天主，未必举家大小真心实意一同出教。据会供，我们入教的人不许贴门神灶王，不许供祖先，不许上坟，这是一定教规。我们回去即赶紧贴供门神灶王祖先，并按季上坟，这就是反教凭据。我们是当家人，不怕家中众人不改，只求派我们本管备佐领等不时严查，如家中尚有一人不肯出教，即求拿送治罪，等语。¹⁵⁷

从佟澜、李庆喜、舒敏和色克等人的供词可以看出，他们习教都是从祖父辈传沿下来的。相信信奉天主教死后可以得到飞升。他们都是合家大小一齐信奉天主教。被查获之后，都称不知有干例禁之事。而且都情愿当堂脚踏十字架来表示出教之心。并且信教之后不贴门神灶王，不供祖先，不上坟。

¹⁵⁶ 《内务府大臣缙布等奏为常福等失察旗人习教请从重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847页。

¹⁵⁷ 《大学士董浩等奏为审拟旗人习教一案各员已知悔改可否施恩免罪请旨折》，载《档案史料》，第857页。

佟澜案在德天赐案之后不久，当时还没有制定出对违禁之人的具体治罪专条。本应按照德天赐一案中所治罪方法处理，“将坚心奉教不知悔悟之各旗人奏请消除旗档，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¹⁵⁸但刑部随后奏称：

惟该犯等一经到部，即知悔悟，且系伊等祖父流传，各该犯俱以幼小无知，随同入教，审讯之下，不但顿悟天主之谬妄，并能各知祖父之前非，似与始终执迷不悟者情节迥不相同，可否仰邀皇上格外恩施，宽其既往……¹⁵⁹

上谕给予的处置是：

据刑部奏称，佟澜等到案俱各供认情愿出教，请革职免其治罪等语。佟澜等均系旗人，且任职官，(车+敢)敢背弃根本，学习洋教，现虽难据供明真心改悔，但恐因一时畏罪，求免伊等。全家久为邪说所惑，一经释放，或仍私相崇奉，其言殊难凭信。佟澜、色克、舒敏、李庆喜仍着在刑部羈禁，将伊等家属传至，令其当面告诫，各将洋教不祀祖先，不供门灶等事全行改革，仍交各该旗查明伊全家出教属实，由该管备佐领具结祥报，再行释放。如释放后复敢私行习教，即加倍治罪，绝不宽贷。¹⁶⁰

并且派人到佟澜等家内查看是否有供奉祖先，张贴门神、灶神。勒令该旗对佟澜等人严加管束：

如敢复蹈故辙，私行习教，或与西洋人往来交结，该都统等即行据实奏明。一面锁擒交刑部加倍治罪。倘该都统等视为具文，不加查察或询隐不辩设，别经发觉，必将该管之都统、副都统及参领、佐领等严加议处。至管西洋堂事务大臣亦当留心访查。如佟澜等仍潜赴西洋堂私相传习，即着奏闻办理，设稍有疏忽，亦治以应得之咎。¹⁶¹

图钦、图敏案：图钦、图敏俱系苏努曾孙。雍正年间发生苏努教案¹⁶²，其地

¹⁵⁸ 《大学士董浩等奏为审拟旗人习教一案各员已知悔改可否施恩免罪请旨折》，载《档案史料》，第857页。

¹⁵⁹ 《大学士董浩等奏为审拟旗人习教一案各员已知悔改可否施恩免罪请旨折》，载《档案史料》，第857页。

¹⁶⁰ 《奉旨著将佟澜等仍在刑部羈禁待查明其全家出教经详报再行释放》，载《档案史料》，第858页。

¹⁶¹ 《大学士董浩等奏为审拟旗人习教一案各员已知悔改可否施恩免罪请旨折》，载《档案史料》，第856页。

¹⁶² 关于苏努家族教案的研究，陈垣先生和方豪神父多有考究，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三册（大象出版社2001年）中巴多明的信函也有详细记载。苏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四世孙，与雍正帝是从昆弟关系。苏努曾担任过诸多要职。有13子，其获罪时（雍正二年）存11子。这11子中就有9人受洗，成为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因康熙晚年有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穆敬远（Joannes Morao, 1681-1728, 1700年来华）曾卷入皇位继承权斗争中，曾上疏奏请册立第九皇子为皇储，结果却是第四王子雍正继位，因而此事深刻地影响了雍正对天主教的态度。苏努家族获罪有可能时雍正并未将政治斗争与信教分开对待。苏努家族教案还可参见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孙尚扬、钟鸣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之《第二章 传教与禁教》。

位由宗室降为红带子。关于二人的情况，南弥德曾有详细记载。二人的洗礼名叫 Michel 及 Rachael，皆习教于北堂。尤其是图敏，曾居住北堂达五六年之久，担任说教传道之职。¹⁶³嘉庆十年八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中称图钦、图敏“本属罪人子孙，理宜安分守法，乃敢私习洋教，经该部再三开导，犹复始终，执迷不悔，情殊可恶”。¹⁶⁴因此对二人“着革去红带子，并于玉牒内除名，发往伊犁。枷号六个月，再行充当折磨差使”。¹⁶⁵案中涉及到的魁敏、倭什布，“亦坚称不愿出教，甘心受罪，着销去旗档，发往伊犁。着枷号三个月，再行充当折磨差使”。¹⁶⁶而图钦等四犯“自外生成，情同背叛，俱永远不准释回。并着该将军不时稽。如该犯等或在配脱逃，及有别项滋事之处，即行恭请王命正法”。¹⁶⁷奏折中称，“该犯等现尚未押解到，因即行令乌鲁木齐（鲁字有口字边）都统奇臣转饬，沿途严行押解到伊犁，钦遵谕旨，先行各与枷号伊犁，惟铜铅两厂差使较苦矣。枷号满日分发铜铅厂处所，充当折磨差使。奴才留心稽查该犯等，倘有脱逃及别项滋事之处，即遵训谕，一面奏闻，一面恭请王命正法示惩”¹⁶⁸。

相比佟澜等四家人，因为图钦、图敏等人经反复开导，仍然不愿出教，而被认为是“如此背逆之人，实勘痛恨”。¹⁶⁹图钦、图敏等人因而受到如此重的惩罚。《中国教案史》还认为，所以受到严罚，除有宗教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政治上的憎恨。¹⁷⁰而《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则认为，“自苏努至图钦、图敏，已历四世，经过雍正、乾隆、嘉庆三个迫害天主教的朝代，而始终不余遗力地信守天主教规，宁死不背，真实一门壮烈之家”。¹⁷¹

¹⁶³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 207 页。

¹⁶⁴ 《伊犁将军松筠奏为钦奉上谕办理习教获罪宗室图钦等人枷号及分拨折磨差使折》，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 876 页。

¹⁶⁵ 同上，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 876 页。

¹⁶⁶ 《伊犁将军松筠奏为钦奉上谕办理习教获罪宗室图钦等人枷号及分拨折磨差使折》，载《档案史料》，第 876 页。

¹⁶⁷ 《伊犁将军松筠奏为钦奉上谕办理习教获罪宗室图钦等人枷号及分拨折磨差使折》，载《档案史料》，第 876 页。

¹⁶⁸ 《伊犁将军松筠奏为钦奉上谕办理习教获罪宗室图钦等人枷号及分拨折磨差使折》，载《档案史料》，第 876 页。

¹⁶⁹ 《伊犁将军松筠奏为钦奉上谕办理习教获罪宗室图钦等人枷号及分拨折磨差使折》，载《档案史料》，第 876 页。

¹⁷⁰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 207 页。早在雍正五年的上谕中就指出“今日为佛诞之期，恰遇西洋国使臣上表称贺（按指葡萄牙使臣来朝）……向来僧道家极口诋毁西洋教；而西洋人又诋毁佛老之非……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如苏努之子乌尔陈等，愚昧不法，背祖宗，违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岂不怪乎？”如今事隔三代，苏努家族中仍然有人如此坚定的奉教，清廷当局似乎有些恼羞成怒。

¹⁷¹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 185 页。

（二）李如案

嘉庆十年十月，又发生了李如案。李如一案，并非是德天赐一案的余波，而是事发于山西民人李如从澳门接引若亚敬赴山西传教，在途中被查获所引起。当时山西阳曲县民人李如即亚立山，在香山县属澳门地方接引西洋人若亚敬，欲赴山西传教，并雇也信教的船户麦丙忠载送，同行陪伴的还有倪若瑟，不料在途中被擒获，还起出番字经卷。

这李如原是山西阳曲县人，有已故伯祖母李梁氏向习天主教，李如祖父李玉章、父李纲及伯祖李阶、族人李玉粮等，均同入教，李如亦自幼传习。嘉庆六年间，李如贩货至广东南海县属地方贸易，碰上原籍福建迁居南海县的倪若瑟素习天主教，往来熟识，并有新兴县船户麦丙忠曾载送李如生理，亦学习礼拜。

嘉庆十年三月内，李如至香山县属澳门地方买货。当时澳门建有天主堂，李如赴堂观看，碰巧遇到西洋人若亚敬，共谈习教之事，故李如起意接引若亚敬赴原籍山西传教，若亚敬应允。四月十九日，李如回至南海县属佛山地方，先雇麦丙忠船只，言定送至乐昌县地方交替，给与船价番银二十圆，并让倪若瑟伴送至湖南地方，许给工银十圆，麦丙忠、倪若瑟各皆应允，李如当交倪若瑟番银五圆，嘱其先赴麦丙忠船内等候。是月二十二日，李如复至澳门，向若亚敬告知，若亚敬剃头易服，装作内地民人¹⁷²，效带经卷随同李如雇坐不识姓名人小艇，于二十七日行抵佛山，走过麦丙忠船内开行。若亚敬一路捏病躺卧舱内，五月初七日将至韶关，李如恐关役盘查，令倪若瑟坐船过关，自同若亚敬上岸，由僻路遶过韶关，等候倪若瑟船到，仍同下船开行。当时广州府及南海、香山各县访闻派差追捕，知会前途协缉。哪知十一日，李如等船至乐昌县河面，即被各该差役同乐昌县典史方琮拏获，起出番字经卷。

经过提审，李如供认前情不讳。但他仍坚称，其学习天主教，只是为了礼拜吃斋，悔过劝善，冀图消灾降福，并无充当神甫及不法别情，甫经接引若亚敬欲赴山西传教，即被拏获，也没有煽惑多人情事。同时若亚敬也称，西洋人习教不

¹⁷² 乾隆时期就有种种禁令，防止传教士潜入内地及内地民人与海外的关系。乾隆十三年有发布上谕明确指出“内地民人潜往外洋例有严禁。今吕宋为天主教聚集之所，而内地民人竟因与同教多潜彼地。……嗣后务将沿海各口私往吕宋之人及内地所有吕宋吧黎往来踪迹，严飭访查，通行禁止。”（《大清十朝圣训》，《高宗圣训》卷 279，《访边疆》3。）乾隆二十二年又强调指出：“如市侩设有洋行及图谋设立天主堂等事，皆当严行禁止。”（王之春：《清朝柔远记》，第 103 页。）乾隆四十九年的教案就是因为 4 名西方传教士由中国教徒护送潜入内地，而在途中被抓获，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大搜捕。此处李如让若亚敬扮作民人，也是明知违禁而为之。

过劝善改过，是以随同接引前往传教冀立功德，实无别项情弊。其在澳门天主堂内充当和尚，亦止在堂吃斋礼拜，并无与民人辗转传教之事。矢口不移，似无遁饰。查核译出番字经卷，只系鄙俚虚诞之词诱人传习，尚无违悖字句。澳门夷目亦禀复，伊等俱系小西洋人，现获若亚敬籍隶大西洋¹⁷³，在澳门天主堂居住，其如何听从李如潜赴内地传教，并不知情。并据倪若瑟、麦丙忠均供不愿出教。¹⁷⁴

此次又因为没有治罪专条¹⁷⁵，刑部只得参考乾隆五十年对西洋人吧地哩¹⁷⁶教案的处理¹⁷⁷和德天赐一案的处理¹⁷⁸对李如进行定罪。¹⁷⁹

因此，此案对李如最为严厉。其罪名是“以内地民人，辄敢违禁学习天主教，复接引西洋人若亚敬复山西传教，几致辗转煽惑，殊属不法，应如该督等所奏，应照陈若望之例，用重枷号三个月，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而倪若瑟和麦丙忠二人，“违禁习教，复听从引送。适经擒解到官，尚敢坚不出教，殊属怙恶，未便于李如罪上减一等，拟徒亦应如该督等所奏，应即照民人入教，拟发烟瘴，例杖一百，发极边烟瘴充军，至配所折责安置，仍勒令出教”。¹⁸⁰

而对若亚敬的处理，因有德天赐案在前，是否也要像德天赐一样，将其“解往热河，在厄鲁特营房圈禁”。¹⁸¹但刑部称“热河厄鲁特营房并非圈禁夷人之所。本年办理德天赐一案，奉旨解往圈禁，因德天赐系钦赐职员，在京当差，与夷人潜赴内地传教者不同，特蒙格外天恩，不得援引为例”。¹⁸²故“应请援照吧地哩

¹⁷³ 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04—105页对“大西洋”有详细解释：《明史·佛郎机传》：“其时大西洋人来中国，亦居此澳。”故将葡萄牙称为“大西洋”，而将果阿称为“小西洋”。16世纪葡萄牙人来华入住澳门。特别是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到澳门后，“大西洋”、“西洋”等词再不是对东南亚及印度洋诸国的泛指，也不是今天所言“大西洋”及“西洋”的意义，而有其特指，即专指葡萄牙。若亚敬应为葡萄牙籍传教士。

¹⁷⁴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419 两广总督那彦成等奏报拏获接引西洋人欲赴山西传教主犯李如申明定拟折》。

¹⁷⁵ 对违禁天主教的治罪专条直到嘉庆十六年才制订。

¹⁷⁶ 即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映神父（Jean de Sassari），1782年后由罗马传信部派往湖广传教。

¹⁷⁷ 乾隆五十年对吧地哩映案的上谕道：西洋人吧地哩映等私入内地传教，经各省查拿，解到交刑部审拟，定为永远监禁。今念该犯等究系外夷，未谙国法，若令其永禁囹圄，情属可怜。所有吧地哩映等俱着加恩释放，如有愿留京城者，即准其赴堂安分居住，如情愿回洋者，着该部派员押送回粤，以示矜恤远人，法外施恩至意等因。

¹⁷⁸ 寄信人陈若望，着照刑部所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仍先用重枷号三个月。德天赐着兵部派员解往热河，在厄鲁特营房圈禁管束。

¹⁷⁹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当好等奏为遵旨奏议欲接引西洋人赴山西传教一案各犯申明定拟折》，载《档案史料》，第882—883页。

¹⁸⁰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当好等奏为遵旨奏议欲接引西洋人赴山西传教一案各犯申明定拟折》，载《档案史料》，第883页。

¹⁸¹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当好等奏为遵旨奏议欲接引西洋人赴山西传教一案各犯申明定拟折》，载《档案史料》，第884页。

¹⁸²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当好等奏为遵旨奏议欲接引西洋人赴山西传教一案各犯申明定拟折》，载《档案史料》，第884页。

映等成案办理。或留于广东省永远监禁，或监禁一二年后再行释回”。¹⁸³ 最后因为要“以示矜恤远人，法外施仁至意”。所以“留于广东省监禁三年矣，限满后，遇有西洋人回国之便令其携带回洋，不必永远监禁”。¹⁸⁴

案中各人也受到治罪。内地民人麦丙忠、倪若瑟得受番银，照追入官。李如所供原籍习教之李玉量等，移知山西抚臣查拿究办。倪若瑟之兄倪高振有无习教，已饬南海县严行查办。¹⁸⁵ 对于缴获的经卷，也已经销毁。并晓谕：

“澳门地方系西洋夷人聚居所，建天主堂，免其拆毁，以示怀柔。

仍出示晓谕，毋许民人私自入堂习教，并严饬夷目禁止夷人，毋得传教。”

186

三、嘉庆十年后教案

（一）直隶杨继承案

嘉庆十一年三月十二日，都察院佐都御史臣英浩等人上奏，称在顺天府宛平县桑峪村，有村民杨继承代伊祖杨文进以教党协谋诬诈陷害事赴其衙门具控。后加审讯，据杨继承供称：

“我本村有龙王庙，早年被天主教火焚，合村呈报，不许伊等奉教在案。嗣后伊等奉教如前，内有我已故叔祖杨文韬，亦奉其教。我祖杨文进恐其株连，勒令出教，彼此争殴。为伊党指伤具控，将我祖问拟充军八年，我祖遇赦得回，畏见伊党，不敢即出口文，嗣因我伯祖母病故，教首张文成来家劝我祖厚葬，以表节孝。我祖因家贫，指所种麻物，托伊向麻商贾有义处抵借钱文，以为殡葬之费。诘借得钱文，尚未发殡，伊即劝我祖请伊党念天主教经，并令入教。我祖坚不肯从，致相口角。伊即主使教长张文工以逃犯告我祖。即到县，呈出回文路票，蒙县释放完案。不料伊又设计串害。旋使张文工之兄张文高捏控我祖，指教讹诈伊等钱文。张文工假作过付杨继宗，冒充麻商。张文成为证，当堂诬赖，不容分辩。知县随将我祖囚禁在监。案已八月有余。我父到监送衣，亦

¹⁸³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当好等奏为遵旨奏议欲接引西洋人赴山西传教一案各犯审明定拟折》，载《档案史料》，第 884 页。

¹⁸⁴ 《奉旨若亚敬一犯著即留广东省监禁三年待限满遇有西洋人回国将其遣回》，载《档案史料》，第 885 页。

¹⁸⁵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当好等奏为遵旨奏议欲接引西洋人赴山西传教一案各犯审明定拟折》，载《档案史料》，第 884 页。

¹⁸⁶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当好等奏为遵旨奏议欲接引西洋人赴山西传教一案各犯审明定拟折》，载《档案史料》，第 884 页。

被锁押官店，后不知去向。并据供，该村向有天主堂，未经拆改，现在尚有习教数十家，并设有男女教首名目，恳求究办等语。¹⁸⁷

杨继承案的起因，从上述口供看来，应是习教的以张文成为首的一方，跟不信教的本案主控方杨继承之间的钱财纠纷。杨继承祖父曾经因为劝说习教村民出教而被先行诬告，以致充军八年，后遇大赦才提前回家。又因杨继承伯祖母病故，以所种麻物像麻商贾有义抵借钱文作为殡葬费用。而张文成等人又权杨继承祖父为其念天主教经及入天主教，杨继承祖父不肯，遂张文成等人便指使人去诬告其讹诈他人钱文。继而杨继承祖父被捕下狱。杨继承父亲到监狱送衣服也被扣押，后来居然不知去向了。得知这一案情，英浩等人认为，“查杨文进先托张文成借贷，继因不肯入教，诬为讹诈，其中虚实不难质讯完结。至内地编氓崇奉天主教。迭奉谕旨严谨在案，宛平近在辇下，何以该村尚有天主堂未经拆改，并有习教民数十家，及男女教首名目，是否实有其事，抑系该民人藉词抵制，均不可不严行究办，应请旨飭交顺天府，提集教首人等审讯”。¹⁸⁸ 杨继承一案发生在京城近郊宛平县，而且是德天赐教案之后一年，朝廷颇为重视。

四天之后，文宁、周廷栋等官员前往桑峪村查案。文宁等人先查都察院奏报的杨继承的供词。他们认为“系为钱债”，“供词内则指张文成、张文高、张文工为西洋教首，并称该村有天主堂男女习教者四十余家等语，张文成等三人为案内紧要人犯，而该村习教男女人数众多，若缉捕韶涉声张，不惟要犯恐致潜逃，且村民亦未免惊扰”。¹⁸⁹因此，文宁等人“当即不动声色，率同司官带领役数人，星夜前往。于十三日行抵桑峪村。该村距京城一百七十余里，山径祈请，仅通人迹”。¹⁹⁰他们所见到的情况是“村内居民百十户。村东有房一所，即杨继承所称习教男堂，又有女堂一所，即与男堂毗连。……堂内并无经卷板片，亦无西洋供像，惟壁间有旧设龕座痕迹”。¹⁹¹于是文宁等人复向杨继承询问，经堂何时拆去。杨继承称他实不知道，只求问张文成等就明白了。随后将张文成、张文高、张文工陆续擒到。据张文成供，“小的自祖上即传习西洋教，这个天主堂是旧时供奉

¹⁸⁷《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善等奏为宛平人杨继承呈控天主教民诬陷其祖案请交顺天府审办折》，载《档案史料》，第 891—892 页。

¹⁸⁸《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善等奏为宛平人杨继承呈控天主教民诬陷其祖案请交顺天府审办折》，载《档案史料》，第 892 页。

¹⁸⁹《步军统领文宁等查拿宛平县习教人犯张文成等将其交刑部审办折》，载《档案史料》，第 893 页。

¹⁹⁰《步军统领文宁等查拿宛平县习教人犯张文成等将其交刑部审办折》，载《档案史料》，第 893 页。

¹⁹¹《步军统领文宁等查拿宛平县习教人犯张文成等将其交刑部审办折》，载《档案史料》，第 893 页。

西洋神像，习教念经之所。因上年六月间，闻得禁止西洋教，又有本村民人杨继承之祖杨文进要去首告我们，心中害怕，同习教的人四十余家俱各出教，将经卷、供像俱已焚毁，并将龕座拆去。张文高、张文工供亦相同”。¹⁹²文宁等人“复飭番役赴张文成家中严密搜查，亦并无收藏经卷画像等物”。而“杨继承所称习教之四十余家门首，亦俱粘贴门神对联。其为从前习教，现已出教，似属可信”。但是文宁等人又认为现在根据“杨继承指张文成等为西洋教首，张文成等亦自认从前习教不讳，其是否未尽悔改，抑系杨继承因钱债挟嫌牵控习教旧事，均须彻底根究”。¹⁹³后张文成等人被解送刑部审理。

（二）四川教案

嘉庆十年教案也波及到了四川。随着常明上任总督，奉中央禁教指令禁教，四川一省的教案明显增多。张泽在《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一书中写道，“常明在四川普遍激起了反教运动”。¹⁹⁴可以看出，常明任内发起的教案情况。而秦和平在《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中这样评价常明：“在常明观念中，天主教等同于邪教；信徒的传教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敛钱牟利。以此论推，教徒因为贫穷缘故而要设法敛钱，要设法敛钱就假借传教。正因为天主教与其他邪教类同，大师长、大徒弟、小徒弟等其他教派常见之名目，亦被常明借用强加其上。这样的认识既表现出常明的偏执无知，亦反映其好作非非的联想，观一点而不及其余。因此，我们对尔后常明在四川将禁教行动扩展到无孔不入境地的状况也就不会感到惊诧了。”¹⁹⁵早在嘉庆五年贵州胡世禄教案中，就已经看到常明对教案处理的严厉手段。当时胡世禄被判以绞监候；罗忠、冯万粹、冷世爵等人则被分配到黑龙江，给所伦达呼尔为奴；而仅仅是信教的吴林、韩朝贵、聂胜朝、曾福等人则被处以杖一百徒三年的徒刑。而且胡世禄教案中的这些惩处条例还被后来处理教案的官员所援引。

常明在四川处理的比较有影响的教案至少有三起。在常明到任之前，四川也是教案不断的。受嘉庆十年教案的影响，四川也有些动静，地方官员奉中央指令查禁天主教。从嘉庆十年五月德楞泰的一份奏折中可以看出，当时四川还有王作

¹⁹² 《步军统领文宁等查拿宛平县习教人犯张文成等将其交刑部审办折》，载《档案史料》，第893—894页。

¹⁹³ 《步军统领文宁等查拿宛平县习教人犯张文成等将其交刑部审办折》，载《档案史料》，第894页。

¹⁹⁴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188页。

¹⁹⁵ 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8月，第228页。

经、王世贵作乱。奏折中说道，

“王作经、王世贵二逆遁无踪日久，尚未弋获，且王作经乃襄阳老教师，虽不若樊人杰等之著名，然亦为贼中首恶。诚如圣谕，若令漏网偷生，必致又滋勾结。……前在军营，屡经设法查擒，迄无踪迹。回省后又复严谕地方文武上紧巡辑，以期早绝粮株。昨因太平、大宁与陕楚连界处所，探有贼踪。……据守备陈安邦派出会哨弁兵，至方家园地方有贼数人潜匿，一见官兵尽弃衣物，并幼孩一名，亡命狂奔。该弁兵等询问幼孩，名唤杨药保子，甫经被挟，不知贼匪姓名。据供，只有四人遁去，当即追缉，无踪。于第二日搜至鹤子岩，见一贼自缢身死。查验右手左太阳等处，均有伤痕，身穿蓝布衫，六件经杨药保子辨认，即系四人之一，遂割取首级，与杨药保子，并贼弃矛杆三根，铜罐菜筒等件，呈验到营。该弁兵等仍即前往……必须缉获此人，永除后患……再西洋人私入内地传习天主教，本干例禁。……四川省地方流传日久，人数必多，自应一体禁止。下见查办亦不宜过急，恐地方官奉行不善，转致弊窦……先为出示剴切晓谕，凡有习教之人，无论城市山林、穷乡僻壤，宽立限期，准其改悔投首。倘逾限仍复执迷，即当严行究办。至西洋人踪迹往来向多诡秘，近年来亦难保无教师潜入川省，煽惑愚民，此则必须严缉。奴才现又面谕两司，密饬地方州县，均各不动声色，认真访查。如有潜藏境内之西洋人，一经擒获，即免其失察之咎。倘不实力查擒，别经发觉，定当从严惩处，亦不得假手吏胥，甚至挨户稽查，致滋扰累所……¹⁹⁶

从上段材料可以看出，其实王作经、王世贵大概是别的民间宗教的什么头目，也株连到了天主教上。官兵抓来抓去，总算擒获一自缢身死的贼人以及一名称被挟持的小孩。回过头来又联想到以前的种种教案，风声鹤唳。不过只要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发展情况，就很容易理解四川官员为何会如此紧张。

明末清初天主教开始传入四川。初为法国“耶稣会士利类思司铎首先入川传播福音”，¹⁹⁷继有安文思司铎由浙江杭州来川，襄助传教事务，他们“不惟在成

¹⁹⁶ 《成都将军德楞泰奏为遵旨晓谕令教民出教并访查传教之西洋人折》，载《档案史料》，第861—862页。

¹⁹⁷ 【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第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都宣讲福音，并且往保守、顺庆等处虔救人灵”。¹⁹⁸1702年，有传教司铎4人来川。他们在成都购买房屋，以“作传教处所”，在安岳也有住址，“且有圣堂”。重庆、成都等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不但传教成都省垣，亦传至川西、川南各地”。1713年，又有日尔曼人费隐、法兰西人潘如二司铎奉康熙之命，以钦差身分“派往四川绘图”，四川地方官绅“迎接如礼，声威浩大，远近皆闻”，有趋炎附势者“欣羨莫名，遂亦奉教”。天主教从明末清初传入四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清嘉庆年间，已经具有一定的势力。天主教在四川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户为单位，全家人集体成为教徒，这样既符合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又便于对外的隐蔽性。¹⁹⁹

再来看看四川的禁教情况。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及其发展，自然是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不安。他们为了维护统治秩序，从“关系风俗人心大政”着眼，于1711年康熙开始对“借教为恶的”不法教民一律查拿，并以“诱污妇女、诬骗病人目睹”等作为宣传，“特制律定罪”²⁰⁰。雍正继位后，仍然奉行禁教政策，乾隆时更是严加取缔，1757年实行闭关政策。嘉庆时期，也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仍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明令禁止天主教。因此，这一时期，西方教会的传教活动只得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到了1810年被传教士称为“视教若仇”的川督常明札饬重庆府全力查禁天主教的时候，又成为四川禁教的一个转折点。

另一方面，清廷也是多次下令，要求严厉在川禁教。嘉庆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上谕提到，“西洋人私入内地传习天主教，自当严行查禁该省于乾隆十九年、四十九年曾经两次擒获西洋人犯。伊等行踪诡秘，实难保无潜匿内地私行传教之事。该督当饬令地方官随时查访，如有西洋人私入境内逗留煽惑，即应擒获办理，其内地人民如果有开堂聚众代为传教情事，亦应查擒示惩。若乡愚无知，误为所惑，止于习教诵经者随处皆有。该督等只当出示剴切晓谕，令其弃邪归正，自可渐知改悔”。²⁰¹因为嘉庆十年德天赐教案的发生，朝廷虽然加大禁教力度，但也不想过分闹大。通常会采用“认悔”的方式劝谕习教之人改悔，也即重视教化，而不是滥用刑法。因此，这份上谕也说道，在京城办理禁教，多用“出示剴切晓谕，令其弃邪归正”的办法，而“习教之民人悔悟自新者颇多”。所以谕令“该

¹⁹⁸ 【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第5页。

¹⁹⁹ 刘君：《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论》，《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

²⁰⁰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第一卷。

²⁰¹ 《寄谕四川总督勒保等著饬令地方官员严查私传洋教晓谕教民弃邪归正》，载《档案史料》，第868页。

省亦可遵照妥办理”。如果过事搜查的话，就会使得地方胥吏乘机藉端滋扰，“非将真正传教之犯受贿卖放，即向平民讹诈诬擒，转致屡屡受累殊有关系”。²⁰²这也看出嘉庆皇帝对待禁教事实上还是比较理智的，从对下面嘉庆十年成都华阳县教案的批示“总应严缉传教首匪，余者自悉”²⁰³亦可看得出来。

(1) 嘉庆十年成都华阳县教案

从这份奏折来看，当时是“研习教者随处皆有”，未曾发现西洋人私入境内逗留煽诱以及内地民人开堂聚众代为传教之事。而且地方官多是“阳奉阴违，并不妥为查办”。只能是“密派妥员，分投察访”。对于成都这样的省会地区，自应是首先查办。遂查得

“成都华阳两县习教者共四十余人，内有雷应春等五人自奉文查禁以后，即已改悔，惟有郑崇等四十人犹复观望，迁延并未悔改。奴才随飭该管道府督同两县亲传郑崇等到案，敬宣恩旨，反复开导，宽其已往之愆，予以自新之路。郑崇各环跪叩头，会称伊等愚昧无知，误干法纪，今蒙剴切指示，实在感悔无及，情愿痛改前非，永远出教，并于亲友中互相劝谕，勉为盛世良民，各具连环保结存案。惟王庭佑一名，其始不肯出教，当即加以刑责，亦即畏惧依从，具结改悔，如再违犯，愿甘加倍治罪等情。由道府两司具祥前来。奴才查郑崇等止系信奉茹斋，并无刊刻经卷板片，亦无开堂聚众之事。今既具结改悔，其情词甚为真切。自应遵旨免其深究。至王庭佑始虽未从，继即改悔，尚知畏法，仍交地方官留心察看，如敢再蹈前辙，即应从重治罪”。²⁰⁴

其实这也只是一个小教案了。因并未有人被判死刑或者被流放到黑龙江，情节不是很严重。奏折还称“以省城目下情形而论，办理似有成效，其余外府州县，亦有数处稟复者，或称并无其人，或亦各知改悔，从此不动声色以次查办。俾远近传闻知改悔者，得免刑法，不予株求，自能渐就悔悟，互相警戒。……又通飭各州县，均当照此妥为办理。倘境内或有西洋人潜入逗留，以及本地民人称为教师名目，并有开堂聚众之事，必当查擒严办，断不可稍事姑息，以正人心而端风俗”。

205

²⁰² 《寄谕四川总督勒保等著飭令地方官员严查私传洋教晓谕教民弃邪归正》，载《档案史料》，第869页。

²⁰³ 《四川总督勒保奏为遵旨查办天主教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889页。

²⁰⁴ 《四川总督勒保奏为遵旨查办天主教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888页。

²⁰⁵ 《四川总督勒保奏为遵旨查办天主教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889页。

(2) 嘉庆十六年巴县和渠县教案

据《圣教入川记》一书的记载，四川许多州县都有天主教徒，尤以川东地区为多，并已发生了民教冲突。《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伦》写道，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历程，可以从清代巴县档案记载的 1818 年何深海一案中得到详细的解答。何深海自供从外祖父开始，其家族三代相传习教，都是全家人集体入教。其父死后，墓碑上刊有十字架，并刻有天主教碑文，云：“我卢江氏其父字荣章，至先皇始闻正道真传，深信三一之玄妙，严遵二五之规诫，谨守其规不懈，迨是时合室老幼大小去左道而向真，咸受神洗之恩于开蜀之士鉴牧穆若翰，斯时如聋而听，如盲而明。”²⁰⁶从此可见他们受教义感化之深，也可窥见其宗教传播的继承性。《圣教入川记》也载：渠县“全境教民一千五百余名”。²⁰⁷他们与当地群众发生冲突，“外教人民各处修补寨子”，以求自保，并有渠县天主教徒“谋叛”的传闻，清朝地方政府“派委员三人前往调查”。由此看来，巴县和渠县是天主教传播的重镇。传习天主教历史颇长。到了常明任总督的时候，在巴县和渠县掀起了大教案。

嘉庆十六年，常明上奏，“上年到川访闻，仍有转相传授附和 Learning 之人，而川北顺庆府属之渠县，川东重庆府之巴县较他处尤为甚。川民五方杂处，气习浮动，若容有此邪说，莠民煽惑，其间不独为害风俗人心，且恐日久人众，蔓延不已，不可不亟行查办。当经大书告示札发通属，凡穷乡僻壤遍行张挂，俱用浅近易解之词，谕以情理，晓以利害，并令地方官督率本地绅耆，随时随地反覆开导，使见者闻者即使猛省。限三个月内赴该管眼们投递出教悔结，经卷图象尽数呈缴，不许假手吏胥，致丝毫纷扰，…又一面实力举行保甲稽查，各项匪人有习教者即可查出。到官呈首，其已悔之户，日后别人犯案，绝不株连，以便习教之人勇于悔改，不敢匿讳”。²⁰⁸

这样子查办，就将渠县查出来了。据渠县知县薛天相禀报，“访得县属地方有王思胜等传习天主教，人数较多，商议择日做会念经，地方绅耆不能劝阻，不相下，恐滋事端。现在驰往弹压劝谕等语。……恐该县一人所办未能周妥，拣派在省之酉阳州知州章凯、候补知县王衍庆会同该管顺庆府知府盖方泌亲赴渠县，

²⁰⁶ 四川省档案馆藏清代巴县档案，嘉庆二十三年巴县禀文。转引自刘君：《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伦》。

²⁰⁷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第 83 页。另，渠县有天主教徒是在 1890 年左右。第一位奉教者是董朝贵。随后又有某先生由重庆到渠县，教新教友等经典道理，又有某传教神父到来付洗。于是教务兴旺，未有风波阻也。1805 年后先后有万家、杨家、王家等入教。到 1819 年左右，大人领洗者已有 265 人，领初恩者达 562 人以上，总计渠县全境教友 1500 余名。见古洛东：《圣教入川记》，第 82—83 页。

²⁰⁸ 《四川总督常明奏为查办天主教大概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 908 页。

查照事谕，事理督同妥办”。²⁰⁹查办的结果是“有周超珑、熊履安、张学圣等一百八十七户到案投悔，踩踏十字架，呈缴经卷牌位，具结在案，又有楚兴富、杨春荣、董文现、周显荣、王文斗、王学纯六名，初尚未肯具悔，解省后旋即改悔出教”。²¹⁰这样的结果表明，渠县习教之兴盛。这 187 户还仅仅是自动到案投悔的，想来还有那些藏匿不报，应该是远远大于这个数目的。到最后，“先后具悔出教者共有 634 户”。而巴县的情况也毫不逊色：“巴县具悔出教者共有 214 户，该处为天主教传习最盛之区。经此番认真查办，可便悉数剪除”。²¹¹另外“其余各厅州县亦据陆续俱报，赴官具悔呈缴经卷牌像者已有 1214 户，通计悔教者共有 2026 户，均有册结姓名呈送可据”。²¹²从以上查办的结果侧面的反映了当时渠县、巴县地方甚至整个四川地方天主教传播的程度。

在没有外籍传教士或华籍传教士的组织下，一些地方天主教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这些教徒往往是世习家传，以家族为单位转相传授，父传子、夫传妻、主人传给仆人等，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私自刊刻经文板片，或者是“外来教师在本境开堂念经转相传授之事”。因此这些教民所受到的惩治也不是很重。因此，常明称“今既真心具悔，自应仰体圣慈，不加深究。除熊履安、张学圣等八犯另有应议，诬控罪名容奴才咨部核办外，其余当即概与省释。又王思胜、杨予才等六犯抗不悔改，当即提省督同两司，将该犯等集案讯究。先经割切劝导。据供，信奉天主只图求福，并未犯法，不愿悔改等语。遂加以刑责，仍复顽梗如初，毫无悔俱。实属藐抗不法。王思胜等六犯应请查照嘉庆十年刑部查办天主教成案，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为执迷不悟者戒”。²¹³

常明认为，渠县和巴县两地习教的查办是有成效的，因此只要“宽假期限，从容劝悔，备全属地方不致再有习教之人，而该民人等习见改悔者，并不苛求梗化者，立遭严谴，加以官绅劝谕，保甲搜查”，就会造成“不敢不悔，不得不悔之势”。²¹⁴同时，常明仍然“密饬各地方官在已经具悔民人中择明白能言语者数人，给予食费，令其四处劝悔，此辈气类相通，其言易入，即令相率赴案呈悔，

²⁰⁹ 《四川总督常明奏为查办天主教大概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 909 页。

²¹⁰ 《四川总督常明奏为查办天主教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 909 页。

²¹¹ 《四川总督常明奏为查办天主教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 910 页。

²¹² 《四川总督常明奏为查办天主教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 910 页。

²¹³ 《四川总督常明奏为查办天主教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 909 页。

²¹⁴ 《四川总督常明奏为查办天主教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 910 页。

始终不许任用一差一役，查唤滋扰”。²¹⁵常明这个手段，的确是厉害的，以“具悔民人”去“劝悔”，自会比官府饬令悔教效果会强的多，而且也是教化为先的做法。

（3）嘉庆十九年王幅²¹⁶捏造准奉天主教文报图骗报钱案

此案还是颇具特色的。并不是一般的查禁天主教的案子。应该说是一起利用天主教发展的闭塞性进行的诈骗案。先来看看具体案情。据麟水县知县吴秀良禀报，该县于嘉庆十九年七月内稽查保甲，擒获湖南衡山县民王幅并川民蒋洪、李大学三犯。在王幅身边搜出抄文报条并提塘木刻照票等件。查阅后发现王幅捏造抄文一纸，内称四川提塘奉上谕，各省行文，各奉天主教并牵涉上年闰月及河南滑县之事。吴秀良称都为“妄肆狂言，阅之不胜发指”。因此当即将王幅提解到省严讯。当时南充县查出谢允清习教擒案，并在谢允清家起获天主经卷一本，同王幅等先后押解来省。检阅谢允清所存经卷，尚无违悖语句。后署藩司按察使陈若霖、署臬司盐茶道瞿成辑、成都府李口栋等当堂令王幅默写原稿，对比字迹相符，遂严加询问。

王幅乃湖南衡山县人，幼时随其祖父学习天主教，后又学习刻字匠生理。嘉庆十九年三月间，王幅游荡来川，在麟水县地方，贫难度日，听说当地向有学习天主教，经屡次查禁改悔者甚多，其有尚未悔教之家，必然不愿查禁。起意假充提塘报差，捏称奉文准奉天主教，向习教者报喜，骗钱使用。于是买木板私刻提塘铃记一颗，并报条照票板式各一块，用纸刷印盖，用伪造铃记，欲往习教之家报喜。因不知何家习教，适会遇南充县民蒋洪、池县李大学，亦系在外游荡。王幅遂遇交好，哄称伊充提塘报差，现在奉文准奉天主教。嘱蒋洪等探听习教之家，前往报喜。并许诺将骗得钱财分摊。蒋洪等人不信，王幅又告以假造报条实情，蒋洪等人贪利应允。遂探有南充县住家之谢允清平素习教，引令王幅同往报喜，王幅送给谢允清报条一纸，谢允清不甚深信，仅给王幅钱三百文。王幅将骗得钱文与蒋洪等分。蒋洪等告以探有习教之家，再行相邀，即分路各散。王幅亦即患病。适王幅病愈，忆及谢允清不肯深信其事，骗钱无多，又独自起意捏造上年钦天监推算闰月错误，果有河南滑县教匪之事。今因钦天监推算不错，加官升职，

²¹⁵ 《四川总督常明奏为查办天主教情形折》，载《档案史料》，第910页。

²¹⁶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148—149页有王幅传。但只有两段。称“四川别有教友王幅壮烈殉教，其事迹仅见于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一八一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内阁所奉上谕，教会中西文史书无只字提及”。“……王幅世习天主邪教，竟敢捏造谕旨，煽惑愚民……”。但今所见到材料与此出入较大。

行文各省准奉天主教。上谕一道盖用假造四川提塘木戳，冀图习教之人听信不疑，多给钱文。遂找见蒋洪等，复令其引路报喜。蒋洪等均不知有捏造抄文情事。

当蒋洪二人行至隣水县古家场地方，刚巧碰到该县稽查保甲，于是心虚逃跑，被差役等擒获，因而被押解到省审讯。审讯官员认为，今王幅又捏造准奉天主教文报骗钱，自因习教者尚多，其诬骗应不止谢允清一人。得钱亦不止此数。更恐另有传教之人潜匿在川，支使王幅捏造报喜，以为煽惑地步。蒋洪等既知王幅假差报喜，何以于王幅编造文报，独不知情？均须彻底究根，复加严诘。而王幅坚称，委因穷若无聊，伊自幼曾学天主教，是以自己起此意，想并无另有传教之人主使，控报情事。因不探出何人习教，故止骗得谢允清一处。至蒋洪等骗钱之后，即分路走散。适伊编成文报，即被擒获，蒋洪等实不知情。²¹⁷

上述中谢允清是一位习教者，被王幅、蒋洪和李大学三位无业游民所骗。王幅也是曾习过教的，因此对当时的禁教形势有所了解，否则也不会想出对教民诈称宽禁习教而要钱文的主意。王幅知道当时是仅止传习天主教的，而习教者只能是暗地偷偷传习，最期望的自然是在官府能弛宽禁教，于是这种心理便被王幅所利用。王幅便唆使蒋洪等人去探查习教之人，结果得知谢允清素习天主教。于是便盯上了谢允清。但是王幅自制的报条使谢允清不甚相信，只给了王幅三百文钱。事后王幅觉得骗钱无多，遂又起意再次“捏造上年钦天监推算闰月错误，果有河南滑县教匪之事。今因钦天监推算不错，加官升职，行文各省准奉天主教”的情节，准备再去骗谢允清，不料遇上稽查保甲，被抓获。

常明处理的结果是王幅被判死罪。常明认为“此案王幅，学习天主教已属大干例禁，乃该犯复游荡来川，先则私刻铃记报条，捏称准奉天主教，向谢允清骗得钱文，继复编造上谕抄文，希图耸人听闻，藉此渔利，自应按律问拟，王幅合依诈为制书者，斩律应拟斩监候，照例刺字”。²¹⁸“(王幅)编造文报，胆敢牵连上年滑县教匪，并捏称推算闰月，煽惑乡愚，狂悖已极，未便日久稽诛，应请旨即行正法”。²¹⁹

²¹⁷ 《四川总督常明奏报拿获捏造准奉天主教报图骗钱财之王幅等审拟情形事折》，载《档案史料》，第1018—1021页。

²¹⁸ 《四川总督常明奏报拿获捏造准奉天主教报图骗钱财之王幅等审拟情形事折》，载《档案史料》，第1022页。

²¹⁹ 《四川总督常明奏报拿获捏造准奉天主教报图骗钱财之王幅等审拟情形事折》，载《档案史料》，第1022页。

(4) 嘉庆二十年朱荣、童鳌和唐正珏教案

嘉庆二十年二月常明又一次上奏。奏折开篇便总结了其在四川的禁教成果：

“……于十五年到川，知川省习教人多，即经飭属查办，除将抗不悔教之犯照例治罪外，其悔教者共有二千餘户，又有续行具悔者二百餘户，于十六、十七等年，先后奏明在案。近年来，各属禀报尚有具悔之人，并有抗不具悔治罪者，是地方官查禁虽严，而此教总未能改除淨尽。细加察访，竟有冒称西洋神甫、鉴牧名号，来往乡村诱惑愚民习教，尤应严擒惩办，以期淨绝根株。节经檄飭各属，于稽查保甲之时，按户跟查去后。旋据宜宾县会同灌县拏获传教之朱荣即朱奥斯定一名，金堂县拏获传教之童鳌即童神甫一名。又据成都、华阳、宜宾、彭县、金堂、崇庆、涪州、巴县、綦江、泸州、乐至等州县，先后拏获习教不悔之唐正珏等三十七名，及前因习教发遣释回复犯之张万效一名。又到案具悔之唐正林等三十二名，并自行投悔之周广盛等七百四十一名。禀报前来”。

220

常明在禁教上的确是不遗余力。他对天主教的禁教手段之严厉，打击范围之广，惩罚手段之重，可能在当时的官员之中可谓无出其右。的确，嘉庆中后期四川的教案基本上是常明严厉禁教的成果。无怪乎张泽神父在《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中居然写道：“四川总督常明谨遵皇帝旨意，严办天主教，深得嘉庆皇帝欢心，但据当时西教士记述，他不久未得善终。”²²¹“不得善终”大概可看出教会人士对常明的评价态度。

此案中，因为周广盛等人“既系自行赴案具悔，自应遵旨概予省释”，至于朱荣、童鳌，“均系传教要犯”，而唐正珏等，“或系抗不具悔，或系到案始行具悔，均应提省讯明，当即分别札飭遵办”。遂将“朱荣、童鳌及唐正珏等共 72 犯，连呈缴及起获之经卷共 53 本、十字架共 620 个、念珠 3 挂、图像 4 轴、教衣 2 副、教帽 2 顶，一并解解来省，由委员审拟勘详”。²²²常明随即督同两司提犯覆讯，案情缘由如下：

朱荣系贵州婺川县人，自幼来川行医度日，并无住址。乾隆四十八

²²⁰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30 四川总督常明奏报拏获传习天主教人犯审明分别定拟缘由折》。

²²¹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 199 页。

²²²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30 四川总督常明奏报拏获传习天主教人犯审明分别定拟缘由折》。

年在天全州地方会遇西洋人冯若望，拜从为师，冯若望给伊经卷，并教衣一副、教帽一顶。五十年，冯若望破案解京审办时，未将该犯供出。嘉庆十九年六月间，该犯在宜宾县与云南大关厅连界之落难沟地方贸易，会遇该处曾经奉教之唐正珏，彼此谈及学习天主教可以生前受福，死后升天，即商同检出旧藏经卷，在唐正珏家从新诵习。朱荣遂以奥斯定²²³为己名号，先后劝诱唐光勋等入教，经该县陆成本访问，会营亲往查拏。其时，有自粤来川之徐姓，自称鉴牧名号，亦至唐正珏家，闻风先遁，当将唐正珏、唐光勋、唐光林、黄帼栋、梁善等拏获究出，该犯等均逃至崇庆州灌县一带地方，随会同该州县将该犯及唐正明、唐仲、唐大超、戴廷义、戴廷志、戴廷仁、戴廷璋一并拏获，起出衣帽、经卷、十字架等物。并据华阳、乐至等县将刘千仕、何贵元缉获解审。其余年廷德等七名，一闻查拏即赴县具悔，呈缴十字架，经该县取结保候。此朱荣起意传徒及在逃被获之原委也。²²⁴

童鳌的情况则如下：

又童鳌一犯，系福建上杭县人，乾隆年间曾往广东贸易，在澳门搭船到小西洋地方，拜西洋人铎德明额儿为师，给有经卷、圈像，并教衣一副、教帽一顶，在彼逗留十有馀年之久。四十九年，该犯来川小本生理，因天主教系犯禁之事，久未诵习。嘉庆十九年九月间，该犯搬至金堂县地方居住，因年老不能贸易，又无子嗣，忆及铎德明额儿曾言如能广传此教，即死于官法，灵魂可升天堂，起意传教。随将昔年携回经卷检出念诵，并将图像供奉，当有吴白太、袁世顺、柳存相并邹开鸿等多人被其哄诱，先后拜从习教。该犯自称神甫名号，设坛念经，即被该县崔景伊访知其事，会同营汛将该犯并吴白太、袁世顺、柳存相拏获，起出图像、经卷、衣帽、十字架等物。其余邹开鸿等二十四人，均闻拏赴案投首，呈缴十字架，取结保候。此童鳌起意传教，旋即被获之原委也。²²⁵

应该说，童鳌自供基本描述了其历年活动的情况，但也隐瞒了不少重要的事实。

²²³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199—203页有赵斯定传。“赵斯定，原姓名为朱荣，一作朱晏，又作朱洪、朱斯定，晋升司铎时改姓赵。朱荣本为婺川县差役。梅神父（Moye）在川视察教友被捕入狱。即在狱中讲道。狱吏听梅神父讲道者，有若干人被说服，朱荣即其中之一。梅神父出狱，朱荣曾亲送数里。朱荣之改姓赵，实由对其晋升司铎地位表示尊敬。因为“朱”与“猪”谐音，川省地区称司铎为“爷”，如仍用朱姓，称呼起来实为不雅，故改姓。

²²⁴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30 四川总督常明奏报拏获传习天主教人犯申明分别定拟缘由折》。

²²⁵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30 四川总督常明奏报拏获传习天主教人犯申明分别定拟缘由折》。

如，童鳌在乾嘉之际曾多次到安岳等地活动，长期居住在刘嗣坤家中，主持宗教活动。像童鳌这样的教徒积极分子，其天主教活动是不会少的。他于嘉庆六年（1801）参加天主教“崇庆会议”一事也没有供出。可谓是避重就轻，搪塞官府，掩护天主教活动。²²⁶

另外，此案涉及的其他人也供认前情不讳。仍有不少人是不愿改悔的。“吴白太、袁世顺、柳存相三犯供认，拜童鳌为师，不愿悔教。又据唐光勋等八犯供认，俱拜朱勋为师，不愿悔教。……惟黄迁书、陈允生、徐文魁、李德耀四人供明系冯若望传授，前经改悔，近始复习。此内唐正珏、柳怀德等 26 人及发遣释回复犯之张万效，均称传习已久，不愿改悔”。另外以吕润海为首的 28 人，均称情愿改悔。²²⁷

最后判决结果如下：

朱荣即朱奥斯定、童鳌即童神甫，明知天主邪教查禁甚严，乃敢私立名号传徒惑众，均属愍不畏法，朱荣、童鳌均应照例拟绞立决；

其抗不改教之唐正珏、唐光勋等 38 人，均应照新例改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仍照例刺字；

张万效年已八十，杨曾氏、夏周氏系属妇人，均例应收赎。惟张万效系乾隆四十一年接引西洋人李多林传教案内问拟发遣，减释收赎之犯，乃不知悔改，仍复习教，应与执迷不悟之杨曾氏、夏周氏均不准其收赎，以为甘心惑溺者戒；

唐光林等到案后始行改悔，亦应照例问拟，唐光林等 32 人，均应照例杖一百、徒三年，各至配所折责充徒；

彭崇良、张正元，于讯供后病故，应无庸议。其闻攀改悔之周广盛等 741 名，业经照例省释，应免其查议。经卷、图像、念珠、衣帽、十字架，案结销毁。而在逃之徐鉴牧，分谕邻省，并严饬各属查缉务。²²⁸

常明最后称，“川省幅员辽阔，山居人户散处畸零，此等传教匪徒行踪又极诡秘，倘耳目稍有不周，即现称真心悔教之人，一经诱惑，亦难免阳奉阴违，复行传习，且恐竟有西洋人潜匿其间，暗中煽惑，尤不可不严防密访。奴才现又剴切出示晓谕，并督饬各属，将已编之保甲，不时挨户清查，周而复始，使民间知

²²⁶ 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三），《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 5 月，第 53 页。

²²⁷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30 四川总督常明奏报拏获传习天主教人犯申明分别定拟缘由折》。

²²⁸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30 四川总督常明奏报拏获传习天主教人犯申明分别定拟缘由折》。

天主邪教断为律法所不容，并非查办一次即可了结，庶可格其非心，端其趋向，以仰副我皇上崇正黜邪之至意”。²²⁹从这些字句中完全可以看出常明对禁教的狂热程度。他从贵州禁教，直到四川。先前贵州胡世禄教案中，“像常明这样严厉处罚天主教徒的事例，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如此重罚程度，连嘉庆皇帝也感到有些过分。事后，常明因为此事及其他问题并发而暂时丢了乌纱帽”。²³⁰但是又正因为像常明这样力行禁教，对稳定统治是有一定作用。

（三）贵州嘉庆十七年顾占鳌、周正敖、刘开泰教案

嘉庆五年常明对胡世禄等人的严厉惩罚并未能够阻止天主教在黔省的传播。嘉庆十七年二月户科掌印给事中臣何学林上奏，称“惟贵州地本荒僻，最易藏奸，近有天主教及拐贩两种匪徒渐积渐多。臣隶籍贵州，既有所闻，不敢隐匿。夫天主教者，本川省无赖之人流入贵州，遂尔纷纷传习，闻在各乡聚集数十人及百余人不等，而省城之北门外尤甚。此等习教之人，废弃伦常，抛荒正业，其食用则谎诱愚民或偷窃财物。地方官亦时查禁，但行之不力，且为胥役包庇，即有欲行严拿者，彼人多又恐激成事变，故宁置而不问不闻”。²³¹何学林的奏词估计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播情况，似乎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官府中还有胥吏包庇，地方官也不愿多事，置之不理。何学林的奏章可能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指使贵州有关官员严查天主教传习。

嘉庆十七年三月，贵州巡抚臣颜检即上奏，因“在苗疆控驭访维，最关紧要，是以臣于到任之后，诚恐有外来匪徒潜居境内，煽惑滋事，当即严飭文武员弁，随时留心查擒究办。嗣准部咨行，令严禁天主邪教并将所定新例钞录移咨到臣。当即剴切出示晓谕，并容飭各地方官悉心访擒”。²³²去后便据贵阳府知府鲁习之、贵筑县知县陈熙祥称，十六年九月初十日，访闻省城北门外有民人顾占鳌在于周正敖家设立经堂传教。廖庭级、张大鹏、曾老大听从学习，并邀约周正敖、朱必荣、刘开泰、李庭发等人入伙”。²³³当即会同营员前诣周正敖家，查该处距城二十余里，地方荒僻，只有隣佑朱必荣一户。在于经堂内起获经卷二本，天主牌位一块，又于张大鹏家起获天主牌位一块，其余各家并未安设牌位，亦无不法字迹。

²²⁹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30 四川总督常明奏报拏获传习天主教人犯申明分别定拟缘由折》。

²³⁰ 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四）》，《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8月。

²³¹ 《户科给事中何学林奏请查禁天主教折》，载《档案史料》，第975页。

²³² 《贵州巡抚颜检奏报审拟顾占鳌等设堂传习天主教案首从各犯折》，载《档案史料》，第977页。

²³³ 《贵州巡抚颜检奏报审拟顾占鳌等设堂传习天主教案首从各犯折》，载《档案史料》，第977页。

张大鹏、曾老大逃匿无踪²³⁴，先后将顾占鳌等擒获祥报。²³⁵

经严讯，得知顾占鳌与廖庭级并在逃之张大鹏、曾老大彼此交好。顾占鳌贩卖布匹生理。嘉庆五年川民胡世禄来黔传习天主教，敛钱惑众，黔民罗忠、冯万粹等 10 人听从入伙。顾占鳌与罗忠间壁居住，走至罗忠家探望，见罗忠有天主教经卷，向借两本回家阅看，并未入教。顾占鳌旋即出外贸易，未将所借经卷送还。

嘉庆十五年二月，顾占鳌贸易回归，因病家居，取经阅看，见所载俱系劝人为善，时时诵习，可以获福免灾。于是便私自在家诵习。数月其病即痊愈，遂敬信不疑。八月，廖庭级至顾占鳌家探望，顾将经卷给予，令廖庭级携回诵习。廖庭级遂在家持诵。张大鹏、曾老大闻知，亦先后向顾占鳌借阅诵习。

嘉庆十六年五月，廖庭级等人至顾占鳌家闲坐，顾占鳌想起经内所言传习一人即为一功，若满白人，死后即登天堂，起意商同廖庭级等邀人入教诵经，廖庭级等应允。顾占鳌的好友周正敖住处偏僻，房屋宽敞，只有隣佑朱必荣一户。因此便想在周正敖家设立经堂，遂往邀周正敖。朱必荣入教，周正敖等允从。顾占鳌书写天主牌位，挂于周正敖家内。廖庭级邀约刘开泰、李庭发二人，张大鹏、曾老大邀约张德旺、李老三等人入教，一共 14 人，自六月半起，每月七日皆至周正敖家诵经一次。顾占鳌、廖庭级、张大鹏对众讲解。

不久即遭到该府县访擒，起出经卷牌位，周正敖等人先后被严讯。周正敖、朱必荣等人自认愚民无知，希冀邀福，不知有违禁令，叩头哀求，踩踏十字，情愿出教。而顾占鳌和廖庭级坚称，既已奉教，不肯违悖，情愿认罪。²³⁶

在当时缺乏教士的情况下，居然仍有信徒自学自传教理，并自行组织礼拜诵经。这也反映出信徒习教的自立性。由于长期禁教，没有神职人员前来传教，处于偏僻地方的教徒只能是自传自习。在或以血缘关系或以地缘关系形成的自立性习教群体。比如，顾占鳌等人习教，即是找个小房子（朱必荣的房子）一月一次自行念送，其传播方式虽然不正规，但这种精神恐怕正是天主教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

²³⁴ 张大鹏曾逃往四川重庆，但徐德新主教劝他回贵阳领导，即便有难也不该离开。张大鹏遂回贵阳。嘉庆十九年被捕，嘉庆二十年被处以绞刑。至 1900 年 5 月 7 日由教宗良十三世宣为真福。见《中华殉道圣人传》，《第三节 圣张大鹏传道员》，第 80—95 页。

²³⁵ 《贵州巡抚颜检奏报审拟顾占鳌等设堂传习天主教案首从各犯折》，载《档案史料》，第 977 页。

²³⁶ 《贵州巡抚颜检奏报审拟顾占鳌等设堂传习天主教案首从各犯折》，载《档案史料》，第 977—978 页。

颜检遂根据嘉庆十六年御史甘家斌上奏的天主教违禁处罚条例，对顾占鳌等人进行判决：

顾占鳌合依传教，煽惑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拟绞监候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

廖庭级听从入教并转邀刘开泰等二人传教诵经，待到案之后反复开导仍尚执迷不悟，情殊可恶，廖庭级合依听从入教不知悔改，发往黑龙江给所伦达呼尔为奴例，发往黑龙江给所伦达呼尔为奴，照例刺字；

周正敖、朱必荣等人仅止被诱入教，并未传人，带至到案之后即行悔改，情愿出教，合依被诱入教之人到官后始行悔悟者，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定地充徒折责安置；

乡约马理伦失于查察，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革役起获经卷牌位案结销毁。

张大鹏、曾老大严缉，择日另结此案；

而地方文武，立即会同营员访擒，并未失察，应请免议，除备录供…²³⁷

（四）湖北嘉庆二十四年刘方济各教案

湖北是天主教传播比较早的地区之一。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湖北优越的地理环境。尤其武昌三镇更是全国交通枢纽，交通便利，信息传递迅速。所以西方传教士将湖北作为一个重要的活动据点的。“从明末至清中叶（1840年以前）的二百余年里，有数位耶稣会士以及其他隶属罗马教廷修会的传教士在湖北传教”。²³⁸其中比较为人知的在湖北传教的耶稣会士有罗明坚、穆迪我及穆氏兄弟以及后来的法国耶稣会士。²³⁹在全国的禁教形势下，繁华的市镇中心不利于秘密传教。于是传教士便把目光转向乡村。“乡村教会成为传教士和基督徒的避难所”，“乡村天主教在清朝禁教期间并没有绝迹，而是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²⁴⁰在嘉庆禁教时期，湖北的传教情况即是如此。以磨盘山为典型代表的乡村教会隐秘发展。1793年至1819年间，遣使会士刘方济在此建立了他的传教中心。刘方济的传教使磨盘山以及周边地区的传教活动得以正常进行。但也引发了嘉庆后期湖北的一次大

²³⁷ 《贵州巡抚颜检奏报审拟顾占鳌等设堂传习天主教案首从各犯折》，载《档案史料》，第977—978页。

²³⁸ 康志杰：《湖北天主教开教述略——兼评明清在湖北活动的耶稣会士》，《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

²³⁹ 近年来康志杰教授对湖北传教有较深入的研究。其有关方面的著述有《湖北天主教开教史略——兼评明清在湖北活动的耶稣会士》，《关于湖北磨盘山神权社会的考察》，《一部了解湖北天主教的重要史料》等。

²⁴⁰ 康志杰：《关于湖北磨盘山神权社会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

教案。即刘方济的被捕及遇害。

嘉庆二十四年七月，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报抓获传习天主教之沈方济各等犯。缘由擒获传习天主教之刘方济各，供称在湖北谷城、南漳、郧县等处传教多年，并供出习教各犯姓名开单具奏，单内人犯俱载有年岁住址。张映汉奉旨按照提供名单前往谷城等处查擒押解到省。²⁴¹刘方济各当时供称：

“伊于乾隆五十六年同来京办事之西洋人喇弥哟到广东澳门地方，喇弥哟进京，伊即由广东、江西到湖北传教，喇弥哟到京后，曾通过信息，说在京城西洋北堂办事。”²⁴²

随即传提喇弥哟讯问，即传到西洋人南弥德。南弥德供称：

“原名喇弥哟，系西洋拂郎西亚国人，于乾隆五十六年自本国起身来京，经过王家营，在客店内住宿，闻开店人说纔有西洋人刘姓从京中回去，曾在店住宿一夜，并未见面，到京后闻得有西洋人刘姓在东堂当差，已经回去，此外并无刘姓人同伴到澳门之事。至我们带信，系带至广东总督衙门转交苏姓，并不与别人带信。”²⁴³

相对照之下，刘方济各的供词与南弥德的供词就不相符合，“显系恃无质证，诡词支饰”。因此，对刘方济各再讯，“以自本国到澳门与喇弥哟同舟时，是否已称刘姓，抑仍用本国姓名；其喇弥哟到京后与伊通信，系在何年，托何人带至湖北交与伊手；喇弥哟在京曾否传教，谅伊亦必知悉，俱令据实供吐”。²⁴⁴从之前的教案审讯情况来看，审讯官员基本上会找人对供，如果前后供词相符，就会不予深究，有时还会减免惩罚程度。但是，这一次，刘方济各与南弥德的供词互不相符。这样官方肯定会继续深究下去，并且还会株连不少。

此案之前已有拏获习天主教沈方济各等 22 人，并被解省审办。当时已经提审过沉谷瑞即沈方济各。沈方济各供称，他“藉隶安徽石埭县，方济各系伊教名，

²⁴¹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8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报审讯现获传习天主教之沈方济各等犯及派员缉拏各犯情形片》。

²⁴²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8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报审讯现获传习天主教之沈方济各等犯及派员缉拏各犯情形片》。

²⁴³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8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报审讯现获传习天主教之沈方济各等犯及派员缉擒各犯情形片》。

²⁴⁴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8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报审讯现获传习天主教之沈方济各等犯及派员缉擒各犯情形片》。

自其父在时即习天主教，念十戒经。于嘉庆元年到京行医，并作裁缝。三年上与素识习教的浙江人杨老大会遇，被引入天主堂习教。六年上在天主堂内曾见过喇弥哟，那时他在西洋北堂充当《格物穷理》的差使(朱批：京中无此差使)，因他是上等人，不能与他叙话。到二十一年九月，自京起身到湖北谷城县，在已获的孙瑞章、徐光美两家始会遇西洋人刘方济各与直隶宛平人何依纳爵在那里传教，同教人皆称他二人为神父，每月四次与众人讲说西洋经卷，谓之坐瞻。凡入教之人，各出钱一二百文，在神父处报名，亦即入会，到本年正月间，因为本县查拏严紧，即被拏获。²⁴⁵而后刘方济各与何依纳爵闻风潜逃，今听说刘方济各已被河南拏获。何依纳爵是直隶宛平县人，年约三十余岁，中等身材，光面有须，从前在京时住宣武门内城根东头马道地方，现在不知逃往何处。再，刘方济各的刘字，本不是他的姓，按西洋话是克肋得三字，以汉语切音是刘字，方济各三字，按西洋话是佛郎西斯果。这刘方济各曾听说是乾隆五十六年间从西洋由广东澳门来到湖北，在谷城县天主堂落住，后天主堂拆毁，纔到孙瑞章家居住，他曾否与喇弥哟同舟及曾否到京，实不知道。二十一年九月自京起身时，喇弥哟曾着人送书信一封交与他转寄与刘方济各，书面写刘爷开拆，其书信中的话，不得知道。

²⁴⁶

上段沈方济各所称的刘方济各，即法国遣使会士刘方济(Francesco Regis Clet)，Clet音译即为沈方济各所说的“克肋得”。关于刘方济的事迹，在《湖北襄郢属教史记略》²⁴⁷和《天主教遣使会在湖广三个世纪的传教史(1578—1870)》(*Trois Siecles d' Apostolat Histoire de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çu' à 1870*)都有详细记载。这两本书的作者基本是以教会的立场来记述的，而《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里的史料又基本是各种奏折和上谕，因此，将这两类材料做对比分析，看一下此次教案的大致情况。

《湖北襄郢属教史记》记载，1784年7月12日，遣使会会长奉罗马传教部命

²⁴⁵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8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报审讯现获传习天主教之沈方济各等犯及派员缉擒各犯情形片》。

²⁴⁶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8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报审讯现获传习天主教之沈方济各等犯及派员缉擒各犯情形片》。

²⁴⁷ 成和德：《湖北襄郢属教史记》。康志杰教授在《关于湖北磨盘山神权社会的考察》一文注释中写道，成和德(1873—1928)曾在磨盘山传教数年，传教期间把平日教会发生的事情作了详细记载，然后根据这些资料，兼采西文记录，编写了一部区域教会史，名为《湖北襄郢属教史记略》，1924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因而书中所记史实基本可信。

令，继承管理耶稣会在华教务。……是时湖广教务亦由山西主教统辖。而主教苦于鞭长莫及，已奏罗马，准令设主教一缺于湖广管理教务。当时以决定司铎阿本（M. Raymond Aubin）前去的，只是阿本在西安逗留时也被官府擒获入狱。因此，刘方济各接替阿本前去湖北，是时 1973 年。刘方济各姓克来，法国都斐纳省格肋诺布勒城人。生于 1748 年 9 月 20 日。1791 年 6 月抵达澳门，来华时已有 43 岁。先在江西传教。到湖北后，发现湖北的教友较他圣独多，惟皆处深山之中。又以茶园沟教友为数最多。约有 2000 人左右。刘方济各居住于此有 17 年的时间。

1818 年刘方济各已年届古稀。茶园沟又起风波。刘方济各曾经遗书北京会长，述其原委，曰：“此次风波之勃兴，实由于一教友之仇人蓄意报复，将房屋私自焚毁，遂鸣官诬陷教友。问官亦已烛破奸隐。故未饬拿被告教友。惟出令严拿二西教士。特派文武官员各一率兵役与外教人约有三四百人之多。借此为辞遍地搜捕。并悬有千金重赏。兵役等因皆攀山越岭，弗辞劳卒。是时予偕何公（即何依纳）等匿入一山洞（俗名老虎洞，在今天大堂左旁大山岭崖下，深可丈余，广逊之），已有 11 日。后有兵役搜寻至此，遂潜往河南。寄居南阳口岗某教友家，以为从此脱离虎口，……忽遇恶星，先是穀邑有教友沈某者，本佻达少年也。多行不义。真福见而怜之，数进忠告，启以自新之路。无如沈某不识美恶，不特不感恩，反以是衔之。尝拟恩将仇报。而又闻有千金厚赏。不良之心勃然大动。径往府署，先将沈司铎（即沈方济各）密卖。旋遂自率差役来逮捕刘方济各。1819 年 6 月 16 日刘方济各连同另外 24 名教友被捕。²⁴⁸

但是，关于刘方济各怎样被擒拿该书中还有另外一说。说刘方济各是被一姓靳名荣，绰号六先的教友所出卖的。因这位靳姓教友曾被刘方济各痛责其纳重恶表，集成怨恨，于是便暗地里叫儿子去县衙叫来差役将刘方济各擒拿的。²⁴⁹

根据以上两段可以猜测到刘方济各被擒获的原因是被教友所出卖的。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刘方济各在茶园沟传教十几年而未被查出，一来是地形隐蔽，不易察觉；二来也是平时全靠教友周全。因此一旦教内中人或周围仇教民人告密，势难保全。所以刘方济各的被捕，虽然跟官府加强查禁有关，但或许还是教友更可能是仇教之人的告密泄漏了行踪而遭擒拿。而且据下面的刘方济各的供词，他确实是在河南的靳宁家被擒的。但并没有说出为何被擒的原因。虽然靳宁也被擒

²⁴⁸成和德：《湖北襄郢属教史》，第 1—16 页。

²⁴⁹成和德：《湖北襄郢属教史》，第 17 页。

获，他招供只是说查擒甚紧，在逃匿的路上被抓。

再来看看《天主教遣使会在湖广三个世纪的传教史（1578—1870）》（*Trois Siecles d' Apostolat Histoire de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çu' à 1870*）关于刘方济各的记载。（他）是一位友好的和给人好感的人，同样也是值得钦佩和壮烈的，是一位特别有德行的人，一位伟大的实践家，是所有牺牲的传教者的真正典范……²⁵⁰从1795年到1810年这15年间，Clet神父一直是湖广教区的唯一的欧洲神父，但是他在北京的上游给予他一次珍贵的援助，即通过派遣了一些中国籍的遣使会士。他们是李神父（Joseph Li）、张神父（Jean Tchang）、张神父（Jouventin Tchang）、王修士（Paul Wang）、宋神父（Paul Song）和胡神父（Ignace Ho）。²⁵¹1819年6月19日，当Clet神父做完神圣的弥撒之后，便落入到迫害者的手里。他被戴上锁链，押送到开封府，即河南的省府，在那儿，他在官员的法庭里受审好几次。那些官员对他提出许多狡诈的问题，以便让他供出其他的神父和那些已经隐藏以来的天主教徒。官员们还在那些有字的纸张里发现了三封南弥德（M. Lamiot）神父的信件，这位神父是在北京的遣使会士，是为国王服务的。²⁵²

之前沈方济各的供词官方仍然不太相信。而且其余孙瑞锦等二十余犯，也称仅止习教随众听讲，并无称为神父及坐瞻传徒情事。因此官方认为仍要再与刘方济各的供词相对质。根据先前的擒拿名单，有很多是早前到官府自投改悔过的教民，看来自投改悔只是个幌子而已，暗地里还是照常信奉天主教。这样一来，稽查就更为严密，即便是已去世之人，也要多方证实才作罢，要不使一名漏网。²⁵³

刘方济各在河南被擒获之后，被押回湖北审讯。由湖北巡抚张映汉提讯。还要查清刘方济各提到的“自本国到澳门与喇弥哟同舟时，是否已改称刘姓，抑仍用本国姓名；其喇弥哟到京后，与伊通信系在何年，托何人带至湖北交与伊手；喇弥哟在京曾否传教”，²⁵⁴都要俱实招供。据刘方济各供称：

²⁵⁰ *Trois Siecles d' Apostolat Histoire de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çu' à 1870*, p220.

²⁵¹ *Trois Siecles d' Apostolat Histoire de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çu' à 1870*, p225—226.

²⁵² *Trois Siecles d' Apostolat Histoire de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çu' à 1870*, p236—237.

²⁵³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8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报审讯现获传习天主教之沈方济各等犯及派员缉擒各犯情形片》。

²⁵⁴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9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覆讯取传习天主教犯刘方济各等人供词情形折》。

年七十二岁，系西洋拂郎西亚国人，在该本国名克肋得，乾隆五十六年间，同喇弥哟、卑呢额斯定三人自本国一路同船到广东澳门，喇弥哟即进京当差，我同卑呢额斯定起意到中国来传教，适遇一广东习教人，不记得姓名，曾说起湖广谷城县地方信这教的多，我同卑呢额斯定随要到湖广谷城县来。又听得广东人说，西洋人到中国，必要个汉姓称呼，我就将克肋得三字对音切为刘姓，卑呢额斯定即切为李姓。又恐路上官人盘问，不敢一同行走，卑呢额斯定先起身，我后起身，前后都到谷城县天主堂内落住，半年后，卑呢额斯定就因病身故，只剩我一人。嘉庆十七年，天主堂奉官拆毁，我就在已获的孙瑞章家住。我自到湖北，京中的喇弥哟曾寄与我书信约两三次，是何人寄来，年久都记不清。今沈方济各供说二十一年上他曾寄来喇弥哟书信一封交给我，我想起来是他曾寄过喇弥哟书信一次，书信内都是问候套语，并无别话。至喇弥哟曾否在京传教，实不知道。当日与他在澳门分路时，他有二十六七岁，微须圆脸，中等身材，这多年不见，不知他是何相貌了。我从前自澳门一直到湖北谷城，并没到过京在东堂当差，也没到过王家营在客店里住宿。我初到谷城，是在天主堂里坐瞻讲经，我的中国话说不全，本地人又不懂西洋话，每坐瞻讲经时，只得学着中国话讲西洋经内的些道理与众人听，若自己念经，是西洋的本话。自天主堂拆毁后，我就在孙瑞章家坐瞻，凡来听讲的人，就算我的学生一样，称我为神父，或称刘爷，不过是尊敬的意思。后来不记年分，又有一直隶人何依纳爵来到谷城，也会讲经，就在一处坐瞻，同教人也称他为神父，凡来听讲的各出钱一二百文，以作香火之资，报名入教。本年春间，谷城县查拏严紧，有在逃的陈量友邀我逃到现获的胡元家住了几日，又到老河口遇见在逃的南漳县同教人王老四，一同雇船逃至河南已获的新宁家。那王老四、陈量友各自回去，我一人在新宁家住了七八天，闻河南查拏的也紧，就同新宁雇车想同逃别处，先到了河南已故的周玉贵家住了几日，又向前去，因无处藏匿，仍回新宁家，就被河南拏获。等语。臣当将搜获之西洋经，令该犯与沈方济各译出数句，是我们该钦崇爱慕并礼拜一个天主，在万物之上；又我们该当爱慕恭敬父母，懂得是世上的尊长；我们该当爱别人

如自己，并禁止我们自己的本权不杀人，也不伤害别人。等语。²⁵⁵

随后张映汉又向刘方济各追问，指出其在襄、郟一带传教，地方上如有习白莲、牛八等教之人，自然系属一气。刘方济各则回答说“白莲、牛八等教俱是犯法惑众的事，我们西洋教迥是两道，断不与他们往来”。张映汉又发问，他认为刘方济各来湖北谷城县多年，谷城与河南接壤，其于两省所到地方必多，其传徒自亦不少，当不止湖北已获之二十余犯，及在河南供出之五十余人。复向刘方济各逐细追究，刘方济各供称，

我自来湖北谷城多年，实止到过郟西县已获的徐作霖家一次、南漳县已获的彭廷相家一次、房县已获的杜均珩家一次。至河南，止到过南阳县已故的靳文成家一次。每处不过住七八天就仍回谷城，因为日不久，听讲的人甚少，并没到过别处。其在谷城，来听讲入教的人本多，有本县人，也有外县人，这现到案的孙瑞章们二十余人，多半都是听过讲的，其前在河南供出的五十五人，也多半是听过讲的。至此外尚有何人，因年分已久，人数众多，我年老昏愆，实在不能全数记得指出名姓。臣当又将节年奏明各州县到官投悔免罪各犯花名清册内所载姓名，逐一念与该犯指认，据供，其中有记得曾听过讲的，也有不记得曾否听过讲的。²⁵⁶

张映汉又认为当年刘方济各同卑呢额斯定与喇弥哟同到澳门，喇弥哟系奉调来京当差之人，他们二人系私入内地，何以刘方济各与喇弥哟附舟同行，喇弥哟岂有不问其意欲何往，难保喇弥哟不有指引其来楚传教情事。随又向其切实根究，据刘方济各供称，他与卑呢额斯定起意要进中国传教，原告诉过喇弥哟的，并非他指引来的。当日在逃的何依纳爵自京来到谷城，说起他在京时见喇弥哟，曾向他说现在湖广谷城县传教，所以何依纳爵纔寻来的。²⁵⁷张映汉再三究诘，但也没再问出什么来。

张映汉遂复提讯沈方济各。据沈方济各供称：

我自嘉庆二十一年由京来谷城，在已获的孙瑞章、徐光美家纔遇见这刘方济各与何依纳爵在那里坐瞻讲天主教经，我亦即入会。我从前在

²⁵⁵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9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覆讯取传习天主教犯刘方济各等人供词情形折》。

²⁵⁶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9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覆讯取传习天主教犯刘方济各等人供词情形折》。

²⁵⁷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9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覆讯取传习天主教犯刘方济各等人供词情形折》。

京城天主堂时，原学会说些西洋话，纔识得些西洋字，来到谷城，又经刘方济各随时指教，所以也会讲西洋经卷，后来也曾在徐光美家坐过瞻，所有听讲的人，也仍是听刘方济各讲经的人，但不如他的人多，自己并未另收徒弟，也没到过别处，现在到案的二十余人俱认得的。至刘方济各在河南供出的五十余人内中，我认得的少，不认得的多，此外指不出别人来了。嘉庆三年我在京时，曾听得人说东堂内一充当画工差使的西洋人刘姓，不知他名字，并未见过面，听说已回西洋去了，那喇弥哟所指在王家营客店的刘姓，是否即是此人，不敢混供。再，我于二十一年自京起身来湖北时，那喇弥哟约年五十多岁，圆脸浓黄须，中等身材，曾交给我书信一封，转寄刘方济各收拆是实。²⁵⁸

这些供词与前面刘方济各的供词基本相符。提讯完沈方济各，又将同时在河南与刘方济各一块擒获的龚保禄和靳宁讯问。据龚保禄供称：

年六十三岁，谷城县人，在白云沟地方居住，父母已故多年，弟兄四人，三个哥子也都身故，我祖上习天主教，经咒俱是父母口传，并没师父，也没传徒。我女人李氏，娘家在河南南阳县城外住，离靳宁家四十里，岳父母等俱故，只有妻侄李猫，从前也曾习教。这刘方济各同沈方济各在谷城坐瞻传教，我早已认得，本年二月内，因本县拏习教的人严紧，我害怕，即逃往河南岳丈家躲避，不料妻侄李猫业已悔教，就将我呈首到县的。²⁵⁹

靳宁供称：

籍隶河南南阳县，年五十三岁，父亲靳文成，我家祖习天主教，并没传徒。嘉庆十八年，刘方济各到小的家住过七八天就仍回谷城去了，父亲于十九年病故，二十一年我到过谷城一次，住在孙瑞章家。今年二月，有在逃的陈量友、王老四送刘方济各到我家，陈量友、王老四当就回去，独刘方济各在我家住过七八天，听得南阳查拏甚紧，我就雇了车想与刘方济各同逃，因路上无处藏匿，走了几天仍一同回来就被拏获的。

²⁵⁸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9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覆讯取传习天主教犯刘方济各等人供词情形折》。

²⁵⁹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9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覆讯取传习天主教犯刘方济各等人供词情形折》。

等语。²⁶⁰

张映汉仍不放心，将这些供词与之前在湖北抓获的孙瑞章、孙瑞锦、胡元等人对质，“供俱相符”。他禀称说，“其余各犯，切究均只习教听讲，并未传徒。惟内有情愿改悔者，有始终执迷不悔者，自应于将来定案时分别定拟。此以上系臣连日亲讯各犯之供情也”。²⁶¹

随后仍然是饬拏刘方济各在河南供出谷城等县之教犯 55 名，按照单内姓名、住址，向刘方济各及龚保禄等逐名根问。²⁶²张映汉带领省检派文武员弁会同该地方文武按照姓名、住址密往缉拏，数日便已于谷城、南漳、郧县、郧西等县地方陆续拏获单内之犯 36 名，又查明已故者 4 名。²⁶³

嘉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的上谕下旨给张映汉，让其“向刘方济各等再行严讯该犯等私入中国传教，究竟是何意见，并诘以中国所奉有儒、释、道三教，其余一切邪教概行查禁，若使中国有人私往该国传习儒、释、道三教，该国之人岂即甘心崇奉。至该犯等所传之天主教，在中国即系邪教，不惟大皇帝崇正黜邪，法难宽宥，即各省督抚亦必严拏惩办。”²⁶⁴

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张映汉再次上奏，将刘方济各全案详细禀奏。其实是刘方济各在湖北襄郧茶园沟传教的情况。张映汉接下来继续说道，二十四年正月内刘方济各畏惧，随与陈量友，将经卷图像及坐瞻时所用烛台等项收藏山洞之内，相伴躲至已获之胡元家。后又与陈量友逃至老河口，遇见未获之王老四，一同雇船逃往河南，到靳宁家躲避。陈量友、王老四各自转回，刘方济各在靳宁家居住七八日，又与靳宁雇车至已获之周安堂侄媳周靳氏家借住数日，复向前去，因无处藏匿，仍回靳宁家，旋被南阳县拏获。又有龚保禄一犯，因谷城县查拏，逃往南阳县妻侄李猫家躲避，经李猫呈送到县，一并解经河南抚臣查讯。²⁶⁵

这段则是讲刘方济各被擒获的过程。与《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所载基本吻

²⁶⁰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9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覆讯取传习天主教犯刘方济各等人供词情形折》。

²⁶¹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9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覆讯取传习天主教犯刘方济各等人供词情形折》。

²⁶²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9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覆讯取传习天主教犯刘方济各等人供词情形折》。

²⁶³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89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覆讯取传习天主教犯刘方济各等人供词情形折》。

²⁶⁴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91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报遵旨申明刘方济各等传习天主教案分别定拟折》。

²⁶⁵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91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报遵旨申明刘方济各等传习天主教案分别定拟折》。

合的。只是《湖北襄郟属教史记略》还是有些夸大色彩，以突出刘方济各避难时所遇到的艰险。及至后来被人出卖。但是张映汉所奏，则是靳宁与刘方济各一块被捕的。可看出靳宁与刘方济各是共患难的。只是行踪暴露，无处可藏，才遭官府擒拿。

接着张映汉报告此次教案中所擒获的教民，共有 83 名。同时张映汉还将前次上谕中所提到的天主教在中国即系邪教，不惟大皇帝崇正黜邪，法难宽宥，因此一定要讯问刘方济各等为何敢于屡次查禁之后，仍复潜踪传习，是何居心。刘方济各则称：

该国之人无论贵贱，均习天主教，其中国之儒教，尚知尊奉，但不解者多。至释、道二教，素不讲究。因在本国穷苦，无以谋生，是以来中国传教，希图骗钱糊口。初到中国时，并不知伊本国之教系犯例禁，所以引人传习。彼时，凡读书之人，多不听信，惟乡间农民求福心盛，都相信从。后知天朝大皇帝崇正黜邪，除儒、释、道三教之外，伊等之教与白莲、红莲、牛八等教均为邪教，查禁甚严，本省督抚又不时飭地方官访拏周密，因此农民信从者亦渐少，骗钱渐不容易，自己亦知畏罪，但已来至中国多年，既无盘费转回该国，且究赖有听信之男妇几十人，仍可借以养生，是以冒罪引诱传习，实无别意。等语。²⁶⁶

但是张映汉认为刘方济各曾与喇弥哟通过信息一节最为紧要。刘方济各供称，伊于二十一年间，曾据沈方济各自京寄到喇弥哟书信一次，此后并未接有书信，至其真假，实不能知。讯之沈方济各，则称前次书信实系自己捏写，冒充喇弥哟亲手书信。而南弥德则称：

我系西洋拂郎西亚国人，原名喇弥哟，年五十三岁，乾隆五十六年自本国起身，至五十九年到京，在北堂居住，现充内阁翻译。我来京时，本国约有百余人与我同船到广东，他们就在广东一带做买卖，俱知道我进京当差。今蒙严讯，卑呢额斯定、刘方济各彼时与我同船，我并不认识。何依纳爵，我也不认识，并无叫何依纳爵到湖北寻访刘方济各，我也无寄信的事。至我在京中当差，遇有人问我，我就向他讲天地的道理，至他曾否奉教，我不知道。问过我的人，实记不得

²⁶⁶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91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报遵旨申明刘方济各等传习天主教案分别定拟折》。

姓名。所供是实。等语。²⁶⁷

其实，应该是很明了的了。是沈方济各冒名南弥德写的信。只是刘方济各三人，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前后供词太不一致，引起张映汉的种种猜忌。认为他们虽非同国相识，但是都是奉教最笃之人，难保无彼此袒护，互为狗隐情弊，因此必须究根到底的。因为原来在刘方济各那里搜查到的南弥德之信件，系沈方济各冒名写的。沈方济各曾追随吉德明在北京的天主堂习教多年，并学习西洋字，对京中传教士情况还是颇为了解的，知道南弥德跟刘方济各有些关系，才敢贸然以南弥德之名写信给刘方济各。只是害苦了南弥德，他并没有说谎，但是清廷对传教士私入内地传教是最禁忌的，而南弥德无端被牵连上，也是有口难辩。正是因为刘方济各收到的署名南弥德的信是为了得到特殊照顾沈方济各冒名写的，所以南弥德才会从头到尾一口否认。因此张映汉反复究诘。

以上是查案过程。照例是要将涉案之人一一照例论处。一般来说，在议处之前，官员都会将以前所发生的教案是如何处置的援引一遍，此次张映汉也不例外。他首先指出一般教案的处理，即西洋人在内地传习天主教，倡立讲会蛊惑多人，为首者拟绞立决；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悔改者，发新疆给额鲁特为奴；被诱入教之人，如能悔悟，赴官首明出教者，概免治罪；若被获到官始行悔悟者，于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然后又援引嘉庆二十二年刑部办理天主教人犯萧志方等一案，对向来习天主教者，如果他能真心改悔，必肯跨越十字架。如果欣然试跨，并无难色，是即真心出教，即行免罪释放。张映汉认为在此案中，刘方济各等人的处置依次如下：

刘方济各以西洋人潜入内地传习天主教，并以讲经名色煽惑多人，自应遵旨照例定拟。刘方济各合依西洋人在内地传习天主教，倡立讲会蛊惑多人，为首者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

沈谷瑞本系听从刘方济各讲经之人，迨后刘方济各因听讲人多房屋窄小，将经内道理向其指教，令其分地讲经，所有听经之人，即系听刘方济各讲经之人，该犯并未另行传徒，自未便以为首定罪，惟该犯于到官后，尚不知悔改，自应照例科以应得之罪。沈谷瑞即沈方济各一犯，除捏冒喇弥哟书信轻罪不议外，发新疆给额鲁特为奴例，改发回城分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均照例分别

²⁶⁷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90 吏部尚书英和奏报讯取喇弥哟即南弥德供词请交刑部严审折》。

刺字发配。

到官不愿改悔之孙瑞长等 26 犯，均合依听从入教，不知悔改者发新疆给额鲁特为奴例，改发回城分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²⁶⁸，均照例分别刺字发配。内吴王氏一犯，虽系妇女，但于到官后尚坚不改悔，情殊可恶，未便援例收赎，应实发驻防兵丁为奴，以示惩戒。

田中富等 21 犯，系先已自行赴官首悔；袁魁一等 34 犯，系到官后始行改悔，应请一并援照前奉谕旨并定例，准其免罪释放，交保管束，仍饬地方官不时稽查，倘再有习教情事，加等治罪。

内靳宁、周安二犯，系河南省解来，应仍解回原籍管束。喇弥哟讯无通信情事，应递回刑部听候发落。另外起获各经卷、十字架、图像，概行销毁。²⁶⁹

而南弥德虽以无罪释放，但是很快就令往广东安插。南弥德无计可施，只得束装就道。抵广后随设法再进京，嘉庆帝决意不准，只好去了澳门。后于 1831 年六月份逝世。²⁷⁰南弥德逝世后，北堂法国传教事务由高守谦代管。²⁷¹

处置了上述一大批人之后，张映汉仍然认定“虽据刘方济各供称与沈方济各仅止听从分处坐瞻，但曾否各自传徒及此后有无另行传教惑众之处，统俟缉获到案之日另行严究办理”。另外对当事官员也有议处的，但通常会有功过相抵，是否宽免处分之类的建议。刘方济各教案至此告一段落。湖北传教也受到重创。16 年后，另外一位叫董文学的遣使会士也来到磨盘山传教，并恢复会口 15 个。²⁷²但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中国是中国天主教传播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董文学也遭遇了同刘方济各相同的命运。

(五) 陕西教案

从 1635 年耶稣会会士方德望到陕南传教开始，天主教在陕西已有近 400 年历史。²⁷³清初，罗马天主教会先后派遣传教士进驻陕西，1657 年至 1662 年（顺治十四年—康熙元年）法国人穆格我（Claude Motel）神父被派往陕西传教；1680—1684 年间（康熙二十一—二十三年），罗马天主教会中国副省会长陆泰然

²⁶⁸ 此处已是将“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改为“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

²⁶⁹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91 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报遵旨申明刘方济各等传习天主教案分别定拟折》。

²⁷⁰ 《燕京开教略》，载《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 404 页。

²⁷¹ 《燕京开教略》，载《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 404 页。

²⁷² 康志杰：《关于湖北磨盘山神权社会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3 期。

²⁷³ 李崇正：《汉中教区简史》。

(Andrea-Giovanni Lubelli) 曾到山陕教区巡视。²⁷⁴乾隆年间, 罗马教会仍一直不断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 也包括陕西地区在内。而且尤以意大利籍传教士居多。乾隆四十九年陕西曾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教案。²⁷⁵给陕西的天主教以沉重的打击。但是随着禁令的逐渐松弛, 陕西地区的天主教传播也如同其他地区一样, 并没有完全停止而是转入地下秘密进行。到嘉庆五年(1800)时, 陕西约有教徒2万余人。

受嘉庆十年教案的影响, 嘉庆十六年又再一次掀起禁教高潮。前面述及的已有将高临渊、颜诗莫、王雅各伯和德天赐等人被遣送回国, 御史甘家斌上奏制定天主教违禁处罚条例以及四川巴县和渠县教案等。这一年陕西也发生了张铎德案。

(1) 张铎德案

嘉庆十六年二月陕西巡抚董教增上奏, 擒到陕西扶风县张铎德供出彼教中竟有教化皇及总牧司铎等名目, 并仿效职官设立品级, 以品多为贵。²⁷⁶这一发现不得了, 禁教这么多年, 不但不能禁止天主教的传播, 反而大有燎原趋势。仍然有内地民人, 胆敢混入西洋堂习教诵经, 而且考得品级。清廷则认为考得品级后便可以更好的倚仗总牧字谕, 出外传教煽诱多人。董教增上奏之后, 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 御史飭令管理西洋堂务之大学士禄康等进行严查。

张铎德供称, 乾隆五十七年, 有已故湖广李姓给他西洋字书信到京城天主堂, 练习念经, 晓得经内道理。嘉庆四年, 经南堂大人汤士选考取四品。西洋以品多者为贵。考的品级后汤士选给其银两, 要其往山西寻西洋监牧路先生。遂带了天主经卷, 书信, 寻至平遥县安洪道家, 经见了路先生。路先生是西洋人, 教名亚禄依斯伍斯泰撒格, 在那里传教, 人人都尊奉他, 有时回西洋堂去, 在外没有一定住所地址。十一年, 路先生要其往甘肃各处访问, 教中讲解十诫的道理, 并给有示谕一纸。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走到山西扶风县教友陈洪智家, 讲说经理。今年正月初, 间由陈洪智苏识的王克智等15人先后来那里一同听讲念诵, 初

²⁷⁴ 张晓虹:《同治回民起义与陕西天主教的传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²⁷⁵ 乾隆四十九年夏天,四位意大利圣方济各会教士由澳门欲往陕西,只是他们未到陕西就在湖北被清廷捕获。而当时陕甘一带回民起义让清政府狼狈不堪,这就使得清政府自然的将传教士进入陕西一事与回民起义联系起来,认为是罗马教廷在得知西北回民造反后,欲派人到陕西暗通消息,因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次禁教活动。见《清高宗实录》卷1215。

²⁷⁶ 《管理西洋堂事务大学士禄康奏报查明张铎德所拱西洋堂内无路姓洋人并继续访查折》,载《档案史料》,第904页。

九日，就被扶风县主访闻拿获。

张铎德坚持其讲的经卷不过劝人修身行善，至考取七品及外出行教，现有西洋字信一封，可向西洋堂查问，并没为非不法也。无画符念咒，索要人家钱财的事。至于路先生的行踪，实不知道”。²⁷⁷

同时被擒获的陈洪智，年五十八岁，扶风县人，务农度日。只因想行善邀福，就敬信天主教，吃斋念经。嘉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铎德来到陈家，说其是西路司铎，访问教人，讲解经卷。于是陈洪智便将张铎德留住在家，听讲解经卷。正月间，陈洪智素识的王克智等 15 人先后到其家拜年。听张铎德讲经卷，觉得甚好，便都在十字架前跪诵经卷。不料初九日即被扶风县主访拿。²⁷⁸王克智等人也做了供词。²⁷⁹

当时汤士选业已身故，无从查讯，禄康等人又亲自各堂传集管理之监正福文高，监副李拱宸、高守谦明白晓谕，令其照依董教增所奏情节，有无知情之处，逐一登答。福文高等人奏称：“我们西洋本国原设有官职，我等供奉天主教原是出家，并无官职。我等自西洋来京，无非为供奉天主，哪有加品称职的事。所有从前内地民人，有愿入天主教的，我们并不拦阻。自嘉庆十年间，奉旨查禁传教，我们既不敢让外人进堂念经。福文高、李拱宸是嘉庆六年来京，高守谦是九年来的，已死的汤士选从前有无着人外省传教，我们实不知道。现今我们西洋东西南北四堂，除看坟地并庄子种地之人，别无在外的人。汤士选已死三年有余，我们遍查数年前，堂中并无路姓其人，想是外省的人假我们西洋堂名目，在外诓诱惑人也未可知，我们听之也实在气愤。如路姓来京投我们西洋四堂，我们一面禀报中堂大人并告知们看堂的官人将他擒送衙门讯办，断不敢隐瞒。”²⁸⁰

嘉庆十年教案以后，曾制定出专门的章程以防止传教士潜入内地传教，或者在京的传教士与内地传教仍有关联。嘉庆十年教案之后，本来是要将全部的传教士遣送回国的，只是因为有一些方面比如历算、翻译还需要用得上西洋传教士，因而允许相当有限的几位传教士留在京中。但对他们的行动作了严密和详细的规定。去哪行哪都要受到约束。京中西洋四堂专门加派了人手严加看管。即使没有

²⁷⁷ 《陕西巡抚董教增奏呈传习天主教张铎德等人供单》，载《档案史料》，第 901 页。

²⁷⁸ 《陕西巡抚董教增奏呈传习天主教张铎德等人供单》，载《档案史料》，第 901—902 页。

²⁷⁹ 《陕西巡抚董教增奏呈传习天主教张铎德等人供单》，载《档案史料》，第 902 页。

²⁸⁰ 《管理西洋堂事务大学士禄康奏报查明张铎德所拱西洋堂内无路姓洋人并继续访查折》，载《档案史料》，第 905—906 页。

专门颁布条例严加管束之前，对西洋人的举动也是看管得很严，尤其不准他们与民人相互往来，但是还是出现了张铎德这样的情况。因此禄康禀称，查西洋四堂，前于嘉庆十年间钦奉谕旨派奴才等管理，当即奏定章程，派提督衙门所属旗营官员，带领兵丁在各堂前后门建盖房间看守稽查西洋人出入，并无有人进堂传教，亦不许西洋人各处行走，办理最为严密。查阅西洋四堂均有后门，恐有潜行出入之弊，惟东堂兼有旁门，坐落在镶白旗满洲地面，故一并飭令两翼翼尉将四堂后门堵彻，并令各该旗协副尉派兵看守，勿许伊等私拆，嗣后各堂之人，俱从前门出入，并将各堂后门，向派官兵移于各堂前门，以便旗营员弁兵丁会同轮流看管。²⁸¹ 张铎德最后被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陈洪智等人则先行枷示，如经开导仍执迷不悟亦照例发遣。

(2) 兰月旺案

嘉庆二十一年陕西又发生兰月旺教案。其实兰月旺是在湖南被擒获的。只是兰月旺在陕西曾传过教。跟陕西还颇有一些关联。陕西巡抚臣朱勋上奏，于上年十月十二日接据城固县知县程云禀称，访知该县小寨村地方民人王命举等习天主教，随即会同营员前往查擒。当将王命举、梁贵等人擒获。并究出念经处所搜集西洋经 12 本、十字架 14 个，教衣 2 副，教帽 2 顶，又擒获习教发遣嗣经减释回籍之刘西满，并习教之张义德、张望德等人。²⁸²

刘西满等人世居城固，康熙年间有西洋人卜嘉前来传教，其祖父相传世习天主教，乾隆三十年有西洋费姓带来教衣、教帽、经卷等项。李世充之祖李世惠即在村中公捐房舍六间为费姓习教念经之所，嗣后又有西洋方姓、毛姓传教士前来，均在念经处所居住，因为学习天主教必需西洋神甫领洗方能入教。后来西洋费姓等先后病故，刘西满便于乾隆于乾隆十八年前往西洋习教，到乾隆三十八年回籍随充当神甫，哪知乾隆四十九年教案，被解京发遣。至嘉庆八年有西洋神甫兰月旺来至城固讲经，刘西满仍充神甫，与人领洗，兰月旺旋即他往。嘉庆十六年兰月旺又来城固居住，第二年听闻查擒天主教，兰月旺随即搭船前赴湖广。二十年十月十六日接准湖南抚臣来咨，该省已将兰月旺擒获。²⁸³

经过审讯，刘西满即刘以相，虽年逾七十，亦未传徒，惟曾至西洋习教，拟

²⁸¹ 《管理西洋堂事务大学士禄康奏报查明张铎德所拱西洋堂内无路姓洋人并继续访查折》，载《档案史料》，第 906 页。

²⁸² 《陕西巡抚朱勋奏报拿获习教之王命举审明定拟并将失察官员查明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 1079 页。

²⁸³ 《陕西巡抚朱勋奏报拿获习教之王命举审明定拟并将失察官员查明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 1080 页。

遣减释回籍，仍复充当神甫，扛不改悔，情罪较重，核与张万效情罪相同，应请旨将刘西满一犯永远加号示众，以昭炯戒；

不行悔教之王命举等六人，应均照新例发往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仍照例刺字。叶洪春于取供后在省监病，故应毋庸议。

王全忠等九人到案后，始行改悔，均应照例杖一百，徒三年，各至配所折责，充其闻擒，投首改悔之刘一榆等二十三名，均照例省释，免其治罪，仍在于门牌注明悔教字样，责令乡保随时稽查。

至诚固县小寨村念经房屋，全行拆毁，经卷图像衣帽十字架案结销毁，并饬各属一体严缉。

王幅兴务擒究办，所有失察兰月旺之地方官除城固县知县程云，沔县知县范抡策应请照地方官自行查擒究办，免其议处，其从前失察各职名另行查明。²⁸⁴

²⁸⁴ 《陕西巡抚朱勋奏报拿获习教之王命举审明定拟并将失察官员查明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1082页。

第三章 嘉庆时期的禁教措施

嘉庆十年教案的影响波及嘉庆朝的后半期。首先是有关官员受到处置，并对之提出新的要求。同时勒令收缴和销毁西洋书籍和刊刻经卷。嘉庆皇帝还要求制定出新的管理章程，以便对西洋传教士更好的管理和约束。在严定科条。大家惩治的同时，还加强教化的力度。尽管制定了种种措施来禁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内地如四川、贵州、湖广等地区，甚至直隶地区，天主教仍然在秘密传播。嘉庆十年以后，跟天主教有关联的事件不断发生。嘉庆十一年有杨继承案，嘉庆十六年的张铎德案，嘉庆二十年四川教案，嘉庆二十四年湖北教案等等。

一、 制定处罚章程

嘉庆十六年陕西监察御史甘家斌上奏，称西洋天主教蔓延无已，应请旨严定治罪专条及失察处分以示惩戒。²⁸⁵奏折称：

惟经正则庶民与庶民与斯无邪，惹我国家准情，制法倡立，邪教暨造妖言妖书，治罪素重，所以严盗贼之防也，其师巫邪术左道异端，亦因以邪害正，易于滋事，俱分别首从严治其罪，并将地方官交部议处，原使有所敬畏，不致轻犯，故此等教匪尚少蔓延，惟天主教自康熙年间流入内地，曾延及广东、陕西、四川、湖广、山东、山西、直隶等省，以致京师皆被煽惑，历经查办，毫无底止，推原其故，总因该教性最狡黠，巧于避就，又因办案时人数过多，难加深究，故同系邪教惑人而治罪独轻。且地方官并无处分，不免因循就令，查办亦不过遵照成案，难以示惩，以致肆无忌惮，任意蔓延，殊为风俗人心之害，并恐积而愈众，滋生事端。查该教不敬天地，不祀祖先，不孝父母，不畏刑法，种种欺公藐法，背名畔义，实属以邪害正，情理难容，既经造书煽惑，动致数千户人民。混蔑纲常，背违法纪，即系妖言惑众，其设立十字架，诱众礼拜，亦与隐匿图像烧香集众者情节相同，未便治罪，独轻致无顾忌。且闻该教能以符咒蛊惑诱污妇女，诬取病人目精，律贵诛心，该教既非图财，又非劝善，果何所为而必只身传教，迷人行恶亦未便任其狡展，不实不尽，至内地民人食德服畴，胆敢信邪教，目无尊亲，不惟转相传授，罪无可逭，即自行学习，亦有应得之罪。虽犯案之后，法难及众，

²⁸⁵《陕西道监察御史甘家斌奏为西洋天主教蔓延无已请旨敕部严定治罪专条及失察处分折》，载《档案史料》，第911页。

然必严定条例，以杜其渐，乃为辟以，止辟之道，相应恭折，请旨敕下部臣查照，煽惑及众各例，祥定科条，以符情罪，并酌定失察罪名，务使人知敬畏，稽察认真，庶刑期无刑可以长斟，宁议定之后，行文各省出示晓谕，以一年为限，自首免罪，地方官并免议处，若遇限不首，未经查擒，均照新例办理，再西洋馆各堂，只因习艺，经年久住，并非每年到京一次，房式亦穹隆异常，耸人观听，虽石坊上天主堂等字已于查办石镌去，然未写明西洋馆字样，仍沿袭旧名，传讹滋惑，且前既煽惑多人，至有身系职官甘心遣戍旗人良太枷禁多年，并不后悔，恐现在传闻该堂仍行传教，兵役等人日久濡染，难保必无其事，其源不清，则其流难塞。无怪外省假借名目不轨，于正应请一并祥议，以净根株，如必因仍其旧，别经发觉，即照新例核办。臣管见所及是否有当伏乞皇上睿鉴。谨奏。²⁸⁶

甘家斌在奏折中认为天主教“性最狡黠，巧于迁就”，加上涉案往往较多，因而难以深究，使得天主教同系“邪教”而“治罪独轻”。称天主教“不祀祖先，不孝父母，不畏刑法”，“欺公藐法，背名畔义，实属以邪害正，情理难容”，甚至“能以符咒蛊惑诱污妇女，诬取病人目精，律贵诛心”，但是“内地民人食德服畴，胆敢信邪教，目无尊亲，不惟转相传授，罪无可逭”，因此“即自行学习，亦有应得之罪”。所以要制定一新的条例对违禁之人进行惩办。

（一）处置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

嘉庆十年五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称：

向来西洋堂事务俱派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而历任该管之大臣等不能实心经理，其派委之司员，亦不常川稽查，大率有名无实。即如近日德天赐等妄行刊书，传教煽惑旗民，此皆由历任该管大臣官员等平日不能认真查察，以致伊等敢于私通书信，往来交结。现在管理西洋堂事务之常福，着无庸兼管，改派禄康、长麟、英和管理，其应如何设立章程，严加管束之处，着禄康等悉心妥议具奏，欽此。²⁸⁷

嘉庆十六年七月，吏部、兵部等官员再次上奏要求对违禁传教士、民人，失察官员均给予具体定罪。其中对于失察西洋人传教之地方文武各官的处分，又分对州

²⁸⁶ 《陕西道监察御史甘家斌奏为西洋天主教蔓延无已请旨敕部严定治罪专条及失察处分折》，载：《档案史料》，第911—912页。

²⁸⁷ 《内阁奉上谕西洋堂事务著改派禄康等管理并妥议管理章程》，载《档案史料》，第840页。

县官、专汛官、该管各官的处置情形²⁸⁸。

(1)嗣后除一年限内，凡被诱入教之人改悔出教自行投首，经刑部免罪者失察之地方官员官免其议处；

(2)或系地方官自行查擒究办，毋论年限内外，均予免议外，如地方有西洋人传教，刊刻经卷，倡立讲会，并内地民人转为传习西洋教诵经立会者，不行查擒之州县官降二级调用，该管各上司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九个月；

(3)如州县官能擒获过半兼获首犯者，免其议处；

(4)如西洋人在地方潜住并无传教情事，及内地民人习西洋教并未转为传习诵经立会者，不行查擒之州县官降一级调用，该管各上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

(5)如西洋人仅止过境并未逗留失察之州县官降一级留任，该管各上司罚俸六个月，督抚免议；

(6)如地方有西洋人传教及内地民人转传西洋教，地方官讳匿不报者，照讳盗例革职，该管上司均照讳盗例分别议处。²⁸⁹

又称兵部例载，西洋人潜入内地传教惑众失察容留传教地方之该管官降二级留任，兼统各上司降一级留任；失察过境并未传教之该管官降一级留任，兼统各上司罚俸一年。因此，虽就有专条，²⁹⁰但“现奉旨严办示惩，自应与文职一体从严核议”，因此又有如下条例：

(1)嗣后地方如有西洋人潜住传教，并民人传习西洋教者失察之地方专汛官，降二级调用，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官降一级留任，提镇罚俸九个月；

(2)知情讳匿不报者，专汛官照讳盗例革职，该管上司照讳盗例分别议处；

(3)若能擒获过半兼获首犯者，免其议处；

(4)如在地方潜住并未传教者，转讯光降一级调用，兼辖官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提镇罚俸六个月；

²⁸⁸ 《吏部尚书瑚图礼奏为遵旨核议严定传习西洋教罪名处分条例》，载《档案史料》，第926—930页。

²⁸⁹ 《吏部尚书瑚图礼奏为遵旨核议严定传习西洋教罪名处分条例》，载《档案史料》，第928—929页。

²⁹⁰ 《吏部尚书瑚图礼奏为遵旨核议严定传习西洋教罪名处分条例》，载《档案史料》，第929页。

(5)如西洋人仅止过境并无逗留失察之专汛官，降一级留任，兼辖官罚俸一年，统辖官罚俸六个月，提镇免议；²⁹¹

而对于失察旗人习教之该管各官处罚更重。本来吏部与兵部核议的结果是“如有旗人习西洋教者，将失察之该管官照地方官之例降二级调用，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大臣照地方统辖官之例降一级留任；如该管官自行查擒者免议”。²⁹²但是，几天后的谕旨认为，“旗人居住京城，尤应遵守法度。该管官耳目切近，亦易于稽察。因此”如有传习西洋教者，本人即应加等治罪，失察之该管官亦应从重议处。“所以将“原议失察旗人潜习西洋之该管官降二级调用著改为降三级调用，兼辖官原议降二级留任，著改为降三级留任，统辖大臣原议降一级留任，著改为降二级留任”。²⁹³

（二）查明失察旗人习教之历任都统副都统

由德天赐案中汉军旗人周炳德、佟恒善包衣旗人汪茂德习学西洋教一案中牵涉出要查明失察旗人习教之历任都统副都统，然后分别议处。²⁹⁴

“兹据刑部覆称该犯等原供同周炳德，现年六十四岁，系镶黄旗汉军人；佟恒善，现年四十八岁，系正白旗包衣人，均于十六岁入堂习教等语。并据该管各旗将历任都统副都统等职名咨送前来。臣等查明已故各员外所有失察镶黄旗汉军周炳德习教之历任都统。臣庆桂、绵懿博与禄康，现任都统长麟，历任副都统郑明伦、铁保、文宁、都尔哈苏、楞额、长龄、明兴、绵志、奕绍、春宁、成书多、永武、德麟、敬敏、永来扎尔、杭布丹巴、多尔济、庚音、富兰策拔、克珠隆阿，现任副都统额勒金、布佛、楞保，现任备领高炯，副备领宝柱，佐领善庆，失察正蓝旗汉军佟恒善，习教之历任都统阿克东、阿晋昌、成书、绵循、长麟、永庆、绵佐、保宁，现任都统额勒登保，历任副都统徐绩、范建丰、那明泰、成书、英和、明亮、广泰、那彦成、绵志、明志、玉恒、成宽、永玉、庆昌、本志、裕瑞、多善富、色铿额，现任副都统广兴、菩萨保。历任备领郑明伦、李杉、甘连洁，现任备领松茂，副备领佟烜，佐领庆存，失察正白旗包衣汪茂德，习教之历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长安、丰绅

²⁹¹ 《吏部尚书瑚图礼奏为遵旨核议严定传习西洋教罪名处分条例》，载《档案史料》，第929页。

²⁹² 《吏部尚书瑚图礼奏为遵旨核议严定传习西洋教罪名处分条例》，载《档案史料》，第929页。

²⁹³ 《奉旨著照吏部兵部会奏办理核议失察西洋人传教之地方文武官员》，载《档案史料》，第931页。

²⁹⁴ 《大学士庆桂等奏为查明汉军旗人周炳德等习教一案失察各员分别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866页。

殷德、松筠、盛住、景熠、那彦成、丰绅济伦、永来、英和、额勒布孟、住巴宁、阿范建丰，现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缙布明德、苏楞额、那彦宝、常福、阿明阿，现任备领延庆，副备领福宽，管领恒玉，副管领观音布。应请旨敕交吏部、兵部分别议处所有。”²⁹⁵

（三）对西洋人的处置

嘉庆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对当日御史甘家斌奏请定西洋天主教治罪专条一折核议，指出“西洋人在京令其推步天文算法，不准出外滋事。伊等素奉天主教是其国俗，若只以本国之人自传本国之教原可不必深究，乃竟敢诬惑内地民人竞相传习，致为人心风俗之害，则不可不严设例禁。前此屡示惩创，未经祥立科条”，²⁹⁶因此，要刑部核议，制定出治罪专条。随后对于西洋人违禁传教治罪专条，有如下情形：

- (1)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者，竟当定为绞决；
- (2)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²⁹⁷

同时查明居住京师的西洋人，如果“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下令“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着发交两广总督矣。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其他“在京当差之西洋人，仍当严加约束，禁绝旗民往来，以杜流弊”。²⁹⁸“至直省地方，并无西洋人应当差役，原不应潜留居住，应令各直省督抚将军等严密访查。如有西洋人在该处居住者，亦勒限全行遣回本国，并咨行沿途地方官及两广闽浙总督一体稽查，毋得任其逗留。倘无西洋人在该处居住，亦限于一年内饬取地方官，切实印结，咨报西洋堂大臣察核，并报明臣部存案，如逾限补报，奏明备处，并严禁西洋人不许在内地置买产业，以绝根株。再在京西洋堂本有四处散居，各城防检难周，现在议处将无职西洋人全行遣回，其所居房舍应否量为归并裁撤之处，并请交该管大臣酌议办理。其留用各堂亦如该御史所奏，镌刻西洋馆字样，以符明实”。²⁹⁹

嘉庆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据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查明，在京西洋人共 11 人，

²⁹⁵ 《大学士庆桂等奏为查明汉军旗人周炳德等习教一案失察各员分别议处折》，载《档案史料》，第 866—867 页。

²⁹⁶ 《内阁奉上谕著拟定西洋天主教治罪专条交刑部核议》，载《档案史料》，第 913 页。

²⁹⁷ 《吏部尚书瑚图礼奏为遵旨核议严定传习西洋教罪名处分条例》，载《档案史料》，第 927 页。

²⁹⁸ 《管理西洋堂大臣福庆等奏报遵旨赴西洋堂查明西洋人情况折》，载《档案史料》，第 923 页。

²⁹⁹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奏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查禁天主教酌拟办法折》，载《档案史料》，第 921—922 页。

除福文高、李拱宸、高守谦 3 人现任钦天监监正监副，南弥德在内阁充当翻译差使，毕学源通晓算法，以及贺清泰和吉德明二人年老多病不能归国之外，其余学艺未精之高临渊、颜诗莫、王雅各伯和德天赐³⁰⁰等 4 人因无差使，未便令其现住在京，奉旨遣令回国。³⁰¹

当时贺清泰七十八岁，于乾隆三十六年来京，曾得六品顶戴；吉德明六十三岁，于乾隆四十九年来京。颜诗莫、王亚各伯、德天赐均于乾隆四十九年来京，均禀称“自嘉庆十年奉旨，严禁传教，大加惩创之后，一切稽查约束在在严密。伊等各知畏惧，数年小心敛口，不敢与人往来交接，并不敢私自出堂，今蒙剖切晓谕，所有伊等感恩，畏法情形，只求转奏”。³⁰²刑部官员认为，虽“详察西洋人情词甚属恳切，复细加查询近年西洋四堂，并无与外人交接之事，查西洋人情愿来京情愿来京效力者，向由两广总督具奏，奉旨准令来京那，始行咨送进京当差”，但是“今无职役之五人内，惟毕学源通晓天文算法。其高临渊、颜诗莫、王亚各伯、德天赐私人学业未精，止能绘画及修造钟表等事，在京本属无用，应即遵旨令其归国”。因此“传知该西洋人令其自行料理，届时行知沿途各省督抚派委明干……伴送照料约束，勿令其在徒滋事，交两广总督，一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以仰副我皇上柔远之仁，防微之义”。³⁰³

见留京并无回旋余地，到了八月十六日，高临渊等人便通过福庆奏报房屋变价折银一事。高临渊等人呈称，“蒙恩着令回国，不敢耽延久滞，现在治装，惟所住之房，本系自买自盖，目下并无售主。今既起身在途，恳照海甸德天赐所住之房，官为料理，将所卖之银交与在京西洋人收存，或即交西洋人照应自卖”等情。³⁰⁴福庆遂称，查得“嘉庆十年，经管理西洋堂大臣将德天赐所住海甸房屋六十间具奏交官。德天赐应行入官房间，着交与定亲王绵恩、苏楞额经管，其估需价值银壹千肆百柒拾两零，着在造办处动支加恩赏给德天赐。……今高临渊等所住西洋堂一所，在西直门内，共房六十五间。查亦系雍正年间从前在京西洋人置

³⁰⁰ 德天赐已于嘉庆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从热河释放回京。见《奉旨著将德天赐加恩释放令其回京仍交西洋堂严管》，载《档案史料》，第 895 页；嘉庆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旨，西洋人德天赐遣往热河，业已数年，着加恩释令回京，仍着禄康等交西洋堂严加管束。钦此。

³⁰¹ 《礼部尚书福庆奏为西洋人高临渊等四人奉旨回国所居房屋可否由内务府经营或交在京当差西洋人福文高等人折》，载《档案史料》，第 945 页。

³⁰² 《管理西洋堂大臣福庆等奏报遵旨赴西洋堂查明西洋人情况折》，载《档案史料》，第 924 页。

³⁰³ 《内阁奉上谕西洋人贺清泰等三人著准留京高临渊等四人交步军统领衙门遣送回国》，载《档案史料》，第 924—925 页。

³⁰⁴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15 工部为西洋人在京居住房屋交内务府变价银两赏给高临渊等事移会稽察房文》附件：《福庆奏报西洋人房屋变价情形折》。

买房基自盖之屋，并非高临渊等四人所置，今伊等既经起程在途，未便令其自卖，理合奏明请旨，可否将此项房间仍交内务府官为经管，并估需价值银两，或赏交在京当差西洋人监正福文高等收领，抑或赏给高临渊等之处。³⁰⁵随后得出的办法是，“此项房间系从前在京西洋人所置，并非高临渊等出资置造，着交内务府收管。前次德天赐名下入官房六十间，曾经官估银壹千肆百馀两赏给德天赐。此项房屋间数相等，亦着内务府核实估计，先于造办处动支银陆百两，分赏高临渊等四人作为盘费，令其迅速起程，俟估定价值，除去陆百两外，其余即赏给在京当差之福文高等照数收领，并着内务府速行变价，务令承买之人照民房式样拆盖居住”。³⁰⁶这就直接导致了西堂的被废。

乾隆中期以后对于西方传教士进京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即由澳门夷目（或洋行商人）代表传教士向广东政府提出申请，接着广东督臣了解改传教士的情况，专业特长等，向朝廷奏报，乾隆亲批后即由广东政府派遣官员一路护送传教士进京，不准他们随便私自行动。³⁰⁷因此，传教士被遣返回国，也是有一定程序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一路护送，以免传教士私自潜入内地，防止传教士与民人接触。传教士每过一省，必由当地省督奏报过境详情，并小心接管，直至到下一省为止。

嘉庆十六年九月十一日，西洋人高临渊等四人过直隶境，直隶总督温承惠奏报并于八月二十六日送出直隶景州境，交山东省委员接护，其间并无异况。³⁰⁸十一月二十一日，高临渊四人过江西境，江西巡抚先福奏报奏，已交广东委员接护前进。该西洋人一路俱属安静，并无与内地民人交接往来情事。十二月二十六日，广东巡抚韩封奏报，高临渊等抵粤，交澳门夷目收管遇船便回国。至随从高临渊等跟役四名，前准西洋堂办事大臣谕行，俟高临渊等到广后，仍押送到京，投交提督衙门。³⁰⁹

以上便是高临渊等人被遣返回澳门的大致过程。高临渊等人被遣送回国，北京的天主堂也受到影响。《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记载：“嘉庆十六年，西堂亦废。缘是年皇上有旨，西洋人惟在朝有职任者，准在京居住，余俱不准逗留。时西堂

³⁰⁵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15 工部为西洋人在京居住房屋交内务府变价银两赏给高临渊等事移会稽察房文》附件：《福庆奏报西洋人房屋变价情形折》。

³⁰⁶ 《奉旨西洋人高临渊等人所住房间著交内务府收管》，载《档案史料》，第932页。

³⁰⁷ 吴伯娅：《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暨南史学》第三辑，第473页。

³⁰⁸ 《直隶总督温承惠奏报遵旨委员接护西洋人高临渊等过境片》，载《档案史料》，第944页。

³⁰⁹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19 广东巡抚韩封奏报西洋人高临渊等抵粤交澳门夷目收管遇便回国折》。

有西士四人，因而不安其居，遂遵旨离京南下。四人甫出京，西堂即被毁。计自德理格于雍正初创立西堂，迄今历八十九年。”³¹⁰开始说“西堂亦废”，是指嘉庆十二年东堂失火遭焚毁之事在前。当时福文高、李拱宸两神父住东堂，虽然福文高想效仿乾隆年间南堂失火，经高慎思奏闻奉旨重建的作法，也上书给嘉庆，不料嘉庆却下旨让其迁往南堂，东堂不必重修，于是东堂遂废。³¹¹“西堂有西士四人”，即是指高临渊、颜诗莫、王雅各伯和德天赐四人。因此，他们四人的离京就直接导致了西堂的荒废。

（四）对违禁传习天主教民人的治罪条例

除了对官员和传教士作出相关处置之外，对于天主教的受众人群，也制定了若干规定。关于对普通百姓信奉或传习天主教，稍微近的，乾隆四十九年有条例，称“西洋人传教惑众，最为人心风俗之害，现在各省神甫名目尤当严禁。内地人有称神甫者，即与受官职无异，本应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财物资助，申明应拟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所有接引传教之人亦应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示惩戒。至内地民人因祖父相传持戒供奉，自当勒令悔改，即将呈出经卷等项销毁”。

³¹² 又嘉庆十年教案中，在京旗民传习天主教，往来寄信之人被发往厄鲁特为奴：“习教执迷不悟之旗员发往伊犁充当折磨差使，旗人消除旗档，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仅止听从入教之名，照违制律杖一百，先行枷号，待何日情愿出教再行疏枷发落；其到官即情愿出教者，概与免罪，即行省释”。³¹³

参照前例，刑部和吏部等官员拟出以下惩罚条例。他们“所有入教愚民易惑难免，皆由传教匪徒多方煽惑所致。政贵清源，自应将辗转传教之人尽法严惩，以杜煽惑”。³¹⁴因此，对于惩罚也有轻重之分。

（1）嗣后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诵经，立会煽惑，有指实者，其为首之人即照左道异端煽惑人心为首为律，拟绞监候；

（2）为从及被诱入教之人照煽惑人民为从，则发黑龙江给所伦达呼尔为奴，旗人消除旗档；

³¹⁰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载《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222页。

³¹¹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载《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222页。

³¹²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奏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查禁天主教酌拟办法折》，载《档案史料》，第919页。

³¹³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奏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查禁天主教酌拟办法折》，载《档案史料》，第919页。

³¹⁴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奏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查禁天主教酌拟办法折》，载《档案史料》，第920页。

(3)如有妄布邪言，关系重大或符咒蛊惑诱奸妇女，并诬取病人目精等事，仍临时酌量各从其重者论。³¹⁵

刑部官员还考虑到，人数既众传染亦深，势难挨家挨户地搜查，因此，“应请敕下步军统领衙门都察院顺天府暨直省各督抚将现定新例剴切遍示，正其趋向，予以自新”，则又另外酌情处理：

(1)如果习教之人能于“一年限内翻然悔改，情愿出教”，就概与免罪；

(2)如果过了定限，尚未出教的，到官后始行悔悟，“于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3)倘始终执迷不悟，即照新例发遣。³¹⁶

除了人身惩罚外，还勒令习教民人回家必须重新张贴门神灶神，供奉续弦牌位，并且会派员检查。在佟澜一案中就提到，“佟澜等人现虽供明真心悔改，但恐一时畏罪，求免伊等。全家久为邪说所惑，已经释放……将伊等家属传至，令其当面告诫，各将洋教不祀祖先、不供门灶等事全行改革，仍交各该旗查明伊全家出教是否属实……”³¹⁷官府方面将贴不贴门神灶神，拜不拜祖先作为出教与否的一个标准。

二、制定新的管制措施

长麟和英和被调派管理西洋堂事务之后，即拟出西洋堂事务章程十条，加强对传教士活动的约束。其内容主要包括派员轮流稽查天主教四堂；去掉天主教四堂匾额；西洋人外出办事需由人陪同；女堂撤销另作他用；严加稽查四堂下属各所；严查西洋人寄回本国家信；管理为西洋堂服役之人数；张贴告示警告民人不得入教，否则重惩；严禁西洋四堂收买羊草以用作迷药等。其具体内容如下：

1、添派章京四员常到（天主）堂，轮流稽查。□军统领衙门酌派步军校一员，步甲五名，营官一员，营兵五名，每日轮流在四堂门前严密稽查。并令该衙门于该四堂前后门外相地添盖堆拨房二间，备官兵等得有栖止。倘派出之官兵并不实力稽查，别经发觉，则严惩，兵则重治。

2、事欲端其本必先正其名。西洋人来京当差，不能不援馆舍以供栖止。乃西洋人自书匾额名来建天主堂。转似建设此堂之初，即寓供奉天主之意，遂致愚

³¹⁵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奏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查禁天主教酌拟办法折》，载《档案史料》，第920页。

³¹⁶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奏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查禁天主教酌拟办法折》，载《档案史料》，第920页。

³¹⁷ 《奉旨著将佟澜等仍载刑部鞫禁待查明其全家出教经详报再行释放》，载《档案史料》，第858页。

人，妄谓天主不干例禁，即此以开煽惑之端，应请即将天主堂字样咨行工部稽查。

3、除西洋人自奉其教，按日念经例不禁外，旗民人等概不许赶赴西洋堂。西洋人亦不许与旗民交结往来。此内有现在钦天监行走者，止准其因公出门，先期报明本管堂官，临期派营官一员同来同去。其无职之西洋人止准四堂往来，亦派兵役随行。如有乘间赶赴旗民人家往来者，著该管地面官即行擒解。步军统领衙门究办随往之兵役，不行禁止呈报；及该地面官失于觉察者，一经查出，定行参处惩责，仍派番役人等不时严密稽查。

4、西洋四堂各于附近置有女堂或六七间八九间不等，现在各妇女均已畏罪躲避，其所住房屋应请暂时官为封锁，由管堂大臣询问西洋人，或愿典卖或愿租赁，俱由官为办理，其价值仍给西洋人收领。

5、查海淀地方有西洋各堂下处，共有四所，现在并无西洋人居住，亦无传教念经房间，只有看房一二人，应交步军统领衙门转饬该地面，营官派发官兵常川稽查，毋许旗民人等擅自出入。如有西洋人因公到彼住宿者，该官兵询问明白，即报知该营，随时稽核。

6、西洋四堂各于附近置有女堂，或六七间，八九间不等，现在各妇女均以畏罪躲避，其所住房屋应请暂时官为封锁，由管堂大臣询问西洋人，或愿典卖，或愿租赁，俱由官为办理，其价值仍给西洋人收领。

7、西洋人如有寄回本国家信，俱令回明本管堂官行文，俄罗斯馆传认识西洋字之人，认明译出后经本管堂官看明，再行用印，由兵部寄往两广总督，如有该国人等寄京之信，亦令两广总督拆封看明，译出之文一并寄京交本管堂官查验后，再交西洋人收领。均不得私觅寄送。一经查出，即将私觅寄信之人从重治罪。内由管堂大臣外由两广总督将不准军民私代西洋人寄送书信之处明白出示晓谕，备不致误蹈法网，并请嗣后令两广总督严禁该国人等寄往各直省信物以杜勾结。

8、该四堂西洋人各有服役之人，应即查明现在人数，造册存寄，不许增添，如有事故去者，令其报明，方准另雇，庶易查核。

9、近来旗民入教者不少，盖因从前该四堂念经传教并未严禁，以致愚人受其煽惑，日引日多，若不严行禁止，恐不肖之徒仍阳奉阴违，势所不免。该四堂门外及京城内外，俱应张贴告示，并注明如系军民人等，充发烟瘴，有曾经入教，现已改悔，确有可据者，免其究办。其经该管官查出，送交刑部者，果能当堂痛

加改悔，照本罪量予减等，并剴切晓谕西洋教之荒诞无稽，如此严切申明，庶旗民人等触目警心，知所敬畏。倘有差役人等假藉查办天主教为名，讹诈扰累，致滋事端，一经查出，从重治罪。

10、向来各西洋堂每过秋冬之际，该西洋人每以挑取药材为名，收买羊草，查各项药材，京城无不备聚，恐该西洋人指称寻取药材，实欲购求异物，暗配邪药，迷惑愚人，应请嗣后禁止该四堂收买羊草，以杜弊端。³¹⁸

三、收缴和销毁西洋经卷、刊刻书籍

嘉庆十年四月十八日御史蔡维玉上奏，严禁西洋人刊书传教。其奏折中称：

京师设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备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楼栖止。乃各堂西洋人每与内地民人往来讲习，并有刊刻书籍私自流传之事，在该国习俗相沿，信奉天主教，伊等自行讲论立说成书，原所不禁，至内地刊刻书籍，私与民人传习。向来本定有例禁，今奉行日久，未免懈弛，其中一二好事之徒，创其异说，妄思传播，而愚民无知，往往易为所惑，不可不申明旧例，以杜歧趋，嗣后着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留心稽察。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毁，并随时谕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务当安分学艺，不得与内地民人往来交结。仍着提督衙门五城顺天府将坊肆私刊书籍一体查销，但不得任听胥役籍端滋扰，致于咎戾。³¹⁹

同时谕令在京西洋人尽数交出西洋各堂书籍板片。索德超等人遂称：

蒙皇上天恩教训，成全我等，实在感激，昨已将各堂书籍板片尽数交出，嗣后惟当谨遵圣训，安分守法，不敢再与外人往来传教，私刻清汉字书籍，等语。³²⁰

蔡维玉称已逐一阅看缴获的西洋堂各汉字书籍。认为“尚无悖逆词句，惟多系荒诞支离之语”，因此将“其荒谬尤甚者粘贴黄签共七本，进呈御览”。另“又续经查到清汉字书一百七十三种，派员阅看后再行请旨销毁”。³²¹

四、强调广东省督责任

鉴于西洋传教士都是从澳门经由广东再进入内地的，这样一来，朝廷认为广

³¹⁸ 《大学士禄康等奏为酌拟西洋堂事务章程折》，载《档案史料》，第852—855页。

³¹⁹ 《内阁奉上谕著提督衙门等将坊肆西洋人私刊书籍一体查销》，载《档案史料》，第838页。

³²⁰ 《军机处奏为遵旨传谕西洋人索德超等人情形片》，载《档案史料》，第843页。

³²¹ 《军机处奏报遵将前续行查到西洋堂私刊清汉字各书籍容派员逐一查看后再行请旨销毁片》，载《档案史料》，第845页。

东官员负有更大的责任，军机处谕令强调广东省督的责任：

本日朕恭阅皇考高宗纯皇帝实录，于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内，钦奉圣谕，以西洋人蔓延数省，皆由广东地方未能稽察，方防范所致。向来西洋人情愿进京效力者，尚须该省省督抚奏明允准后，遣员伴送来京。何以此次罗玛当家竟公然分派多人赴各省传教。澳门距省甚近，地方官平日竟如聋聩，毫无觉察，自有应得处分，倘嗣后仍有西洋人潜出滋事者，一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即当重治其罪等因。又奉圣谕，以孙士意奏，委员伴送西洋人德天赐等四人进京当差，嗣后可毋庸选派矣。将来人少需用之时，另行听候谕旨等因，仰见皇考禁绝邪说，训诫严明至意，当德天赐等进京效力之时，在京西洋人已敷当差，即谕令停止选派。可见西洋人等来至内地授徒传教为害风俗，早在圣明鉴察之中。粤省澳门地方洋舶往来，该国人等自因赴广贸易，与内地民人勾结，能惑众传教。如果粤省稽查严密，何至私越内地乎？本年因江西省擒获为西洋人送信之陈若望及山西省民人李如接引西洋人若亚敬传教等案，业经根讯明确，分别惩创。嗣后着该省督抚等飭知地方官于澳门地方严查西洋人等，除贸易而外，如有私行逗留讲经传教等事，即随时饬禁，勿任潜赴他省，致滋煽诱其。有内地民人暗为接引者，即当访擒惩办。庶知敬惧，并当晓谕民人等以西洋邪教例禁素严，不可受其愚惑，致蹈发网。若无知愚民各思□善远罪，则西洋人等自无所肆其簧鼓。即旧设有天主堂之处，亦有不禁而自绝。此尤潜移默化之方。该督抚等惟当善为经理，实力稽查，绝其根株，正其趋向，亦整风飭俗之要务也，将此谕令知之。³²²

嘉庆帝和清廷知道澳门是中国天主教传入的根源，所以谕令两广督抚对澳门天主教严加纠察。嘉庆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军机大臣字谕两广总督蒋攸钰、广东巡抚董教增，大意是广东、澳门一带若有传习天主教拜会者，即严查究办。当时给事中李可蕃奏称，广西富川、贺县、昭平等县，与湖南、广东交界之姑浦山等处，有匪徒多人，结拜天地会，抢劫嚇诈。梧州、肇庆等府，亦有会匪滋扰商贩，勒索银两。又广州、肇庆各府属，有匪徒复兴三合会名目抢劫。³²³清廷认为广东

³²² 《寄谕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孙玉庭著严禁传习西洋教并停止选派西洋人进京当差》，载《档案史料》，第886—887页。

³²³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21 寄谕两广总督蒋攸钰等澳门地方近复传习天主教着严查究办拜会习教之人》。

民人多有潜习天主教者，连香山等县也有不少妇女加入，因而深恐“奸民潜踪教内转相引诱滋事”。这一点是清廷最忌讳的，唯恐天主教也像白莲教、天地会等中国民间社团那样，聚众起来暴动。而香山澳门，尤其是澳门，是华洋杂处的地方，易受天主教的影响。“近复传习天主教，久之易恐滋患”。要求各省包括广东在内，编查保甲，“将此等拜会习教匪徒，设法严查究办”，“并出示晓谕绅耆人等，俾其互相稽察，自行约束，有拜会入教者，禀官究治，纵容者罪之。倘兵役人等藉端诈索，查出严惩。该督等务即认真查办，以除邪慝而安善良”。³²⁴

嘉庆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再次寄谕两广总督蒋攸钰、广东巡抚董教增，如果澳门西洋人向内地民人传授天主教的话，要严惩不怠。奏折中提到，天主教本传自外洋，该夷人居住澳门，自习其教，原可不必过问，惟该夷人若向内地民人传授，则恐其煽惑流毒，此则不可不严切申禁，一经查出，不但将内地习教之人按律惩办，其传教之西洋人亦一并严惩”。³²⁵

五、加强教化力度

（一）驳斥《教要序论》

嘉庆十年五月二十日，因是年教案中牵涉到旗人习教，因此上谕严饬查禁。并将收缴汉字书籍查看，并呈御览。嘉庆一一披阅，并加以驳斥。《教要序论》内称天主是万邦之大君；《圣年广义》内称所信降生之耶稣系普天下各人物之大君，又称中国呼异端为左道，未必非默默中为承行主之而有是言；又称凡在天地大主之下，自君王以至士庶，人人弃邪归正，圣教大行，未有不久安长治者。又称我教之主，真正是天地人物之主。又称凭他有道之邦，多系世俗肉身指导。又称人欲乘此机会传教中华。又《婚配训言》内称外教者如同魔鬼奴才等语，支离狂妄，怪诞不经，不一而足。而其中尤为悖谬者，则称听父母所命相反于天之命为大不孝。有圣女巴尔拔拉，不肯听从逆命，被顽父亲手杀之，天主教怒至公，即以暴雷击死之。为人父母亲友阻人事主者，当以此为鉴等语，灭伦绝理直同狂吠，又称当时有一个贝子，终日行非礼之事，福晋劝之，不从一日有一个魔鬼拉贝子下地狱，天主以福晋有德行，默启他使知伊夫火海永远苦难，可见不听善劝，决不免天主永罚等语，尤为肆口乱道。贝子、福晋之称，西洋人何从知悉？自系

³²⁴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21 寄谕两广总督蒋攸钰等澳门地方近复传习天主教着严查究办拜会习教之人》。

³²⁵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522 寄谕两广总督蒋攸钰等澳门西洋人若向内地民人传授天主教则当严惩》。

从前与旗人来往谈论知此称号，妄行编载。事属以往，今亦不加深究，至其所称贝子被魔鬼拉入地狱之语，皆系凭空捏撰，毫无影响。似此造作无稽，充其伎俩，尚有何言不可出诸口，何事不可笔之书，若不及早严行禁止，任令传播，设其编造之语悖谬，更有重于此者，势不得不大加惩办。与其日后酿成巨案，莫若先事预为之访。前已谕令，派出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禄康等公同议立章程，随时稽查。兹特捐出书籍所载各条，指示申谕，嗣后旗民人等务当读圣贤书，恪守本朝清语骑射。释道二氏尚不可信，况西洋邪教耶？亟应剪除旧杂勿再听信邪言，执迷不误。³²⁶

（二）再次列举天主教之危害

嘉庆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刑部事务大臣董浩等人上奏，对传习天主教拟定治罪专条。奏折中首先历数天主教的种种危害。董浩等人认为：

“西洋人在京专令其推步天文算法，不准出外滋事，伊等素奉天主教，是其国俗，若只以本国之人自传本国之教，原可不必深究，乃竟敢诬惑内地民人遍相传习，致为人心风俗之害，则不可不严设例禁，前次屡示惩创，未经祥立科条，着交刑部核议，具奏等因。钦遵抄出到部，臣等议得据该御史甘家斌奏称，窃维师巫，邪术左道异端，因以邪害正，易于滋事，俱分别首从严治其罪，并将地方官交部议处，原使有所敬畏，不敢轻犯，故此等教匪尚少蔓延，惟天主教自康熙年间流入内地，曾延及广东、陕西、四川、湖广、山东、陕西、直隶等省，以及京师皆被煽惑，历经查办，毫无底止，推原其故，总因该教性最狡黠，巧于避就，又因办案时人数过多，难加深究，故同系邪教惑人而治罪独轻，且地方官并无处分，不免因循就令，查办案，难以示惩，以致肆无忌惮，任意蔓延，殊为风俗人心之害，并恐积而愈众，滋生事端。查该教不敬天地，不祀祖先，不孝父母，不畏刑法，种种欺公藐法，背名畔义，实属以邪害正，情理难容，既经造书煽惑，动致数千户人民。泯蔑纲常，背违法纪，即系妖言惑众，其设立十字架，诱众礼拜，亦与隐匿图像烧香集众者情节相同，未便治罪，独轻致无顾忌。且闻该教能以符咒蛊惑诱污妇女，诬取病人目睛，律贵诛心，该教既非图财，又非劝善，果何所为而

³²⁶ 《内阁奉上谕著严禁旗人传习天主教并将各堂所贮书籍检出缴销》，载《档案史料》，第859—860页。

必只身传教，迷人行恶亦未便任其狡展，不实不尽，至内地民人食德服畴，胆敢信邪教，目无尊亲……”³²⁷

在董浩等官员看来，天主教不祀祖先，不孝父母，不畏刑法，欺公藐法，背名畔义，泯灭纲常，背违法纪，完全就是邪教。当然，说到天主教能以符咒蛊惑诱污妇女，诳取病人目精则是过于偏激之语了，已经把天主教妖魔化了。但是，这的确又代表了当时上层阶级对天主教的认识。在这些官员看来，“神父给妇女听告解，便蒙受勾引良家妇女的嫌疑，给病人传油和给垂死的婴儿付洗，便诬以摘心挖眼以便制造药品的罪名。……拉丁语谁也不了解，于是礼仪中所用的拉丁经文，便视为邪术咒语；驯至礼节的装饰、圣像、圣牌、圣水等，都视为妖术的符录工具。”³²⁸于是，这一切严重的误解和曲解，便成了控告、诬蔑和仇恨教会的根由。

（三）《辟西洋天主教说》

嘉庆帝还要求各省学政撰写禁教文论。“各省学政皆慎简儒臣，界以叫化之责。且按试州郡远口，必周于该省风土人情，无难秘访周知。奸民倡为邪说，端蒙从而习之，或诱于财利，或溺于淫邪，均各有受蔽之由。著该学政各就按试之地察其民人所易惑者，作为谕说。剴切化导，其词无取深奥，但为辨其是非，喻以厉害，明白浅近，使农夫贩竖皆可闻而动心。发交各州县官刊刻印刷，于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务使家喻户晓”。³²⁹其中，湖北学政朱士彦写道：“西洋人自明神宗时，利玛窦始入内地。其后数十年即有一二任来者，其人能算天文时间，又持天主教天文时间与古法合，是以钦天监用之天主教惑世诬民，不许施行，现在禁民习教，尤严犯者，罪在不赦。在尔等愚民，自以为天主教劝人为善，与邪教不同，不知西洋人诱人入教，设心最为险恶，其意总在叫人一切不认得，心心念念止有一个。西洋人又说，止要灵魂升天堂，肉身无关紧要，正是叫人甘心情愿替他出力，死而无悔，所编造的经卷都是从来没有的事，不过借佛书的话，编来哄你们的，亦有仿照邪教的事。至于西洋人那年给尔等银两，是何居心？西洋人到尔家内，与官长无异，是何道理？从前西洋人在葛尔巴行教，后来要夺葛尔巴；在吕宋行教，又要夺吕宋；在日本国行教，被日本国人识破，于海口岸上铜铸天主跪像，上岸者不践踏天主像，罪即不赦。皆从前西洋人做的坏事。尔等皆朝廷

³²⁷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奏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查禁天主教酌拟办法折》，载《档案史料》，第917—918页。

³²⁸ 穆启蒙编著，侯景文译：《中国天主教史》，光启出版社，第109页。

³²⁹ 《辟西洋天主教说》，载《档案史料》，第1073—1074页。

良民，稍有知识，何故被其愚弄，自取罪戾。兹不惜苦口，为尔等一一剖示：

一 天主教所谓劝人为善，如孝敬父母、十诫之类。但自尧舜以来，没有不讲孝道，并不待西洋人说至，如生我父母，治我父母，教训父母，就是君亲师之义，并不是他说起的至诚邪淫、偷盗。现在国法禁止，更不待他说，但天主教既教人孝父母，何以叫人不祀祖先。入教之时将祖宗父母神牌送与毁弃。孝敬者固如此乎？且人止有一父母，何以领洗坚振等事？必有代父代母。你们想你们的父母，他要教别人代做，稍有人心，当与为耻，而尔等执迷不悟，何也？至于诫邪淫，从教中妇女亦有为西洋人诱奸者，又是何说？诫偷盗，不取不义之财，试问西洋人何以造作无用之物贩卖？又引人吃鸦片，又行使假银洋钱，是他劝人做的好事，他却件件不做。

一 天主教说有信、望、爱三德，叫人钦崇天主，专向天主，若事他神并算命、占卦、择日风水等说，便是犯这三件。尔等试看时间书是西洋人同制造的。时间书上明说某日宜嫁娶，宜出行等类，非择日乎？奏书博士、太岁大将军之类，非神道乎？非说风水乎？可见他并不依教人的话。

一 天主教说佛教轮回之说，不是其言，尚为有理，但他何以又用佛书天堂地狱之说？他见佛法行中国日久，愚夫愚妇无不敬信，欲修来生。所以先将轮回之说辟倒。因人愿升天堂怕入地狱，所以仍用此说以哄人。而天堂地狱随天主的意思，所以有人信他佛书，前生来生已无凭据。至天主教的天堂地狱，要待天地穷尽之后，人人灵魂与肉身复活，方上天堂入地狱，编造谎话，又要万万年没人识破，岂非荒唐之极？

一 天主教说天主造天地神人万物，自古经书上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上戴天下履地，天主亦有人耳。若天地是他造的，则未造天地之前，他所戴的是甚的，所履的是甚的，不辨而自明矣？

一 天主谓天地初造二人，一男一女。男名亚当女名厄娃，为天下人之元祖。造地堂居二人，其中天主欲试其心，设禁一木之果，戒勿食，二人信魔鬼引诱，食果，天主当驱二人出地堂，所以世上诸种灾难，皆由人主得罪天主所致。开辟生人之始，不必与之辩论，但据说天主既造

二人，何以必欲试其心，是天主之心先不诚。可食之物而戒以勿食，岂非说谎？天主既爱人，生人又生出种种灾难，是天主不爱人。十诫的不杀人害人，不说诳语，天主当日已先犯了，何以立教教人？

一 天主教圣事七样，圣洗、坚振、告解、圣体、终传、神品婚配、尔等试思以水洗额行临传油持烛，衣白衣，此等与邪教做会，令人饮药水，望油灯何异？至圣体用小麦面饼葡萄酒做成天主像，令人咽下，其中显藏有迷药，与邪教之令人食药物，何异？³³⁰

³³⁰ 《辟西洋天主教说》，载《档案史料》，第 1075—1078 页。

第四章 余 论

一、嘉庆教案的特点

虽然说嘉庆禀承了前朝禁教政策，但是初期实行得并不严厉，只是一种笼统的模糊的禁教意识。但是随着嘉庆十年教案的发生，嘉庆帝及朝廷才发觉天主教并没有在中国销声匿迹，反而是暗涌不断。一方面，罗马教廷方面并不慑服于中国皇帝的禁令，除原在华教士有秘密潜伏下来的外，也还继续派遣教士千方百计地进入中国。他们或利用清朝官员的懵懂懈怠蒙混，或采取贿赂手段买放，或靠中国教徒接应掩护，或由同仁故友设谋用计，可谓心机费尽，办法使绝。总之，禁教期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实际并未间断。面对洋教这种禁而不止的势头，也令具有无上权威的中国皇帝们感到困惑而气愤。因而密切注意着在华天主教的动向，一有风吹草动，便立刻追根寻源，究查到底。所以禁教期间教案仍不时发生。有的案事旷日持久，波及各地，实际上成为全国性的禁教运动。

于是嘉庆十年后制定了多种措施来禁行天主教。虽然这一时期在华西洋传教士作用不大，但是民间传习天主教的力量却是在加强的。天主教的传播，仍是有发展的。这些发展隐藏于各个大大小小的教案之中。教案也是从反面证实了天主教的存在与发展。从嘉庆五年的贵州胡世禄教案，到嘉庆十年教案，到发生在各省的形色各异的教案，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从京城一直到四川贵州等广阔的内地，从旗人到汉人，从有品衔的官员到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从城镇到乡村甚至深山里，莫不跟天主教沾上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是嘉庆时期天主教在华得以继续传播的根本。这种大规模的天主教群体在中国城乡社会的存在说明了从明末开始本土化的天主教已经在中国社会站稳了脚跟。³³¹

综观嘉庆朝的教案，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数量多，涉及地区广。从嘉庆五年开始，有贵州胡世禄教案；嘉庆十年连续爆发德天赐案、佟澜案、图钦和图敏案、李如案，以及成都华阳县案；嘉庆十一年有直隶杨继承案；嘉庆十六年陕西张铎德案、四川巴县和渠县案、贵州顾占鳌案；嘉庆十九年四川王幅案；嘉庆二十年四川朱荣、童鳌和唐正玘教案；嘉庆二十四年湖北刘方济各案，等等。教案爆发的地区也基本上是嘉庆时期天主教得以发展传播的地区。教案发生越多的地方说明改地区天主教发展比较兴旺。也正符合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趋

³³¹ 张先清：《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36页。

势，即由沿海地区和江南地区往内地转移。(2)官府查禁方式主要为搜捕擒拿传教士、抓捕信徒、发布禁教告示、封闭教堂等。但是查禁力度的大小也跟主持查禁的官员有很大关联。如果主事官员对天主教存有同情或有意包庇，则牵连范围不会太广。反之，如果遇到像四川总督常明这样的狂热禁教的官员，则不免会加重查出力度。(3)有例援引，惩处严厉。被抓获的教徒重辄被判死刑，或被发配边疆，沦为奴隶；轻则杖罚囚禁，比之前朝乾隆时期不知又要严酷几倍。乾隆时期对华职人员采取流放，对一般天主教教民则是要求退教，对禁止天主教传教活动不力或有过失的官员，提出申饬或参奏。而且这些处理多是奉密谕办理，并未有像嘉庆时期专门针对天主教的取缔章程。当制定有专门条例之后，教案中各直省督抚援引新例，或援引上谕、新例、部议，以求情罪相当，嗣后地方官员查办天主教案件，既有明文规定，在法理上也有了根据。³³²

二、天主教的本土化

以上教案的特点同时也说明了几个问题，即天主教在华传播发展的本土化、乡村化和宗族化等趋势。本土化寄托于乡村化和宗族化，并集中表现在，其一华籍神职人员的重要作用；其二修院的作用；其三童贞女的作用。

(一) 华籍神职人员的重要作用

清廷施行禁教以后，西方传教士大部分被驱逐出境。尽管仍有一些西方传教士私入内地传教，但在华西方传教士的书目与此前世纪相比明显减少。于是华籍神职人员开始在传教事务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教会被捕神职人员的结构也开始从早期以外籍传教士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华籍传教士为主。华籍神职人员中除了神父、修士之外，还有传道员³³³、善会会长³³⁴，神父也称司铎，修士为天主教中出家修道的男子，未被晋升为司铎则只能称之为修士。在禁教困难时期，教会发展成的中国神职人员系统，有力地支撑起了传教会的日常工作，对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贡献极大。以四川为例，到1804年，四川有18位中国籍司

³³² 庄吉发：《清朝宗教政策的探讨》，《清史论集》（五），第207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

³³³ 传道员有两种类型，一是定居的，一是巡回的。固定居住的传道员，更确切地说是善会领袖，以一个特别的会口为基地，负责社团的日常领导事务。中文称为会长，拉丁文称为“团体领袖”，法语中称为“会口首长”。巡回的传道员相对要少一些，他们在非天主教徒中从事皈化工作，在禁教时期，往往要冒很大的个人风险。关于雍正和乾隆时期华籍神职人员的活动与作用可以参看宾静：《清雍乾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一文。

³³⁴ 固定居住的传道员、会长或善会领导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晰，所有的会长一定都是传道员，但并非所有固定居住的传道员必须是会长。

铎，而法国传教士只有 4 名。³³⁵

在嘉庆教案中，被捕的主要人物已基本上是华籍神职人员。如胡世禄、罗宋氏、张大鹏、朱荣、张铎德等。这些人信教虔诚，意志坚定，即使在教难中也未曾隐匿躲避，反而是坚持传教；被捕后也视死如归（天主），坚决不肯离教。正是他们这些前赴后继的精神，在教难时期鼓励教友，给予了他们以希望。这也是禁教期间天主教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修院的作用

为了培养华籍传教士，各教会先后在中国及境内外创办了多座修院，如马国贤创办的拿不勒斯圣家书院，外方传教会创办的暹罗总修院，耶稣会在澳门创办的圣保禄学院及圣若瑟修院，另外在北京、四川、云南等地还创办了各种修院。³³⁶修院的作用在于为各传教区输送华籍神职人员，开展和维持传教工作。这一点在禁教时期尤其重要。因为华籍神职人员比较容易隐藏身份，方便与教徒的沟通。

嘉庆时期中国国内修院情况如下³³⁷：

地点	时间	创办者或主持者	概况
云南龙溪	1782—1814	四川主教 Pottier	1786 年迁往四川宜宾附近落让沟；1814 年教难中被焚毁；院长 Hamel 氏从事修院教育三十余年。1824 年龙溪又重开预修院。
澳门圣若瑟修院	1784 年重开	法国遣使会	1784 年由葡萄牙与法国遣使会合作复办。生若瑟修院重办后成为遣使会的培训机构，再一次成为中国教区输送人才的重要基地。学生最初只有 8 名，至 1815 年时有 26 名。 ³³⁸
北京	1784 年左右	罗广祥与吉德明神父（法国遣使会）	先开办初学院，为培植本地遣使会圣召，由吉德明神父主持；初学院外另立一座正式修院，为造就本地教区神职，全由法国遣使会指导。1788 年该院有青年修生 15 人，1800、1803、1804 年此数一直无大变动。吉德明逝世后，有南弥德继任，后因教难南弥德离京去澳门，

³³⁵ 罗伯特·安特蒙著，李大霞译：《18 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³³⁶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 156—159 页。

³³⁷ 除另外注明外，资料来源于陈介夫、谢凡：《中华圣职培育史》，第 341—346 页。

³³⁸ 参见叶农：《试述澳门圣若瑟修院在遣使会管理时期（1784—1856 年）的发展》，《学术研究》，2005 年 12 期。

			修院由国籍神父绥马宝神父负责维持。南弥德抵澳后，于1820年在澳门重开此院。
北京	19世纪初	福文高、李拱宸等葡籍遣使会士	在办理修院上，葡籍遣使会士仿效法籍遣使会士的做法。除已开修院也计划开办初学班。修院中有修生5人，初学修道者5人以上。

这些修院集中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维系天主教的传播，扩大天主教的影响。

（三）童贞女的作用

童贞女制度作为中国天主教妇女的一种组织，产生于18世纪四川的中国妇女中间，她们与自己的家庭生活在一起，选择过独身的生活并献身于宗教。³³⁹ 传道士主要是触及到男子们，童贞女们则为女子和儿童们提供一种补充服务。这两种并存的圣职是在同样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们出自各省的民间环境，与教难的背景有关。³⁴⁰ 禁教时期，为扩大传播对象，保护传教士，主要是外籍传教士，降低遭受打击的代价，维持教会事务，一些贞女开始承担起传道或教师的职责，对妇女、女童传授教理、指导宗教活动等。天主教在川、滇、黔的活动得以维持并有所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贞女们的积极努力。

1784年罗马传信部就基督徒贞女的规定发布了一项新的指令，主要规定了妇女不准在25岁以前发贞洁誓愿，对学生的教育应当小心谨慎以避免引起“外邦人”的注意等等。³⁴¹ 这就将贞女的作用引导到教育孩子而非是去发展新教徒但是，“通过教育女孩，基督徒贞女在四川天主教团体的成长和维持中仍然处于中心的地位”。³⁴² 到1892年，四川有1060名贞女，另有434名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管辖之下散布于云南、贵州、广东、西藏和东北等地。四川省有2945名学生在贞女的指导下就读于231所学校，她们还拥有6所孤儿院。³⁴³ 这样，贞女与神父、传道士、会长及节妇（指愿意为教会传播活动献身而不再嫁的寡妇）等构成清代西南地区天主教会的福音传播团体，编织严密的传教网络，各自根据自己身份，针对不同对象，积极活动，相互配合，发展教会。³⁴⁴

³³⁹ 恩特曼著，顾卫民译：《十八世纪四川的基督徒贞女》，载《天主教研究论辑》第1辑，第159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³⁴⁰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第18章 女性传教士——童贞修女》，第211页。

³⁴¹ 恩特曼著，顾卫民译：《十八世纪四川的基督徒贞女》，载《天主教研究论辑》第1辑，第171页。

³⁴² 恩特曼著，顾卫民译：《十八世纪四川的基督徒贞女》，载《天主教研究论辑》第1辑，第174页。

³⁴³ 恩特曼著，顾卫民译：《十八世纪四川的基督徒贞女》，载《天主教研究论辑》第1辑，第173页。

³⁴⁴ 秦和平：《关于清代川黔等地天主教童贞女的认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17页。

三、各地天主教的发展形势

同时由于各个修会在华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也导致各地区教务发展的不一。自耶稣会被取缔之后，方济各会、遣使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的作用究更为突出了。

陕西：乾隆四十九年（1784）大教难时，方济各会秦晋代牧区代牧康安当（Anthonius Maria Sacconi）也被捕，于次年死于狱中。乾隆五十二年（1787）教廷委金（经、梅）（Marianus Zaralli）为继任代牧，乾隆五十四年（1789）始获准去太原就职，当年在视察山西教务后在潞安去世。此时教区暂由吴若翰副主教（Joannes Baptista Cortneova）负责，乾隆五十七年（1792）伊客善神父受命继任代牧，但教廷委任状到达时伊神父已于前一年去世，吴若翰副主教即受委为继任代牧。嘉庆九年（1804）吴主教逝世后路类思神父（Antonius Aloisius Landi）继任代牧。路主教上任后，除照例力行传教外，特别注重传教士的神修训练，因而也写作了不少有关神修生活的著作。嘉庆十一年（1811）逝世于山西洞儿沟。伍安当（Joannes Antonius de Pompejana）副主教随即受委为署理主教维持教务。嘉庆二十年（1815）艾若亚敬（Joachim Salvetti）正式受命为秦晋代牧，但伍安当仍以署理主教身份协助艾主教在陕西境内传教。³⁴⁵路类思接管教区后，受嘉庆十年教案影响，无法视察教区，遂专心培养修生，五年内有三位修生晋铎。³⁴⁶

湖广：湖广代牧区先由四川教区主教代管，乾隆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1750—1838）转由秦晋教区主教代管。嘉庆十一年（1806）路类思主教委任伍安当神父为湖广代理主教。六年后伍神父返回汉中，兰月旺神父接任，直至四年后在武昌下狱判处死刑止。³⁴⁷乾隆二十七年（1762）湖南由方济会负责之秦晋教区代牧主教兼管。最初三十多年仍由在此传教已久之其他修会继续工作。机爱犬纳贡七年（1802）兰月旺神父以总铎身份来湘潭，留居四个月后，曾视察了无神父居住的各会口。嘉庆十年（1805）伍安当神父到湖南，第二年被任命为湖广署理主教及总视察。嘉庆十七年（1812）奉调陕西。由兰月旺神父接替伍安当神父之职。

348

西南地区（四川、贵州、云南）：徐德新就任四川主教后，对四川等省实行

³⁴⁵ 李少峰：《方济会在华传教史》，载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92页。

³⁴⁶ 李少峰：《方济会在华传教史》，载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100页。

³⁴⁷ 李少峰：《方济会在华传教史》，载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109页。

³⁴⁸ 李少峰：《方济会在华传教史》，载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123页。

层层分片的管理方式，加强其传教活动。如川东区管理川东、川北及贵州省，区内又分若干小片区，建立起严密的网络，并落实到人头负责，方便传教活动。在禁教时期，在部分地点还实施移民的方法，将天主教徒集中居住，形成封闭的天主教社区，方便宗教活动，利于保护，增强凝聚力。如落让沟便是其中之一，教会还在此建立了修院。³⁴⁹传道员和贞女双重制度使西南地区的天主教在禁教时期仍然得以隐秘发展，并且成绩不小。1786年，四川、云南和贵州共有469名成年领洗人；1792年则有1508人；1795年，1401人；1800年，1250人；1804年，达到2143人。而在贵州，1799年共有600名天主教徒。³⁵⁰1801年时四川天主教徒为40000人，1814年为60000人，13年间增加了2万人。西南地区也是嘉庆时期发生教案最多的地方，这固然有当地官员对朝廷禁教政策执行彻底，也说明了天主教在此地的发展兴旺情况。

福建：1796年以后，在经历了乾隆朝较为严厉的反教风波后，多明我会在整个福建省的信徒人数有所增长，其中主要增长点来自福安。1795年时，包括福州、漳州、福宁地方在内，多明我会在福建地方的天主教徒达到14312人，其中仅福安地区天主教徒达10284人。历经多年的禁教以后，福建的天主教徒仍然保持在1万人以上。到了1804年至1814年这十年间，多明我会辖区内的天主教徒数量从20600人增长到了40000人，十年间增加19400人，年平均增长近200人。³⁵¹

嘉庆时期福安也发生过几起查拿天主教事件。如嘉庆十九年（1814）汪邦俊署理福安知县，他就在辖区内掀起一次较大规模的查禁天主教事件。汪邦俊曾派遣兵丁到顶头、穆洋、双峰等各个天主教村子抓捕天主教徒，命令习教者具结改悔，缴销经卷，一部分为首的天主教徒被捕入狱，遭到刑讯。³⁵²

江西：耶稣会在华时代宣告结束后，遣使会和方济各会接管了耶稣会的传教区。而在江西传教的主要力量则是遣使会，其传教活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嘉庆时期传教活动并没有多大发展。1792年刘方济神父途径江西前往湖北，法籍神父李神父（卑尼额斯定）曾在江西待过。至1832年才又有法籍神父和德广

³⁴⁹ 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三），《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5月，第52页。

³⁵⁰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第203页。

³⁵¹ 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第101页。

³⁵² 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第92页。

(Bernard Laribe) 入赣。³⁵³

这一时期澳门也不再是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一来乾隆末期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到来使中国的边防管制更趋严厉；二来当时澳门的葡国人基于保教权的滥用，亦极力阻止传教士经由澳门进入内地。³⁵⁴于是便有神父尝试找出另外一条可行的道路。即经过越南顺红河北上，可以到达云南，再由云南经四川到达山西，需要花费数月之久的时间。³⁵⁵第一位走过这条路的是梅神父 (Illuminatus de Castagnole)，他 1806 年自澳门出发，1808 年才到达山西。还有另外两位神父也走同样的路程到达山西，他们是艾若亚敬神父 (Joachim Salvetti) 和方神父 (Vincentius Frontini)。³⁵⁶

至道光前中期，禁教政策也持续着，多少也继承了嘉庆朝对待天主教的政策。道光十六年和二十年还发生了两起比较大的教案。但是，随着西方人对中国大门的叩关，外交局势的变化，连带的，对待天主教的政策也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据一般估计，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天主教徒的人数不下 20 万。

³⁵³ 参见汤开建、赵殿红、罗兰桂：《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兴衰》，表十三、十四。

³⁵⁴ 韩承良编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根据方济会传教历史文件），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 页。

³⁵⁵ 韩承良编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第 80—81 页。

³⁵⁶ 韩承良编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第 81 页。

参考书目

古籍文献：

- (1)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6 年。
- (2) 《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1987 年。
- (3) 《明清史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 (4) 吴湘湘：《天主教东传文献》及续编，台湾学生书局。
- (5) 《史料旬刊》，故宫博物院 1931 年。
- (6)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赵春晨点校，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 (7) 黄伯禄：《正教奉褒》，载《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湾光启出版社。
- (8)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载《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湾光启出版社。
- (9) 梁国栋：《燕京开教略》，载《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湾光启出版社。
- (10) 李刚己辑录：《教务纪略》，上海书店 1986 年。
- (11) 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建道神学院 1996 年。
-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 (13) 一史馆、暨大古籍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14) 刘芳辑：《清代澳门中文档案资料汇编》，澳门基金会 1999 年。

中文著作：

- (1)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卷，中华书局。
- (2)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4 年。
- (3)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 1987 年。
- (4)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台湾光启出版社 1992 年。
- (5)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商务印书馆。
- (6)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 1991 年。
- (7)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 1970 年。
- (8)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 (9) 林冶平：《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

- (10) 《中华殉道圣人传》，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出版社 2000 年。
- (11) 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3 年。
- (12) 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 (13) 王冶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 (14) 孙尚扬、钟鸣旦：《1840 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
- (15) 佟询主编：《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16) 芮传明：《淫祀与迷信》，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17) 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 (18) 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
- (19) 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宣圣委员会：《中华殉道圣人传》，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出版社 2000 年。
- (20) 《纪念孟高维诺主教来华七百年国际学术会议文集》，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社 1996 年。

论文：

- (1) 汤开建、陈文源：《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暨南学报》（哲学和社会科学版），2002 年 12 月。
- (2) 修彩波：《方豪与中西交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 1 期。
- (3) 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世界宗教研究》，2000 年第 3 期。
- (4) 张先清：《1990-1996 年明清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 年第 6 期。
- (5) 钱国权：《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状况概述》，《甘肃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
- (6) 吴伯娅：《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耶稣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比较》，《清史论丛》，2003—2004 年号。
- (7) 吴伯娅：《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暨南史学》第 3 期，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8) 刘青瑜：《嘉庆十年查禁天主教的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 年 1 月。

- (9) 宝成关:《18世纪清政府禁教政策的确立与实施》,《河北学刊》,1997年第3期。
- (10) 郭卫东:《清朝禁教政策演变的若干问题》,《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
- (11) 陈莉婷:《从容教到禁教:清朝政府对天主教政策的转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2000年硕士论文。
- (12) 罗兰桂的:《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清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暨南大学古籍所2000年硕士论文。
- (13) 吴伯娅:《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清史论丛》,2005年号。
- (14) 宾静:《清雍乾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暨南大学历史系2004年硕士论文。
- (15) 汤开建 赵殿红 罗兰桂:《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兴衰》,
- (16) 明秀丽:《天主教在贵州的早期传播》,《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7月。
- (17) 明秀丽:《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在在贵州早期传播异同论》,《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7月。
- (18) 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厦门大学
- (19) 秦和平:《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8月。
- (20) 刘君:《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论》,《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
- (21) 康志杰:《湖北天主教开教述略——兼评明清在湖北活动的耶稣会士》,《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
- (22) 康志杰:《关于湖北磨盘山神权社会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
- (23) 张晓虹:《同治回民起义与陕西天主教的传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 (24) 张先清:《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 (25) 秦和平:《关于清代川黔等地天主教童贞女的认识》,《四川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6 期。

西文著作及译著:

(1)【法】卫青心 著, 黄庆华 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2) Noel Gubbels:《天主教湖广传教史(1587—1870)》(*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3) 穆启蒙编著, 侯景文译:《中国天主教史》, 光启出版社。

(4)【法】沙百里著, 耿昇、郑德弟译:《中国基督徒史》, 第 199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5)【法】费赖之 著, 冯承钧 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中华书局 1997 年。

(6) Nicolas Standaert 编:《中国基督教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635-1800*),

(7)【法】樊国阴著, 吴宗文译:《遣使会在华传教史》, 华明书局, 1978 年 10 月初版,

(8)【法】谢和耐著, 于硕等译:《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9) 成和德:《湖北襄郧属教史》, 海土山湾印书馆 1924 年。

(10)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后 记

韶光飞逝。

就在这每日于暨南园的穿梭之中，一点一点的基本完成了论文。在这之中，导师汤开建教授给予了悉心的指导。不仅仅如此，这两年里，从导师身上，我还学会了很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然，每每想起导师的淳淳教诲，总会不自觉赧颜。只因我这做学生的，怕是连门都还不曾入吧。同时，在生活上，师母也给予了涓涓细流般的关爱。还有师门中的诸位师兄师姐，想起他们总会不由的浮起微笑。倘若没有他（她）们，我在这南国广州的日子恐怕会缺了不少的光彩。

古籍所和历史系的王颀老师、马明达老师、陈文源老师、陈才俊老师、马建春老师、叶农老师以及其他各位老师都或对我的学业或对我的论文有很大的引导作用，诸位老师的治学精神和做人准则更是我学习的典范。

感谢赵殿红师兄推荐我进入广东人民出版社实习，此间收获亦是不小。

还有我的父母及男友，都是关心和爱护着我的人。

终究要继续前行的，而恩师、父母、爱人和朋友便是我前进的坚实后盾。

2006年5月于广州暨南大学